

蘇聯外交
政策史論

林石父著

蘇聯外交政策史論

第五節 和平政策的機敏運用

五七

第六節 國際的同情和援助

六三

第四章 革命和內戰時期的蘇聯外交政策

六九

第一節 從十月革命和平令到布列斯特和約

六九

第二節 從各國武裝干涉到國內戰爭之結束

七七

第五章 和平建設時期的蘇聯外交政策

九五

第一節 和平建設初期蘇聯與各國復交活動

九五

第二節 從參加軍縮活動到加入國聯

一〇八

第三節 集體安全運動和多邊互不侵犯協定

一一八

第六章 反侵略戰爭時期的蘇聯外交政策

一三七

第一節 從蘇德戰爭爆發到斯大林格勒大捷時期的蘇聯外交

一三九

第二節 從斯大林格勒蘇軍大捷到西歐第二戰場開闢以前的蘇聯外交

一五二

第三節 西歐第二戰場開闢以後的蘇聯外交

一七三

第七章 戰後和平問題和蘇聯外交的展望

一九一

蘇聯外交政策 史論

第一章 緒論——蘇聯外交政策的特質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不同的政治經濟結構，可以產生不同的外交政策。對內政策主要是跟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而變化，對外政策則主要是跟國家間的國際關係變動而變化。在這裏，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可以影響對外政策的變化；而國家間的國際關係的變動，也可以影響對內政策的變化。所以，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的關係，不是互相孤立的，不是互相分離的，而是密切聯繫着的。但在基本上，對外政策總以對內政策為基礎，一國對外政策底目的，總是從它底政治經濟結構產生出來的。法西斯軸心國家對內政策的特點，是極端剝削人民與壓迫人民；因此，它們底對外政策，就必然是最露骨的殘酷和壓榨，極力向外擴張勢力，奴役別的民族，佔領別國的領土，掠奪別國的權利和資源，以圖挽救它們底國內危機。最近幾年以來日本、德國、意大利的外交史，可以作為上述論斷的真證證明。

最近英美等國的外交政策，所以不同于法西斯軸心國家的外交政策，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英美等國的國內關係，不同于法西斯軸心國家的國內關係。這種內政與外交的有機關係，在蘇聯外交政策中，特別反映得清楚。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它底對內政策，是建設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它不願意被別人侵略和奴役，也不想，而且根本不許可以去侵略和奴役別的民族和國家。因為剝削和奴役是階級制度的產物，蘇聯既然剷除了階級的矛盾，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自然就沒有向



外擴張勢力和掠奪權益的人和集團，就根本沒有人去指使和發動侵略行動。

其次，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一種有計劃的生產，其目的在增殖公共的財富，在滿足勞動人民的要
求。社會主義的工廠和農場，都是公家的財產，每個工廠和農場，都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
生產品的大部分，就由勞動大眾消費掉，餘下的則作為擴大經濟企業（如建造工廠鐵路，添闢農場等
），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如開辦學校，圖書館，醫院，俱樂部，戲院等），以及作為加強國防力量的
費用，全部國民收入就這樣有計劃地支配着。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它的生產既然主要是為大
衆消費，而不是為了拿到市場上去出賣賺錢，因此，它根本不需要爭奪市場，更不要到落後國家去賺
取所謂超額利潤，去爭奪國外市場。

根據同樣的理由，蘇聯的國民收入，既能作有計劃的分配，其目的在增加人民的福利，擴大社會
主義經濟的再生產，並鞏固社會主義的國防；因此，它就沒有過剩的資本，要在國外找尋出路去投資
賺錢，這就決定它不需要到國外去爭奪投資的場所。何況社會主義國家決沒有私人性質的軍火企業家
，因此，也就沒有人去挑動戰爭以圖消售軍火，這也是蘇聯外交政策所以是和平政策的一個因素。

上面是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去檢討蘇聯外交政策的特質，這是問題的核心理論，但若我們
的研究範圍僅限於此，那是很不够的。我們知道俄國革命並不是單單一個範圍內的革命，它是帶着國
際性質的革命，因為這個革命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中由舊的世界進到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一個根本變局
，是世界人類解放的曙光和燈塔。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於這一點看得非常深刻，他在民族主義演講中說
道：「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國家，世界上生出一
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孫中山先生說這話的時候是一九二三年，他們在這六年

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武力的黨政策，改用和平的新政策，不但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將國際觀，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利害，因為那種和平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帝國主義，並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見顧父民族主義演講七十一頁）。又說：「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

這個大希望的具體內容，就是俄國革命不僅是動搖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它同時還建立了世界人類解放運動的強大的和公開的基礎和中心。世界人類解放運動從前不會有這個基礎和中心。現在却可以在這個中心周圍團結起來，組織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底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去反對法西斯主義。因為這個基礎和中心，為他們建立了燈塔，為他們照出道路和給他們指出前途。如果從前沒有全世界進步人士的公開的集議場，那末，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却已經出現了蘇聯這個新型國家，來做他們表明意願和希望的公開集議場了。

在蘇聯，沒有什麼小的事情，也沒有無意義的工作。在蘇聯的一切事情，對於全人類都是非常之有意義的。每個從他的田裏得到豐盛收穫的集體農民，每個用鋼骨和大理石砌成屋子的建築工人，每個供給祖國以新的五金的礦工，每個鄉村教師和每個蘇維埃作家，他們都不僅爲了社會主義的祖國和現在而工作，同時也是爲了全人類和將來而工作。因此，蘇聯政治經濟文化的每一個進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迴響。例如當蘇聯于一九三六年宣佈憲法的時候，差不多全世界的各國各民族都有成萬封的信和電報送到莫斯科去。寫這種信的人有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老人和兒童、婦人和少女。他們不是被任何人所勉強，而是出於衷心的激動。其中有一個曾經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沒有參加任何黨派的德國退伍軍人費立德，寫信給斯大林和加里寧說：「不要節省材料，趕快

把你們武裝起來！供給紅軍以愈多的大砲、槍枝、機關槍、坦克車和飛機，那就更好。多多建造水雷和潛水艇，多多訓練政治工作人員，把天空用飛機掩蔽起來。保護你們自己，同時也就保護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這是一個何等響亮的警告，同時又是何等素樸的國際精神。

蘇聯的出現，不僅是俄國歷史發展的结果，同時也是全世界人類歷史進步的结果。從蘇維埃政權最初建立的日子起，蘇維埃國家的領袖及組織者——列寧和斯大林，就指出了蘇維埃國家是包含了先進及進步人類的最好希望。蘇聯在反對全世界黑暗和反動力量的鬥爭中，始終是一個先鋒部隊，特別是在今天，歐洲被希特勒德國所奴役的許多民族，差不多都把他們的解放，寄託在蘇聯紅軍的抵抗力量身上。英國、美國、南美洲各國的人民，也意識到和公開承認他們的命運——做獨立自由的民族呢？還是淪落到變成納粹法西斯的奴隸？十九是由蘇聯紅軍的解放戰爭來決定的。不僅如此，在全世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人類將擊敗侵略帝國國家而爭得自由民主，還是全世界都被法西斯奴隸制度所統治，也有賴於蘇聯紅軍的苦鬥和勝利來決定。實際上，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德國侵略蘇戰爭爆發以來，全世界萬萬千個受難人的心，都懷念着蘇聯，嚮往着蘇聯，每天每天的牽掛着蘇聯，從克里米亞、斯大林格勒到列寧格勒，這一條漫長的劇戰中的前綫，每天，都為着這一條戰綫上的一進一退而歡躍，而憂傷；因為，每個人心裏都明白，這是一個決定人類歷史前進或者倒退的戰場。道心情，我們的詩人最親切地歌唱出來了：「爲你們（蘇聯）丟掉二十公里一個村莊而痛心，爲你們奪回一條鐵路一個城市而慶幸」。這裏，再一次證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你們（指蘇聯）！引者註）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

謀解放」(國父臨死前致蘇聯遺書)，乃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上面這一簡短的敘述，已經足可證明蘇聯外交政策的最大特點，就是保衛社會主義的祖國，同時即所以保護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利益。因此，研究蘇聯外交政策的實質與精神，學習蘇聯外交活動的經驗與教訓，對於正在浴血抗戰謀取民族獨立解放的中國人民，也就有莫大的實際意義。記得列寧在一篇題名「外交政策的祕密」一文裏，曾經說過這樣沉痛的話：「可惜！民衆不能讀外交史一類的書籍，不能讀資本家報紙上的重要論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五七頁)。我們中國人民需要外交知識的武裝，當然更加迫切。因為外交政策與外交活動，對於全世界人民有生死攸關的戰爭與和平問題，是直接相聯系的。歷史指明着：聰明的外交，是在於保證進行戰爭有利情況。在於善于拆散敵人，並善于利用戰爭勝利的果實，與在於減輕不利的戰果。很明顯的，因襲以夷制夷，或倚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不能完成這一艱難任務的。這首先需要有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知識，並把這種科學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深入到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底祕密中去，把握它底發展動向，以規定自己的行動方針。蘇聯有它自己的特殊國情，有它自己特殊的內政外交的發展規律，當然不完全適用於中國。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蘇聯外交政策，有它的最高原則性，我們如果能够認識它底發展規律，能夠虛心學習它底經驗教訓，對於我們的抗戰建國，是有莫大利益的。何況中蘇兩國國境相聯萬里，中蘇兩國人民在求解放的過程中，有着血肉的關聯。正像孫哲生先生所說：「我們不僅在戰時需要蘇聯的協力，共同來爭取最後的勝利，即在將來戰爭結束以後，重建世界，維持世界永久的和平，亦不能缺少蘇聯」。既然不能缺少蘇聯，就應該實事求是地去認識蘇聯，而研究蘇聯底外交政策，正是認識蘇聯的主要一環。

第一章 緒論——蘇聯外交政策的實質

第二章 蘇聯外交政策的四大原則

蘇聯外交政策有它最高的原則性，這最高原則性，就是照顧蘇維埃國家的利益，同時又照顧世界進步人類的利益；照顧現在，同時，照顧將來。因此，蘇聯外交政策和它的內政一樣，都是以社會發展的法規規律，而不是取決於人類主觀的想法。當然，他們決不輕視人類主觀意志的作用，而是認為人類主觀意志，只有當他確切反映着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才能發生積極的作用。因為任何新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只有當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以後，才產生出來。而當他們一經產生，也就成為巨大的力量，影響到社會之存在，並給自已開闢道路。然而歸根說來，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底存在，總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總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因此，社會歷史既已成為社會之規律性的發展，社會歷史之發展，國際關係之變化，不會如何複雜，總有規律可循。那末，外交政策之決定和在實際活動中，也就不能以什麼偶然的動機為準則，而必須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為準則。

當然，一個原則的實行，決不可能一直平坦，何況國際關係之變化，何等錯綜複雜，外交活動，自不免有轉彎抹角的時候。蘇聯外交政策，雖然有他最高的原則性，但在實際執行起來，為了避免公然的阻礙或暗礁，以便繞道前進，自需要機警靈敏的運用。這種例子，在二十七年來蘇聯外交史上，是指不勝屈的，而且得到許多的成功。有些人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因此就輕易得出一「蘇聯的外交政策缺乏原則，以致動盪不定，變幻莫測」的錯誤論斷。還有人則故意歪曲中傷，說什麼「蘇聯的外交政策，只有利害，沒有信義」；或說「蘇聯在世界革命與關門建設的矛盾理論中動盪不定，以致產生

第三節 蘇聯外交政策的四大原則

蘇聯的動盪不定的外交姿態。在這裏，我們姑且不去研究這些信口開河的紳士們自己對別人究竟有多少「信義」，也不難看到他們的話，多半都是不合事實的臆測。其實，蘇聯外交政策及其樹膠搖動，有時雖不免極端盤旋曲折之能事，但是它的原則性，却比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為高。這種原則所包含的具體內容，據斯大林在聯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主要可歸納成下列四點：

(一) 蘇聯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蘇聯和其他各國的實業聯系。蘇聯現在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他們不來試圖侵犯蘇聯底利益；

(二) 蘇聯主張和那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保持和平的、親近的、和睦的關係，我們現在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保持這樣的關係，只要他們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侵犯蘇維埃國家邊界完整性和神聖性的利益；

(三) 蘇聯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為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

(四) 蘇聯不怕那些來自侵略者方面的威脅，並準備着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維埃國家邊境的神聖性的挑戰者底打擊」。

這樣坦白、赤誠、一字一句的極清晰的說明，確定的說出蘇聯在外交上：對維護和平國家，對鄰國，對抵抗侵略的國家，對侵略者的斬釘削鐵的明朗態度，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動盪不定的外交姿態」的表現，而是充分表現蘇聯外交政策的高度原則性。如果還嫌這個原則說明近於抽象，那就不妨分別給以較具體的闡釋：

第一節 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和其他國家的實業聯系

蘇聯的政府與人民有着共同的一致的需要：在單一的國家內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蘇聯人民將與世界其他一切國家的人同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也有着共同的需要：和平，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性，確定在一國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又因蘇聯是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所以蘇聯要國家要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除開革命政權的作用與國防經濟建設這些內在的條件之外，還必須堅持而靈活地運用和平外交，以爭取有利條件來鞏固自己，所以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因鑒于世界革命不能同時爆發，而新俄却須取得休戰時期，來鞏固蘇維埃政權，並建立新的軍隊。即排斥一切反對意見，決然與德國訂立布列斯特和約。在當時，列寧還說了幾句很有趣的話：「是的，我們會看到世界革命，可是現時這祇是一個非常好聽的童話，非常美麗的童話，我完全懂得兒童的本性是喜歡美麗童話的。可是我要問一問：嚴正的革命家底本性，是不提相信童話呢？任何童話中都有實情的成分，如果你同兒童們講童話，這童話中雄鷄和貓兒不用人類語言兼話，兒童們便不會對他發生興趣。現在也是一樣，如果告訴民衆，說德國國內戰爭會到來，同時你担保，說會有全盤的世界革命，而不是與帝國主義衝突；那麼，民衆便要說你欺騙他們。這樣說祇是在自己的了解中，在自己的願望中，去跳過歷史已造成的那些困難（一見一九一八年列寧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

接着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列寧又在真理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說明新俄爲什麼必須和德國議和，那篇文章的大意是：

第二章 蘇聯外交政策的四大原則

一〇

「俄國革命的外交政策必須根據於一般的國際形勢，尤其是更根據於西歐是不是可以爆發革命這一點上。在目前，這一可能性顯然是很小的，因此蘇俄的外交政策必須以這一點為前提。只要英國和德國有一天未發生革命，蘇維埃國家就必須找出最適宜於自己生存的條件。和德國締結和約，蘇俄可以利用一件事實，即英德在血戰之中，無力照顧。如若蘇俄現在一方面要獲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另一方面又要和資本主義國家衝突；那末，它將一無所得。不過，如若它先集中力量發展自己，它一定可以獲得第二個勝利」。

列寧這一番話，可以說是蘇聯實行和平政策的最早的公開聲明。列寧這一爭取和平的主張，後來又由斯大林加以繼承和發揮。當一九二七年九月美國第一次工人代表團到蘇聯參觀和斯大林談話的時候，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在那種程度裏，蘇聯可以和別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合作？對於這種合作，是否有一定的界限？或者這只是一種嘗試，以便弄清楚那一種合作在那一部份是可能的，在那一部份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如下：

「這裏所講的，大概是關於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方面，商業方面，也許還在外交方面的暫時的協定，我認為，兩個彼此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底存在，並不使這種協定絕對沒有可能。我認為，這樣的協定在和平發展底環境內是可能的，和適當的。輸出和輸入就是這種協定底最適當的基礎。我們需要機器設備品，原料（例如棉花），半製造品（金屬的以及其他），而資本家却需要銷售這些貨物，這就是協定的基礎。資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糧食，而我們却需要銷售這些貨物，這就是協定底另一個基礎，我們需要信用借款，資本家需要在這種貸款上得到好利息，這就是協定底又一個基礎，而且這是信貸方面的協定基礎。同時，大家知道，蘇維埃的

機關是遵守信用的付債人。

關於外交方面也可這樣說，我們進行着主張和平的政策并決意與各資產階級國家簽訂互不侵犯的公約。我們進行着主張和平的政策，并決意簽訂關於裁軍，一直到關於完全取消常備軍的協定。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在熱拿亞會議上就已經向全世界宣言了，這就是外交方面協定底基礎。

什麼是這些協定底界限呢？界限是由那彼此競賽着的與鬥爭着的兩個制度間的對立形勢所決定的。在這兩個制度所容許的範圍內，但只是在這種範圍內，協定才是完全可能的。與德國，與意大利，與日本及其他等國協定底經驗，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協定是否只是一種試驗，還是它們能具有多少長久的性質呢？這不僅是取決於我們，這還要取決於我們的對方。這是取決於一般環境的，戰爭可能把所有的和各種的協定推翻。末了，這是取決於協定底條件的。帶束縛性的條件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與加里曼簽訂了關於讓它開採格魯西亞金礦的協定，協定期限是二十年，可見期限是不很短促的。我們還與連拿，哥爾德非爾特公司簽訂了關於讓它開採西伯利亞金礦的協定，協定期限是三十年，——期限更長。末了，還與日本簽訂了關於開採庫頁島石油礦及煤礦的協定。我們希望這些協定帶有多少穩固的性質，可是，這當然不僅取決於我們，而且還取決於我們的對方」（見列寧主義問題三九二——三九四頁）。

蘇聯的外交政策，以保障其本國安全為基本要求，不過同時也不放棄追求普遍的和平與安全的目的。一九一七年蘇維埃共和國對世界所發出的第一次建議，就是一個普遍的休戰與和平的建議。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蘇俄政府曾不斷建議召開和平會議，簽訂和平公約。在一九一九年的日內瓦會議裏，蘇伊爾首次提出普遍裁軍的議案。這一提案，旋又於一九二五年再度提出，不獲通過，

第二章 蘇聯外交政策的四大原則

一一一

蘇聯乃於一九二九年提出普遍實行的部分的裁軍，一九三二年，蘇聯又首先贊助美國普遍裁軍三分之一的提議。從一九三一年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指九·一八，一·二八兩役）特別是從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希特勒上台之後，國際局勢格外緊張了，戰爭的危機格外迫近了，蘇聯便積極地推動集體安全互助協定體系的建立。蘇聯對於和平之追求，乃根據他們認為「和平不可分割」的堅強信念。誠然的，無論侵略者在任何方面發動攻勢，必將造成全世界的威脅，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欲使戰爭局限於一個地方，乃為勢所不能。要防止戰禍，必須愛好和平的國家，放棄爾詐我虞的觀念，組成集體安全制。一九三四年五月蘇聯又進一步提議，要求組織永久的世界和平會議。自從一九三四年秋季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它更加强其為和平而奮鬥的努力，蘇聯出席國聯代表李維諾夫，即受命本此目標而活動。

由此可知，蘇聯不但需要自己的和平，而且需要世界的和平。不但需要制止法西斯國家對蘇聯自己與弱小民族的侵略，而且需要制止世界大戰的爆發。大戰之不幸爆發，戰禍泛濫全世界，固然是法西斯軸心國家侵略政策發展的結果，但是過去歐美民主國家對於蘇聯與全世界人民苦心維持和平事業的努力加以拒絕或阻撓，也不能說沒有絲毫責任。蘇聯這樣維持世界和平到最後的一剎那，就是蘇聯的利益與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一致表現。

第二節 和鄰國建立並保持互惠及平等的善鄰關係

蘇聯地跨歐亞兩洲，東至日本海及柏林海峽；南達中國、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西連芬蘭、波蘭、羅馬尼亞；北達北冰洋。全國領土總面積在愛沙尼亞、立陶宛、拉特維亞等共和國加入蘇維埃聯邦以前，即達二一，三九七，六七二方公里，除了大英帝國本土及屬地面積合計，英國屬地面積為

三一、八一、〇〇〇〇方里，其本國面積只有二四二千方公里，比它大些的，外，它是超過其他一切國家的領土的，佔全世界總面積約六分之一。

及殖民地國家相接壤，其與鄰國關係自極爲複雜。蘇聯對於他的一貫方針，是建立平等友誼的平等關係。

在波羅的海方面，差不多半個波蘭，整個芬蘭、愛沙尼亞、立陶宛，在第一次大戰前，原是帝國的領土。第一次大戰之後，戰勝國強迫地將舊俄的領土加以分割，成立了這幾個國家，作爲反蘇的根據地。波蘭對於蘇聯，一向懷着鬼胎，因爲波蘭地主資產階級依賴英法帝國主義作靠山，從蘇俄割去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等一大塊領土，建立起半法西斯統治，便一直站在英法或德國方面，作爲反蘇聯的前哨。一九三四年德波協定的簽訂，把這個反蘇運動推到更危險的境地。當然，德國或英法列強推動波蘭去作反蘇聯的前哨，同時也就是把波蘭當作它們自己的掠奪對象。蘇聯是唯一沒有侵犯他國之必要的國家，但它同時明白，它本身的安全與其他國家，首先是鄰國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就曾向波蘭提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互助協定，而波蘭竟加以拒絕。甚至對大禍臨頭，德國法西斯要開始進攻波蘭的時候，波蘭統治階級猶不悔悟，拒絕蘇聯的軍事援助。當德國軍事在波境着着進展，波軍無力抵抗與波蘭國家瓦解的時候，蘇聯爲策自身的安全，阻止德國法西斯侵略軍的東進，並爲了解放居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一千一百萬同胞，才不得不派紅軍進入波蘭，以收復失地，同時即所以援助波蘭人民抵抗侵略。

芬蘭雖然是一個小國，而且和蘇聯接壤，但它統治階級的反蘇態度，却極爲露骨，有名的曼納林防綫，就是建築起來對付蘇聯的。波蘭瓦解以後不久，蘇聯即邀請芬蘭外長到莫斯科談判，提議與芬

蘭締結互助協定，卒因芬蘭反對而作罷。後來，蘇聯提議以卡累利阿省一部分蘇聯領土，讓與芬蘭，要求芬蘭將卡累利阿地峽一帶的蘇芬國界，向北移動數十里，並將芬蘭灣入口附近之一小部分領土，租與蘇聯建立海軍根據地，以解除列寧格勒所受的威脅（因列寧格勒與芬蘭相距僅三十二公里，在長射砲程之內）。本來，蘇聯的建議，不獨對蘇聯有利，即對於芬蘭自身安全，也極有益。但芬蘭統治階級因狃於反蘇積習，自恃後面有強有力者的支持，態度非常強硬，以致談判破裂。蘇聯爲求自身的安全，尤其爲保證列寧格勒的安全，不得不採取自衛政策。但蘇聯政府忠於自己和平政策的任務，永遠不肯妨礙別國的獨立。所以蘇聯在解除芬蘭反蘇要塞之後，並不提出與其對方國家尊嚴不相容的條件，相反的，仍願與芬蘭維持善鄰的關係。倒是芬蘭反動統治階級因爲分不濟敵友，把真正的敵人（德國侵略者）看作朋友，而把真正的朋友（蘇聯）反而看作敵人，結果成了希特勒德國的爪牙，而犧牲了自己的獨立。

關於波羅的海三小國，即立陶宛、拉特維亞及愛沙尼亞三國，在德蘇戰爭之前，都已由人民自決，正式加入蘇聯，變爲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無所謂鄰國關係。但在它們加入蘇聯之前，此三小國與蘇聯的關係，以及它們加入蘇聯的意義，却正可以供給人來研究。首先，從經濟關係來看，立、拉、愛三國的經濟，可以說是十足的殖民地的性質。由於帝國主義，特別是德國侵略主義者的奴役和榨取，三國立國二十多年來，原有的造船工業和紡織工業的盛名，根本化爲烏有；所剩下的一點木材、植物纖維素、紙張、牛油、皮革、雞蛋、乳油等原料和半製品，那也多半是供給德國用的。三國人民的食糧和日用品，却不能不仰給於外國。同時

消納，因此，就形成了對外貿易重大差額。當立、拉、愛三國束手無策的時候，蘇聯對於三國經

濟上的援助，是三國人民所深切了解的。自一九三〇年以來，蘇聯與三國的貿易關係，日益增進。社會主義國家以平等互惠為原則，而供給三國人民以經濟上必需之物品，自然會給予三國人民以莫大之啟示。擺在三國人民面前，是黑暗和光明的十字路，這便是三國政治變革的社會基礎。其次，從歷史關係來看，立、拉、愛的政治發展過程，有它們的顯著特點，拉特維亞立國於一九一八年，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立國於一九一九年。三國原為帝俄之藩屬，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三國人民都曾參加。愛沙尼亞曾經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蘇維埃政權，立陶宛曾經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建立蘇維埃政權，拉特維亞也曾經在一九一七年參加革命。這三國的民族在帝俄時代完全處於被壓迫的境地。當革命中，才得到民族自決的權利。可是，由於英、法、德、波等國對蘇維埃國家執行武裝干涉，就被迫在它們控制之下改成為所謂獨立國。這三個國家從立國以來，便處於列強角逐之下，同時也處於它們本國統治者與帝國主義列強合演反蘇活動的境中，它們的政治不能安定，也是種因此。立陶宛於一九二六年由總統斯美同那實行軍事獨裁，拉特維亞於一九三四年由內閣總理馬爾曼尼斯實行軍事獨裁，愛沙尼亞因長期處於人民不安定的政治生活中，於一九三八年頒佈了不符民意的新憲法。而且，由於法西斯德國的侵略觸發益趨深入，使三國統治階層，愈益倒行逆施，不顧人民痛苦，以國脈為孤注，到一九三九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戰蔓延到波羅的海以後，三國這種經濟政治上的腐敗傾向更加嚴重了，這使三國人民不能不奮起從死亡危險中找尋生路。而要脫離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奴役關係，只有人民羣衆自己起來改造政治制度，使立、拉、愛三國與蘇聯的關係，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面，這就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立、拉、愛三國人民舉義及其加緊蘇聯的背景和意義。

現在德蘇兩國是生死肉搏的國家，但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以前，德蘇兩國亦曾一度成為直接

的鄰邦。自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之後，隨着波蘭的問題解決，蘇德之間又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締結蘇德修好劃界條約，不久劃界完成，雙方同意勘定自伊戈爾卡河至波羅的海爲德蘇兩國新疆界，並締結蘇德勘界協定，以確定兩國新疆界的法定關係。自德蘇戰爭爆發之後，這種法定關係已完全破壞，但是，這個破壞責任，是應該完全由希特拉德國負的，因爲背信棄義的是德國，而不是蘇聯。

土耳其的復興，以及它近二十年來能有稍許的進步，蘇聯是給予了很大的幫助，這是周知的事實。土耳其自一九二五年和蘇聯簽訂友好中立條約以來，兩國一向保持着善鄰的關係，而兩國貿易也有重要的發展。雖然由於侵略國煽動的活動與挑撥離間，使蘇土兩國善鄰關係上，多少蓋上一些陰影，以致一九四〇年的蘇土互助談判沒有成功。但是，由於蘇聯對土始終維持善鄰態度，故兩國依然保持正常狀態，正如土總統伊斯基所說：「蘇土二國之友好關係，爲今日世界上極有價值之因素，兩國政府應使此種因素永爲任何勢力所影響」。

伊朗與蘇聯之國界，長凡二千五百萬里，兩國間的經濟關係，極爲重要。好些年來，蘇聯都佔了伊朗對外貿易的第一位。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伊朗和蘇聯的貿易，佔伊朗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三十三，由蘇聯輸入伊朗的貨物達二萬三千五百萬里爾（伊朗貨幣名稱），由伊朗輸入蘇聯的貨物達三萬一千五百萬里爾。蘇聯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即對伊朗維持着正常的關係。一九四〇年三月，蘇伊兩國締結通商航海條約，這對於兩國的政治和商務關係，均不無裨益。蘇聯和另一鄰國阿富汗於一九二二年成立復交條約之後，更於一九二六年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直到現在兩國都維持着正當的關

在蘇東方面，日蘇關係，長期處在緊張狀態中。尤其在日本和德意勾結簽訂防共協定之後，兩國關係，更加惡化。不獨漁業、邊境、庫頁島等問題不能圓滿解決，而且發生了兩次規模相當大的武裝衝突——一九三八年的張高峯戰事和一九三九年的諾門坎之役。此後，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化，又受了兩次痛苦的教訓，日本對蘇的態度，乃由強硬而變為軟化。一九三九年九月休戰協定的簽訂，年底臨喀協約的成立，一九四〇年三月樺祖北洋漁區的失敗，六月間劃界協定的議定，均可作為上述論點的證明。最近日蘇漁業談判協定，又將漁業協定有效期間延長到一九四四年底。今後蘇日關係如何，完全要看兩國本身的態度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而定。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就曾說過：「涉及日本，吾人可謂蘇日關係近來已開始略帶正常性……就大體言，日本方面有欲與蘇聯增進邦交之某種表示。苟承認互相尊重雙方利益，雙方苟了解必須將已失去重要性之某種障礙加以排除，則蘇日邦交之增進自屬可行」。

中蘇兩國均為大陸國，兩國國境相隣接，東西橫互達萬餘里。以兩國國境綫之近而且長，故蘇聯聲鄰政策，更有其深切之意義。中國抗戰之後，蘇聯曾先後與中國訂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中蘇商約，對我們作大量的幫助。而且因為中蘇兩國都是愛好和平擁護正義的國家，故此約訂立之後，中蘇兩國和平的意願，不獨沒有減少，反而格外加強。無疑的，這要進一步保障中蘇間的和乎善鄰關係。正如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演說中所表示：「吾國與正為其國家生存而奮鬥的偉大中華民族之關係，完全遵循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之精神，保持善鄰與友好，一如往昔」。

從以上簡單敘述，可見蘇聯不僅在政策上始終主張和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保持和平的、親近的、善鄰的關係，而且在實際行為上給予上述善鄰關係以確切保證和鞏固。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保

持這樣的關係，不去圖謀直接或間接侵犯蘇維埃國家邊界完整性和神聖性的利益。

第三節 主張援助為祖國獨立而奮鬥的被侵略民族

在上面第一章裏面，我已經引證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這個大希望的最實際內容，就是在蘇聯出現以前，被侵略民族的解放運動，往往是孤立無援，而且每每找不到正確的道路。而俄國十月革命，則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時期，不但帝國主義平安無事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底紀元，已經過去；而且一切為祖國獨立而奮鬥的被侵略民族，從此得到有力的援助。同時，蘇聯的存在，用活生生的事實，向全世界證明：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被剝削、被奴役，並不是永久不變的，而是可以解除的。蘇聯二十七年來的奮鬥和勝利，使全世界被奴役人民睜開了眼睛，從暗無天日的飢寒痛苦的深淵中，看見了光明的遠景。蘇聯好像巨大的燈塔一樣，光芒萬丈地照耀着他們奮鬥的道路。蘇聯的鬥爭範例和援助，對於為祖國獨立而奮鬥的被侵略民族，實是銳利無比的武器。還在一九一九年，列寧在全俄東方民族革命組織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就曾說到這一點：

「我想蘇俄紅軍所進行的一切，它的戰鬥與勝利的歷史，對於東方各民族是有極大的全世界的意義，它指明給一切東方民族看，無論這些民族如何弱小，無論在鬥爭中使用一切神奇技術與軍事藝術的日本及歐洲壓迫者有如何似乎不可戰勝的勢力，可是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民族革命戰爭，如果真正能夠喚醒千百萬勞動羣衆與被剝削者，便能產生這樣的可能的奇蹟：就是不僅從國際革命前途的觀點看來，即是根據在亞洲在西伯利亞所有的直接軍事經驗看來，根據遭受一切強大帝國主義

國家軍事侵略的蘇維埃共和國所有的經驗看來，東方民族的解放，是可能完全實現的。

在這裏，因為列寧的報告，有他的特定對象，所以只提到東方民族，其實他的精神，可以應用於全世界被壓迫民族，這只要讀過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報告：「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就可不覺而識的。蘇聯所以把援助為祖國獨立而奮鬥的被侵略民族，當作它的神聖義務，是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全世界人民解放運動的根據地。它主張澈底的民族自決與民族平等，而且在蘇聯國內也實行着這樣的民族自決與民族平等，它也希望全世界的被壓迫被侵略民族，都能享受這樣民族自決與民族平等的權利，因此，它對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願意伸出義俠的援助之手。

當然，這並不是說，蘇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況之下，即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援助。這種援助雖然也是一種義俠行為，但却不是通常所說那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俠，而是有着更高的原則性的，即蘇聯只援助那些力謀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不是那些力謀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會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某些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會和先進人類的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幫助。例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贊助波蘭人底和匈牙利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為什麼呢？因為在當時，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制度底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因為在當時，幫助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底這個最危險的敵人。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應當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之毫無疑義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之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客觀的存在。而且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

動底革命性質，主要應該從這個運動的客觀作用來決定。例如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底獨立而鬥爭，阿比西尼亞國王爲阿比西尼亞底獨立而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這兩個國王及北戰友是抱着君主制的觀點，缺乏民主的基礎，因而也就不能取得決定的勝利，然而因爲這種鬥爭是削弱着和破壞着帝國主義的統治，所以蘇聯毅然給它們以援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謀埃及獨立的鬥爭，因爲同樣的原因，在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不管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由資產階級出身，不管它的綱領離開社會主義是多麼遠，而蘇聯也毅然給它們以援助。反轉來，埃及的宗主國的某些人們，包括某些所謂「社會主義」的工黨在內，雖然也掛着民族運動的招牌，可是它們所進行的鬥爭，却恰恰是保持埃及底附屬地位的鬥爭。對於這種鬥爭，蘇聯只有加以反對，而決不會加以援助。又如日寇利用中國少數的民族敗類，建立所謂「滿洲國」，雖然也掛着民族運動的招牌，可是它們所進行的民族運動，却是分裂中華民族與便利日寇侵略的反動行爲，蘇聯更不會加以援助，而只有加以揭穿。

同時，蘇聯所主張援助的，乃是「那些遭受侵略並爲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並不是那些一味依靠外援而自己却不肯努力奮鬥的民族。因爲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幸福是不能任意給予的。如果勉強要這樣做，那便違反了自求解放的最高原則。蘇聯站在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當然希望各國發生革命，但是希望不能從空中樓閣裏產生，如果根本沒有革命的條件，誰也不能靠「希望」來促它產生。而且革命不是商品，所以也就不能隨便輸入輸出，這是要由各國社會發展的條件與人民大眾的意志來決定的。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與美國霍華德的談話中，曾經有透澈的說明：「蘇聯人民自然希望周圍國家也能够改變其面目，但這是周圍國家自身的事情」。又說：「輸出革命是全無意義的，任何國家如果具有這樣的願望，那末，儘可謀自身的革命；如果沒有這種願望，革命是不會發生的」（見列

掌主義問題七七六——七七七頁）。這種意見甚至在外交文件中亦正式表示過，例如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長齊采林致美國國務卿柯爾貝的牒文中，就會有這樣的話：「蘇維埃政府明白知道，各國勞工階級的革命運動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它堅持着這個原則：共產主義是不能強制給予的」。過去曾經有人硬說中國革命是蘇聯煽動起來的，這當然是「一種無中生有的胡說。後來又有人拿蘇聯紅軍進兵波羅的海，當作蘇聯輸出革命的證據，其實也是不合事實的推論。如果波蘭境內的西烏克蘭人和西白俄羅斯人，根本沒有回歸祖國的要求；如果立陶宛、拉特維亞和愛沙尼亞人，沒有革命的願望和決心，沒有要求他們底同胞兄弟援助的熱烈呼籲，即不會有蘇聯紅軍西進的行動。事實上，波蘭舊統治者對於這些少數民族的奴役和壓迫，早已激起了他們的憤怒，且已經產生不少的革命暴動。事實上，立、拉、愛三國舊統治者的各種反動措施，早已逼得三國人民非奮起鬥爭即無法解放自己。三國人民在議會中的改選意向，可以作為這一事實的最好說明。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以同胞兄弟的資格，給它們以援助，就決不是輸出革命，而是為了加強自己的國防，同時也就援助了兄弟同胞的解放。

蘇聯援助為祖國獨立而奮鬥的被侵略民族，是有原則的仗義行為；如果真有必要，就是付出很大的犧牲代價，也是毫無吝惜的；這在它援助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革命的事實中，表現得最清楚。這一點，美國記者斯屈朗（A. H. Strong）的評論最為公正，她在「蘇聯是否站在世界的外面」一文中說：「蘇聯在阿比西尼亞，並無國家利益可言，兩國亦毫無邦交；它與意大利的關係反而是很好的（據一九三八年以前而言）。可是蘇聯却首先要求國聯制裁意大利，而完全實行聯合制裁的，也只有它一國。蘇意邦交因此破裂，直至今日，兩國的貿易還受着此事的影響。最近（一九三九年）它們才同意

恢復以前所有的一部份貿易。在西班牙亦如此，蘇聯與西班牙連大使也未交換過，可是却僅有蘇聯援助政府共和軍來反抗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為後台的叛軍。因為蘇聯外交政策始終是援助被壓迫與被侵略民族的，所以千百萬人民都把蘇聯應使其自身成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保護者這一點，視為理所當然。有人因為看到西班牙共和國的失敗，居然這樣提出問題：為什麼蘇聯不對西班牙共和國給以更多的援助？可是他們不知道援助一個遠在歐洲，被英美德意共同判定要滅亡的國家，在陸軍與海軍方面是有着許多困難。他們問蘇聯為什麼不單獨封鎖意大利？可是他們不知道蘇聯為着援助阿比西尼亞，和意大利斷絕貿易一直要到邦交破裂的程度，其他政府仍毫無舉動。這些問題，使全世界更有蘇聯是「一切被壓迫者的戰士的感覺」。(斯屈期的文章已譯載文摘戰時旬刊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本)。

蘇聯積極援助為侵略者所侵略並為祖國獨立解放而奮鬥的民族，我們中國人民當然了解得更為深切。自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後，曾兩次對我國宣言（第一次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二次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放棄帝俄在我國所取得之一切特權，並廢除過去中俄所訂之不平等條約。中國舉行抗日戰爭以後，蘇聯本着幫助那些被侵略而為其祖國的獨立而奮鬥之民族的偉大宗旨，即對我們作大量的援助，並和我國簽訂中蘇互不侵犯協定和中蘇商約。七年來的抗戰事實證明：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最可靠最親密最能共患難的朋友，其對中國人民英勇犧牲的同情和援助，不夾雜有任何取價的企圖或謀利的野心，而純係出于其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立場。蘇聯根據其贊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法西斯強盜破壞世界和平的根本方針。不管日寇對蘇邦其何種恐嚇，要求蘇聯停止援華，甚至以破裂國交相威脅，而蘇聯始終屹立不動，援助中國如故。

這種情形，正如孫習生先生所解釋，是因為「中蘇關係，絕非普通外交上之友好而已，我們不僅是友邦，而且是兄弟的國家，有革命同志的關係」。這種兄弟關係與同志關係，正是中蘇友好關係的堅固基礎。

第四節 予打擊者以雙倍的打擊

有些人常常把蘇聯的和平政策與庸俗的和平主義，甚至與不抵抗主義相提並論，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和曲解。殊不知蘇聯雖然是採取徹底的和平政策，不侵犯的政策，但同時它於自己的國防設施却不遺餘力，時時在警戒着敵人的進攻。還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列寧就已大聲說過：

「我們政策的第一條以及我們全體工農必須學習的第一課就是防禦。我們是受各帝國主義的包圍，我們公開表示仇視我們，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以阻止敵人的進攻」。

蘇聯人民在其偉大導師斯大林領導之下，對於列寧這個警告時時刻刻都牢記在心，並以最大決心和毅力來執行這「指示。帝國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沉醉于戰爭，尤其想乘機擊潰蘇聯，想瓜分它的領土，並靠掠奪它來享福，結果一定要弄到「弄火者必自灼其手」的悲劇。過去日寇在張高峯與門坎，已經受到兩次不小的教訓；現在希特拉則受到了更大的打擊。斯大林早已提出過嚴正的警告：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很明顯的，這就是維持和平和加強與其他各國間的商業關係的政策，蘇聯並不打算威嚇任何人，尤其是並打算進攻任何人。我們主張和平並擁護和平事業。可是，我們並不害怕人們的威嚇，而且決計用打擊來對付戰爭挑撥者底打擊。誰要是願意和平，並力謀與我們發生

切實的聯系，它就總會得到我們贊助。而那些擅敢來進攻我們的人們呢，就總會遇到致命的打擊，使得他們以後再不敢把自己的豬鼻嘴伸到我們蘇聯的花園裏來」。

這已經足以說明，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和平政策，其目的決不在侵略，決不在戰爭，而在真正的和平。但是蘇聯的和平政策，決不同於庸俗的和平主義，更不同於屈辱的不抵抗政策。

什麼叫做和平主義 (pacifism) 呢？和平主義者是空洞的宣傳和平，抽象的呼籲和平，不管這種和平是平等的和平呢？還是不平等的和平？同時他們又空洞的反對戰爭，抽象的消惡戰爭，不管這種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呢？還是非正義的戰爭？所以和平主義就是不管戰爭與和平的實際內容和性質，不分青紅皂白的反戰主義，祈禱主義。和平主義者站在維持一切不合理的現狀基礎上，宣傳敷衍「搭漿」，「得過且過」的思想，宣傳宿命論的觀點，這種和平主義是和世界上一切腐朽勢力的利益相一致的。

這種和平主義之典型的表現是孤立主義 (isolationism) 和不干涉政策。過去美國的舊孤立派的主張，是要把美國孤立於世界之外，不干涉歐洲和亞洲的事情。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避免將美國牽入歐洲或遠東的戰爭，維持美國的和平。實際上怎樣呢？實際上是孤立派利用美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心理，「和平地」運用他們龐大的資本魔力，在全世界鼓勵戰爭，而他們却以「和平天使」的姿態大大賺錢。其次，他們妄想對一切戰爭主張孤立；比方，他們過去對於中日戰爭竭力表示不左右袒的態度，認為這樣美國就可以不牽入遠東的戰爭。實際上孤立派的做法恰恰是幫助了日寇對我的侵略，同時由於他們的資助，供給日寇以汽油廢鐵等，使日寇的侵略範圍一天天擴大了，對美國本身的威脅也一天天嚴重了，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終於在來栖三郎正在華府大牌活動的時候，突然攻擊香港

、新加坡與菲列濱，使奧美受到不少意外的打擊。自中英美締結同盟正式對德意日宣戰之後，這種舊孤立派的勢力也就逐漸縮小。可是最近又出現了一種新孤立主義，這種新孤立主義是和舊孤立主義一脈相通的；他們主張停止援英援蘇援華，先把美國自己的國防大大增強起來，等到蘇德、中日等國打得筋疲力竭的時候，他們再出來收拾時局。他們不會想到，如果英蘇中國抵抗不住（其實我們沒有外援，也要抗戰下去的），讓法西斯軸心國坐大起來，戰場就會移到美國去，益發不可收拾，可見這種新孤立主義，也是非常危險的。

不干涉政策的危險性，亦復如此。過去當德意法西斯聯合侵略西班牙的時候，他們以不干涉為號，標榜對德意法西斯讓步，抑制西班牙民主力量，可以保證歐洲的和平，所以由他們所主持的不干涉委員會，便以對德意侵略行動的不干涉，來完成其對西班牙共和國的干涉。結果西班牙的民主是給不干涉主義者絞死了，德意的法西斯力量是在西班牙站住腳跟了，一個更大規模的更殘酷的戰爭的火藥庫，也在庇里紐斯山脚安放下了。而英法和德國之間，終于免不了一場大戰，法蘭西且因此亡國，英倫海峽也受到納粹德國的砲擊。這就說明了不干涉政策和孤立主義一樣，決不能求得和平，反而招來了更大的禍端。

無論孤立主義也好，不干涉主義也好，它們和蘇聯的和平政策，都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蘇聯的和平政策，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維持和平的關係，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它的對方也要維持和平關係才行。它決不同和平主義者一樣，抽象地宣傳和平，籠統地反對戰爭。蘇聯知道在侵略與反侵略之間，在法西斯與反法西斯之間，決不能孤立，也不應孤立。因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一切侵略行動，不論其發動于何地，如果反侵略國家，不能趕快予以集體制裁和打擊，侵略戰禍必然會蔓延擴大起

來。基于這樣的立場，所以對於一九三〇年意大利擄取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三八年德意侵略者干涉西班牙，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中國，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吞併奧地利，以及同年由于慕尼黑會議而造成的捷克失地，最後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強佔捷克等等，蘇聯都會大聲疾呼，要求對侵略者予以制裁。蘇聯一向即堅決反對綏靖政策，而綏靖政策終于招致了慕尼黑會議的惡果。

說到不干涉政策，還需要解釋幾句。就是蘇聯的和平政策，決不主張干涉別國的內政，蘇聯也決不願意牽入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紛爭。但有一點它牢牢把握住，對於法西斯勢力向民主勢力的殘酷進攻，對於帝國主義向弱小民族的橫暴侵略，蘇聯是不能不干涉的。因為對於這種行動不加干涉，就等於放縱侵略，擴大戰爭。斯大林對於不干涉政策的批評，就可以表明蘇聯對於這種政策的態度。他說：「在事實上，不干涉政策乃是縱容侵略，擴大戰爭，因而也就是把它變成世界戰爭，在不干涉的政策中，浸透着一種傾向，一種願望——就是不妨礙侵略者去幹自己的黑暗勾當。譬如說，不妨礙日本糾纏于對華戰爭，更好是對蘇戰爭；譬如說，不妨礙德國陷身于歐洲事情和糾纏于對蘇戰爭。讓一切參戰國家都深深陷入戰爭泥淵，暗中慫恿他們這樣幹，讓他們彼此削弱，互相疲竭，然後，當他們已破充分而弱時，就拿着新鮮的力量出面活動——當然是一爲着和平——而出面活動，並迫令那些已陷于疲竭的參戰國來接受自己的條件」（見他在聯共第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這種不干涉政策，和上述孤立主義，原來就是嫡親的孿生子。這樣說來，蘇聯的和平政策，不但不同于不干涉政策，而且直接和它相懸隔，難道還不清楚嗎？

和平主義在弱國和殖民地的舞台裏邊，就是屈辱主義和投降主義。而其中最可恥的一種，就是中國漢奸汪逆精衛式的唯頭主義和賣國投降主義。他們以爲對法西斯侵略主義者讓步屈服，就可以得到

和平，而結果所得到的，却是更大的犧牲和更悲慘的奴役。我們只要舉出汪逆精衛南京漢奸黨在日和華北國庫的假面具之下，如何幫助日寇來搜括淪陷區的中國資源和人力，如何幫助日寇來實行以誘養誘以華制華的政策，就可懂得這種屈辱和平，對於真正的世界和平與人類正義是何等危害了。這蘇聯所知，蘇聯的和平政策，與這種屈辱投降政策，也無半點相同之處。因為蘇聯的和平政策是明明規定着：『我們不怕那些來自侵略者方面的威脅，並準備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企圖進犯蘇聯國界神聖性的挑戰者的打擊』。而且在事實上，蘇聯也有充分力量來實行這種規定，堅決打擊侵略者，以保護他們的祖國。三年來在抗德戰爭中，蘇聯紅軍與全國人民，表現出了史無前例的英勇犧牲，創造了蘇聯大英雄保衛戰的人間奇蹟，打破了希特勒德國的侵略計劃。所以蘇聯的和平政策，包含着最生動的反侵略因素，這已經不是紙上的論綱，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動事實了。

第三章 蘇聯外交政策底動力和依據

第一節 蘇聯自己底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的提高

如果說帝國主義的外交尙且不能完全依靠詭譎來取勝，而必須有它們自己的實力作後盾；那末蘇聯的外交，就更加不能空談取巧，必須依據它們自己與日俱增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實力，鞏固是有決定作用的經濟力量。差不多在蘇維埃國家成立的初期，列寧便已說過，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建設，具有深刻的國際重要性，蘇維埃政權於經濟建設中所採取的每一個前進步驟，都不可避免要引起資本主義國家各階層的強烈的回聲。列寧說：

「現在我們影響世界革命，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每個人都望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內的全體勞動者，沒有例外，也沒有誇大。這種事現在已經實現了。在這一方面，這種鬥爭已經具有世界範圍。假使在這一工作中，我們能獲得勝利；那末，我們最終一定能在全世界範圍上得到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在這一條戰線上，我們要繼續的，逐漸的爭取勝利——這是不能很快地做得到的——只能切實地向前和向上推進」（見全集第二十六卷四百一頁）。

列寧說這些話的時候，還是蘇俄剛才結束反對干涉主義者的戰爭，由武裝鬥爭轉到經濟建設的時期。從那時起經過了許多年，事實證明：蘇維埃政府在經濟建設領域內所採取的每個步驟，都著著按照列寧所指示的方針去做的。但是，最顯著證實列寧的指示正確性的，要算是總設的五年計劃——這計劃的來源，它的發展和它的實現。五年計劃的成功，「把全世界分成兩個營壘：一方是蘇維埃社會主義

明咒它們的人們，和見着蘇聯建設計劃勝利而恐慌的人們；另一方面，這就是世界進步人民的營壘，站在這個營壘裏的人們，對於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功是歡欣鼓舞的，他們愈同情蘇聯，愈感到自己地位變革的必要；而他們愈感到自己地位變革的必要，就愈仰望蘇聯」。所以蘇聯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是確實難以衡量的。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就在於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從一個脆弱的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而不依賴世界資本主義；在於把蘇聯變成一個工業國家，完全驅逐資本主義的原素，擴大經濟的社會主義形式的陣綽，以便廢除國內階級的經濟基礎，建立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在於建立一種工業，能夠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不僅改造整個工業而予以新的設備，並且改造交通與農業；在於把小規模的散漫的農業，轉到大規模的集體的經濟，這樣便可於農村樹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成爲不可能；在於創立絕對必須的技術上的與經濟上的種種前提，來增加保衛國家的防禦能力到極大的限度，務必担保外來的武裝干涉，外來的軍事進攻的任何企圖，都將受到擊決的擊退。蘇聯實行五年計劃的結果，把這些主要任務實現了。

固然，五年計劃的整個計劃，還有某些部分沒有完成，其原因，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報告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時曾有所說明：「是由於鄰國拒絕和蘇聯簽定不侵犯條約，並且遠東的糾紛日益嚴重（指九一八事變後日寇的侵略行動——引者註），蘇聯不得不把某種企業儘可能地迅速地改造成現代的防禦武器，來增厚蘇聯的防禦力量。因情勢的需要，使蘇聯不得不作某種準備，使有些工廠停止製造生產品，經歷四個月的光陰，因此影響了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的總生產的完成。這一改變的結果，完全補足了國防能力上的缺憾。把蘇聯從一個虛弱的、毫無防禦能力的國家，改變成爲一個防禦力強

大的國家，一個準備應付任何事變的國家，一個在外來攻擊時能大量生產一切近代防禦武器供給它自己的軍隊需要的國家」。如果不過樣做，斯大林解釋道：「或許就不能有一切現代的防禦武器，沒有這個，國家的獨立是不可能的；沒有這個，我國（指蘇聯）便變成了國外敵人的戰爭活動的目的物。那時我國的地位，或許和中國差不多，自己既沒有重工業，也沒有軍事工業，只好任人宰割罷了。總括一句：在那樣的場合中，我們會受武裝干涉，決不會有什麼不侵犯條約，只有戰爭，非常殘酷的戰爭，而且是不平等的血戰，因為我們沒有武裝，而敵人則有一切現代的進攻武裝」。『我們不知道帝國主義者在那一天來進攻蘇聯，來阻撓我們的建設工作。它們認為適當的時候就來進攻，並且同時利用我們的技術上與經濟上的弱點，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黨（指聯共）只得推動國人，以免虛耗時間，他們必須從早利用「喘息」的時間，來建立蘇聯工業化的基礎，這基礎成為蘇聯權力的根據。黨沒有等待與敷衍的可能。它必須提高速度到最大的限度，黨必須在最短時期內補救國防方面的弱點。目前的形勢。資本主義國家軍備的發展，縮減軍備的失敗，國際資產階級對於蘇聯的仇視，這一切逼迫我們黨不得不努力加強國防力，這是國家獨立的基礎」。

由於蘇聯人民建設的熱忱與積極性的提高，以及正確的領導，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完成，蘇聯已變成了經濟上獨立的國家，它保證了本國經濟和國防設備以一切必要的技術武裝。在德蘇戰爭之前，蘇聯工業按其發展速度說來，已佔全世界第一位。當各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經過一九二九年末開始的最嚴重經濟危機以後，在一九二七年仍未達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百分之一百零二點五，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又在新危機打擊之下而往下瀆落時，而蘇聯工業在一九三七年却已達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百分之一百零二點八，這和戰前（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水平比較起來，是表明工業出產量增至八倍以上。

在一九三八年，蘇聯工業出產量又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點三，並因此而達到了一九二九年水平百分之四百七十七，而同時在資本主義各國家裏，工業出產量在一九三八年却又比上年減少百分之十三點五，而減低到了一九二九年水平百分之九十。在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〇年，蘇聯工業出產量，均較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一，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及比薩拉比亞與各新蘇維埃共和國之工業，尚未計算在內。現在，當蘇聯已決定為社會主義國家，已在基本上完成了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事業，並按工業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已超過歐洲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時，在它們正在實施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又提出并實現解決新的蘇聯底基本經濟任務：就是在經濟方面按每個人口為單位來計算，也趕上并超過歐洲那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國。

為要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蘇聯採取了什麼步驟呢？首先就是強化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底技術武裝，極力發展機器製造業和全部重工業，堅決改善生產底整個組織和工藝手續以及廣闊應用最新科學成果和最新發明，使生產幹部在數量上，特別在質量上向前增長，使之更高度地精通工業、運輸業和農業方面的技術，極力擴展社會主義競賽和斯泰漢諾夫運動，並一往直前地鞏固一切企業的一切機關以及一切集體農場中的勞動紀律，不斷提高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有為社會主義所應有的高度勞動生產率。

蘇聯這種生產速度的增長，在戰爭中特別表現得明顯。據美國名記者史諾在「紅軍冬季攻勢的生產基礎」一文中所報導：「斯大林格勒的史詩和蘇聯的冬季攻勢，是從蘇聯工廠開始的一種組織的奇蹟的確定表現。蘇聯人民在這裏曾經日以繼夜地工作着，到現在已經變成一種瘋狂的速度了，據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勞工、動力和雇用組主任卡爾莫洛夫說：在一九四三年，蘇聯所有產業的和熟練的工人

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多。雖然他們的重大損失也許除了中國之外，沒有別的國家能比得上，蘇聯現在出產的飛機和其他的軍火都比戰前多，蘇聯已經從人民生活上的休息、娛樂和享受中儘可能地抽取每一分鐘和每一滴人力和馬力以貢獻于戰爭的生產。蘇聯在工業戰綫上的勝利，是由于他的工人們了解他們的危機，由于政府知道什麼是得救的必要步驟，和由於十六個加盟共和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被動員起來以實現一個單一的計劃，網羅比以前任何時候用以打擊一個侵略者的更多的人民和更多的土地。依照蘇聯最高國防會議所訂的總計劃，新建設和再建設，同樣有效地防阻納粹匪徒對於數世代的人手所建立起來的事物的有計劃破壞，迅速和更迅速是這個國家對於敵人所犯的罪行的回答，一九四二年這裏的戰爭工業最特出的發展。是工人和工廠的全國生產競賽運動」。

蘇聯在政治建設方面的最大成就，就是蘇聯業已實施斯大林憲法，成爲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蘇聯新憲法構成的主要基礎，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的主要基石，已經獲得了的和已經實行了的：對於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以及相因而至的：剝削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大多數人貧困和少數人揮霍的現象的消滅，失業現象的消滅。在蘇聯，一方面，勞動是每個有工作能力的公民底義務和光榮的職責，「不勞動者不得食」，已經成爲大家所必須遵守的社會信條；而同時，勞動又是每個公民的神聖權利，事實上，在蘇聯因爲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由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所鞏固，所以每個公民也就獲得了工作保障的權利。除了勞動的權利，他們又獲得了享受休息、教育、娛樂、運動等權利。蘇聯新憲法依據於這些和類似這些的社會主義基石，它反映這些東西，並把它們用立法的方法鞏固起來。蘇聯新憲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他的一貫的、澈底的民主主義。從民主主義觀點看來，資產階級憲法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直接

否認公民的平等權利和民主自由；或者實際把這些權利與自由變爲烏有；另一類是在表面上樂意接受甚至標榜民主主義的原則，但在實際上却加上一些條件與限制，使得民主權利與自由根本殘缺不全。他們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選舉權，但是，馬上加上一些居住年限、教育程度，甚至財產標準等的限制；他們說，一切公民有平等權利，但是馬上附加說，女子或一部份是除外的，還有其他但書等等。蘇聯新憲法的特點，就在於它把諸如此類的條件和限制統統拋棄。在蘇聯新憲法面前，一切公民都是積極的平等的。它不承認在男和女、久居和暫居、有財產和沒有財產、受過教育和未受過教育等之間有權利上的差別。在蘇聯，決定每個公民在社會上的地位的東西，不是財產狀況，不是民族區別，不是性別，不是工作地位，而是各人的能力和各人的勞動。

資產階級的憲法，通常僅限於規定公民形式上的權利，而不注意實行這些權利的條件，這些權利實現的物質條件。說公民平等，可是忘記如果資本家與地主在社會上握有財富和政治勢力，而工人與農民則被剝奪了財富和政治權利；如果資本家和地主是剝削者，而工人和農民是被剝削者；那末，僱主與工人之間，地主與農民之間，是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或者再說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可是忘記了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可能支配適當的會場、好的印刷廠、充分的紙張等；那末，這些權利，對於勞動人民，也就變成了有名無實的東西。至於說到法西斯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日本這些國家，那當然更不用說，都是赤裸裸的暴君專制和特務統治，就連形式上的民主權利，也不容許存在的。蘇聯新憲法的特點，就在於不僅規定了公民的形式上的權利，而且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的問題上。它不是簡單的宣布公民的平等權利，而且用立法的方法鞏固已獲得的制廢除濫用了的事實。一切公民已擺脫一切剝削的事實來保障公民權利的平等。它不是簡單宣布勞

動權，而且用立法的方法鞏固在蘇維埃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消滅失業現象的事實，來保障勞動權。它不是簡單的宣布民主自由，而是用立法的方法保證它，用一定的物質條件保證它。因此，很明顯的，蘇聯的民主政治，並不是通常的，一般的民主政治，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只有這種民主政治才能提供國民以無窮的力量，保證政府能够有恃無恐的去推行它的外交政策。

不僅如此，蘇聯領袖們還經常警告他們的人民：不要被建設的勝利衝昏了頭腦，不要忘記了經濟勝利的黑暗面，要防止政治上的鬆懈和市儈的偷安。「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面的勝利，確實是很大的勝利，但是像世界上一切事情一樣，也有它的黑暗面。這就是說有些人對於政治不大關心，眼光狹窄，看着不斷勝利的情况——節節勝利，處處成功，計劃實行有了超過，他們看了這些遂產生了麻木和自滿的情緒，造成慶祝勝利和互相恭維的空氣，這樣，便減低了我們的靈敏性，使我們的政治感覺，遲鈍起來，使人們迷惑，使人們去尋找清閒自在。並不奇怪，在這種空氣下面，自驕自滿，慶祝歡呼，衝昏了大家的頭腦，以致對於國家的命運，有頭等意義的一些基本問題，也忘記了。對於一些不好的現象，如資本主義的包圍，破壞的新形式和勝利中的危險性等等也忘記了。」「應該知道：在蘇聯被推翻了階級的殘餘，並不是孤立的，他們有蘇聯外面敵人的直接幫助，如果說階級鬥爭，僅限制在蘇聯的範圍以內，這是錯誤的。如果說階級鬥爭的行動，一端是在蘇聯的範圍內，那末另外一端，則在我們周圍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內，被推翻了階級的殘餘，是了解這點的。正是因為他們知道這種情形，所以他們要繼續作絕望的掙扎」。當基洛夫被暗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和托洛斯基——季諾維夫反革命聯盟案發生的時候（一九三五年），斯大林都會這樣提出警告過，並再三提出必須切實糾正對政治麻木的現象，和粉碎一切掩護這種現象的腐朽理論。

有一種腐朽的理論這樣說：「只要我們有系統的執行經濟計劃，就可使敵人破壞的行動和破壞的結果等於零」。斯大林堅決反對這種理論說：「這樣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我們的工作同志，養成潔身自愛的性情，緩和並削弱他們對於破壞者的鬥爭。可是如果破壞者沒有被揭發沒有被驅逐的話，那末毫無疑問的，經濟計劃的執行，也不知要精到什麼程度，這點對於上述理論的近視作者，是不應忽視的。加以破壞者常時不是在和平的時候，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而是在戰爭的前夜和戰爭的中間，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上述理論的創造者，不想一想，如果我們被這種腐朽的理論蒙蔽着，不去對付這些破壞者，那末在戰爭的時候，這些破壞者就會給我們國家以如何重大的損害。這種理論，是對破壞者有利的理論，難道還不明顯嗎？」

另外又有一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托派破壞者，已經使用了其最後的幹部，再沒有更多的補充了」。斯大林對於這種理論，亦表示堅決的反對，認為：「只有無知的人，才會想出這樣的理論來。他們不知道，托派的破壞者，是有他們的補充的。首先便是蘇聯內部被推翻了的統治者的殘餘，還有就是蘇聯外面約，許多仇視蘇聯的集團和組織。例如托洛斯基反革命的第四國際三分之二的成份，是偵探或危害者，難道這不是補充嗎？這個敵探國際將要分派他們的幹部，到蘇聯來進行偵探和破壞的工作，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又如挪威的塞夫洛派，他們把托洛斯基招待在他們的客裏，並且幫助托洛斯基來破壞蘇聯，這難道也不是補充的來源嗎？誰也不能否認，這個反革命的集團，以後還要替托派的偵探破壞者服務；另外一個例子，在法國也有同塞夫洛派類似的蘇法林派，難道這不是補充嗎？在反蘇聯的偵探破壞工作中，誰能否認蘇法林派也要給托派以幫助呢！德國的魯特菲雪爾、馬史洛夫、烏爾班斯之流的先生們，他們把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賣給法西斯蒂，難道這不是托派偵探破壞工

作的補充嗎？又加以著名流氓依斯德曼爲首的美國一小羣作家，用他們發狂的筆尖來專門誹謗蘇聯工人階級，並且以此爲生，這難道他們不是托洛斯基主義的補充嗎？

蘇聯領導者揭發了經濟建設中一部份人所犯的政治麻木病，切實糾正了掩護這種麻木病的各種腐朽理論，並在積極方面提出了加強政治教育的具體方針，號召全國人民應隨時注意國內和國際性質的政治問題。這些措施，無疑的也就提高了蘇聯在施行外交政策時的政治力量。

基於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蘇聯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亦有極顯著的發展。在革命以前的帝俄，曾有五萬四千二百所教會，二萬三千六百所禮拜堂，九百五十所寺院，五萬一千一百名各級牧師，一萬五千名教堂執事，四萬六千五百名的教堂女執事，兩萬九千一百名僧侶。他們在民衆中間，傳播愚昧、迷信、野蠻主義，麻醉勞苦大眾的頭腦，訓練人民去服從剝削階級。經過十月革命後社會基礎的變動，幾次五年計劃建設的成功，使蘇聯的文化水準已經大爲提高。例如以一九四〇年的統計來看，在蘇聯，業已創辦了二千九百六十幾所戲院，三萬一千六百所電影院，八萬五千七百所俱樂部，一千二百三十所博物館，七萬三千四百所民衆圖書館，全國每天印行的報紙有五千七百餘萬份，每年出版的書籍有七十五萬萬冊，雜誌有五千多種。蘇聯工農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知識，已經將文盲消滅，實現了真正的文化革命。在革命前的俄國，總共只有九十一個大學，而到一九四〇年，已經有了一千八百個大學和學院。過去的專門學校，只有二百三十三個，到一九四〇年，已經達到五千多個。初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的學生數量，已經由三百萬人增至一千二百萬人；高級學校裏的學生數量，則由十萬人增至一百五十五萬人。而且由於整個巨大文化工作的結果，現在蘇聯已經形成了形成了人數衆多的、新的蘇維埃的知識份子羣，這個知識份子羣是由工人階級、農民以及蘇維埃職員隊伍中出身的。

是和蘇聯人民彼此血肉相連的。這個新知識份子羣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剝削階級，而是仇恨剝削者和僥倖者，並準備着忠誠效勞於蘇聯各族人民。這種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羣之誕生，乃是蘇聯文化革命底最重要成果之一。總之，蘇聯正在利用精神生產的國有工具，大規模地向人民大眾進行政治的及一般的教育工作，並在國際主義的工農階級基礎上極力發展各民族語言文化，以便更進一步來建設和擴展社會主義的新文化。而這種文化力量的提高，又轉而助長蘇聯經濟政治建設的猛進，更進一步吸引全世界被壓迫與一切先進人類圍繞着蘇聯，因而也就保障了蘇聯的對外政策能够勝利地推行。

第二節 蘇維埃社會之精神上的統一

蘇維埃的民主，不僅表示全體人民的參加政權的選舉，管理國事；而且表示民衆活潑而獨立的參加一切社會生活。比如一切集體農民，都參加自己的集體農場的管理；農業勞動組合的章程，可說是集體農場的「憲法」。一切工人和機關僱員，人人都加入解決自身問題的職工會。各種自願結合的會社，其會員在蘇聯往往達數百萬之多。青年學生也有自己的組織，他們過着獨立的生活。一九三六年通過實施的新憲法，更明文規定一切公民有加入各社會組織之權，並允許各社會組織得正面影響國家政權的構成和活動。新憲法保證各社會團體在蘇維埃選舉時，都有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之權。新憲法的實施，表示着蘇維埃民主的擴大、發展及欣欣向榮。

英國政治學權威拉斯基教授講到蘇維埃民主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樣幾句話：「要用簡單的方法說明社會主義的國家和法西斯國家之間的相反，只須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是根據於希望，法西斯國家的政治却根據於恐懼。社會主義的勝利，增加對於平民的信任。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愈完全，所給

與平民的自由也愈廣大」。拉斯基教授這段話不是虛構的，是根據事實說的。「增加對於平民的信仰」，「所給與平民的自由愈廣大」，正是蘇維埃社會精神之寫真。

蘇聯這樣廣泛的民主的社會生活，在任何其他國家裏是沒有的。這樣廣泛的民主的社會生活，只有在新的政權的基礎上面，才能出現和展開。社會主義制度，是以一切勞動者的親睦參加共同工作為基礎，它要求人與人間需要有親睦友好的關係。在蘇聯，男女是完全平等的。在革命後，蘇維埃政權不僅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男女完全平等，而且極力設法吸引婦女參加社會的和政治的工作。列寧有一句名言：「不吸引婦女參加，便不能展開革命，便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隨着大規模建設事業的猛進，隨着民衆幸福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蘇聯婦女在事實上的的確確一天天從家庭工作下解放了出來。托兒所，幼稚園，兒童公育，公共飯堂，麵包廠，洗衣所等的設立和普及，在在使婦女解除了家務工作。

這種蘇維埃社會的特有精神，特別明顯地在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運動中表現了出來。社會主義競賽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它根本改變了民衆對於勞動的態度，把勞動人民重新加以訓練，洗去了他們數千年來的私有殘餘和偏見惡瘡。在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中，生長了新的人——社會主義新社會的人。斯大林說道：「競賽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它使民衆對勞動的觀點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因為從前視勞動為可恥而苦重的負擔，現在它把勞動變成了正義的事業，變成了光榮的事業，變成了果敢英勇的事業。這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蘇聯已推翻了資本家和地主，勞動人民都知道自己是為了自己而工作。自己作得多，作得好，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便可進步得快些，因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很快的改善。所以，蘇聯勞動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競賽，都極感興趣。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這種社會主義競賽形成了一種極廣大的浪潮。第一次五年計劃所以能提早一年完成。

社會主義競賽運動的開展，是一個很重要的積極因素。

一九三五年秋季，基於社會主義競賽，蘇聯又開始了一種新的運動，其創始者名字叫斯泰漢諾夫，故把這一運動稱為斯泰漢諾夫運動。它配合了過去數年的一切成就，而把社會主義競賽提高到一個新的更高階段。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更高形態——斯泰漢諾夫運動，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下面，才能產生。在斯泰漢諾夫運動中，特別有力而明瞭地表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於資本主義體系。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人勞動不是爲自己，而是爲了生活所迫，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廉價的出賣，勞動的結果，使少數人富者愈富，而大多數人則貧者愈貧；而在蘇聯，則因消滅了榨取，情形當然完全不同了。這裏工人都知道，他們不是爲榨取者工作，乃是爲了自己，爲了社會而工作。所以，蘇聯勞動人民對於工作都採取積極的態度，都把勞動看作是光榮的職業。

語言永遠是在歷史的掌握中，字句在每一個新的時代，改變着自己的含義。例如，就拿蘇聯工人階級來說罷，人們往往照舊叫它「無產階級」。但是，什麼是無產階級呢？照科學的觀點來說，無產階級是在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的經濟系統之下，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因而被資本家階級剝削的階級。但在蘇聯，則如衆所周知，資本家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已經從資本家手中取來交給國家，而這個國家的領導力量便是工人階級。因此，蘇聯的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相反地，它與全體人民一起掌握着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既然它掌握着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又已消滅，就絕對沒有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了。在這樣情形之下，還能把蘇聯的工人階級叫做無產階級麼？顯然是不能的。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必須粉碎資本家，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消滅產生無產階級的生产條件」。

能不能說蘇聯工人階級已經實現了解放自己的這些條件呢？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蘇聯無產階級變成了完全新的階級，變成了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保證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並使蘇維埃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蘇聯工人階級。由此可見，蘇聯的工人階級，乃是完全新的擺脫了剝削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同樣，說到農民的問題，照通常的概念說，農民是這樣一種小生產者階級，這些小生產者，好像一盤散沙，散佈在全國的地面上，各自在自己小的經濟單位上，用落後的技術耕種土地，這些小生產者，就是私有制度的奴隸，就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所任意剝削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及殖民地國家的農民，如就它的基本羣衆說，就正是這樣的階級。能不能說蘇聯現時的農民與這樣的農民相像呢？不能，不能這樣說。這樣的農民，在蘇聯已經沒有了。現在蘇維埃的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蘇聯已經沒有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也沒有商業資本家與高利貸者了。因此，蘇聯的農民，已經是擺脫了剝削的農民。而且蘇維埃農民的數大多數，已經是集體農場的農民，即是他們自己的工作財產，不依靠個體勞動和落後技術，而是依靠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最後，蘇聯農民的經濟基礎，已經不是私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集體所有制。由此可見，蘇維埃農民，還完全是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再講到知識份子的問題，講到工程師和技術工作人員、文化工作人員和一般的職員等的問題。在這一時期，蘇聯的知識份子同樣有了大的改變。這已經不是那舊的落後的知識份子，這些舊的知識份子，企圖把自己看作是超階級的特殊人物，而實際上他們大多數是替地主和資本家效勞的。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在外國武裝干涉被粉碎以後，特別是工業化和集體化事業勝利以後，當剝削制之

被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奠定，已造成實在可能來給予國家以新憲法，並實施新憲法的時候，知識份子底情形就根本改變了。現在蘇維埃的知識份子，這是完全新的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連的知識份子。首先，知識份子的成份改變了。在蘇聯知識份子中，由舊時代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已經剩得很少。現在蘇聯知識份子，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從工人階級、農民和其他勞動階層出身的。同時，蘇聯知識份子活動的質性也改變了。以前他們是必須替富人階級服務勞力；因為除此以外，他們便沒有別的出路。現在他們替人民服務，因為剝削階級已經不存在了。正因為這樣，他們現在是蘇維埃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在蘇維埃社會中，知識份子與工人農民攜手並進，建設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由此可見，這完全是新的勞動的知識份子，這樣的知識份子，現在還只有蘇聯才能大量產生和深廣發展。

這些改變，說明什麼？第一，說明在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以及這兩個階級與知識份子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中；而舊的階級的特性，也正在消滅中。這就是說，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的距離，正在一天一天的縮短。第二，說明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的經濟上的矛盾，正在降弱，正在消失。最後，說明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的政治上的矛盾，也同樣正在降弱，正在消失。

這種蘇聯社會階級結構方面之改變，以及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之奠定，工業和農業之高涨，勞動者物質生活狀況之增高，民眾文化程度之提高，民眾政治積極性之提高，——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蘇維埃政權領導之下實現的，結果就不能不使蘇維埃制度更加堅固起來。

蘇聯社會別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就是在蘇維埃社會裏，彼此對抗的、彼此敵視的階級已經不復存在，剝削者階級已被消滅，而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以及知識份子，則在友愛合

作基礎上生活着和工作着。正是在這個共同性基礎上，就使蘇聯社會底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愈趨鞏固。同樣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通過的蘇聯新憲法⁽¹⁾以及根據這個新憲法使蘇維埃各級機關選舉制的完全民主化。蘇聯社會精神上政治上的這種統一性，最明顯地表現在蘇聯最高機關底選舉本身。例如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時，投票贊成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的，幾乎有九千萬個選舉人，就是說，等於曾參加投票的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而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選舉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時，投票贊成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的，則有九千二百萬個選舉人，就是說，等於曾參加投票的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蘇維埃制度之所以堅實牢固，蘇維埃政權力量的所以源源不絕，其基礎，其根據，就在這裏。而這也就可以說明，為什麼在這次德蘇戰爭中，蘇聯全國軍民，不分男女，不分老幼，都團結一致，說所謂合二萬萬人的心為一心，集二萬萬人的力為大力，大家都能一德一心，羣策羣力，為擊敗希特勒，保衛祖國而奮鬥。

有人曾經捕風捉影似的說：蘇聯消除托洛斯基份子，會「瓦解」，或者說，會「動搖蘇維埃制度」，這當然是不合事實的揣測。因而對此抱有希冀的人，結果終不免於失望。斯大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明確的。他說：

「從蘇維埃組織裏把暗害份子和敵探份子消除出去，這怎麼會能動搖和瓦解蘇維埃制度呢？托洛斯基——布哈林份子這一小夥間諜、兇手、暗害份子，這一小夥總是在外國侵犯者面前奴顏婢膝的賤人，這一小夥總是在每一個外國官老爺面前俯伏跪拜，甘願投奔到他那裏去擔任間諜勤務的奴才，——這一小夥不懂得每個已擺脫資本枷鎖的最平常蘇維埃公民，都比外國任何一個背着資本奴隸制枷鎖的大官顯宦都高尚得多的人們，——這樣一個小得可憐的賣國奴匪幫，究竟能瓦解誰呢？一

一九三七年，杜赫契夫斯基、雅其爾、烏波列維奇以及其他暴徒，被判決槍斃。在此以後，我們就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結果，給了蘇維埃政權以全體參加投票者總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一九三八年，羅津果里次、李可夫、布哈林以及其他暴徒，被判決槍斃。在此以後，我們就進行了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結果，給了蘇維埃政權以全體參加投票者總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試問這裏有什麼「瓦解」標誌呢？爲什麼這個「瓦解」竟沒有反映到選舉結果中來呢？如果說從蘇維埃組織裏把間諜、兇手、暗害份子清除出去，這會應當使，而且確實已使這些組織更加鞏固起來——如果這樣說，豈不是更正確嗎？張鼓峯事件——舉例來說——豈不正是說明從蘇維埃組織裏把間諜和暗害份子清除出去，這乃是鞏固這些組織的最可靠的手段嗎？（見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大會總結報告）。

又有些人以爲社會主義社會否認個人的自由，蘇維埃社會這種精神和政治上的統一，就是表示他們沒有個人的自由，這也是一種誤會。蘇聯所以建成這種社會主義社會，爲的是真正的個人自由，不是括弧裏的自由。失業的人，飢寒交迫，找不到工做，一切都受着限制和束縛，那裏有什麼個人的自由！只有在剝削制被取消了的地方，在沒有人壓迫人的地方，在沒有失業與貧窮的地方，在人們並不担憂明天會失掉工作、住宅、飯碗的地方，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這種社會裏，才可以有真正的，而不是紙上的個人自由。

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現時是由兩個彼此友愛的階級——工人和農民——所組成的，在這兩個階級之間的界限，以及在這兩個階級和知識份子之間的界限，是在消失着，是在逐漸泯滅着。蘇聯勞動者底絕大多數，乃是無階級社會底積極的和自覺的建設者。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保證了那從前無論

在什麼地方都未看見的人民內部的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勞動者在蘇維埃政權旗幟下和領導下的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這個統一，保證蘇聯在往前發展中一切內外政策之勝利的完成。

第三節 蘇聯各民族人民底友誼和團結

帝俄以「民族之牢獄」著名於全世界。在這「民族之牢獄」裏面，人口的一半左右，則是非俄羅斯人。將近有二百種民族，受着殘酷的榨取和民族的壓迫。尤其在邊疆區域，民族的壓迫更其厲害。帝俄政府和支配階級曾有系統地掠奪這些邊疆的人民。政府把克爾吉斯、巴什克爾、韃靼及其他民族農民的土地，用暴力侵奪，轉交給俄國地主。被掠奪的民族，註定了飢餓、貧困及死亡。民族的邊疆，變成了俄國工業的低廉原料來源。俄國商人和廠主，從土耳其斯坦得到棉花，從高加索得到鐵礦、石油，從西伯利亞得到木材、小麥和黃金。同時俄國資本家把這些邊疆則變成推銷自己商品的市場。

帝俄政府爲了保持被壓迫民族對俄國地主資本家的依賴性，便不許當地工業的發展，而有意地阻止各民族和邊疆經濟的發展。同時，帝俄政府爲了在彼征服的區域，實施掠奪，則設置了特別殘酷的警察制度，官吏橫行，恣意屠殺。在被壓迫民族區域的勞動人民，更被剝奪了一切權利。俄皇的官吏和正教的牧師，則實施俄國境內各民族「俄羅斯化」的政策，壓制他們的文化，用暴力推行俄語和正教。再次，爲了駕馭衆多的被奴役的民族，爲了叫民眾不要反對俄皇的暴行和壓迫，俄國的統治階級則挑撥各、族間的內訌，在各民族的勞動大眾當中散播仇視和糾紛的種子。他們常常挑撥亞美尼亞人和韃靼人、烏茲別克人和土克門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發生流血的鬥爭。總之，帝俄時代經濟的政治的壓迫，阻止着各民族經濟的和文化的發展。鞭笞和屠殺，這就是帝俄民族政策的基礎。帝俄時代，

無數民族，曾經在這個「民族之牢獄」裏面萎萎，死亡了，他們對專制的判罰和暴力制度，養成了極端憎恨的心理。

十月革命的勝利，整個兒地解放了俄國境內的一切民族。俄羅斯從「民族之牢獄」變成了各平等民族的自由聯邦。十月革命消滅了全部畸形的支配被壓迫民族的暴力體系，它廢除了一切限制弱小民族權利的法律。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數日，列寧和斯大林便代表蘇維埃政府署名，發表了一個俄羅斯民族權利宣言，宣布革命政權的民族政策的原則：「（一）俄羅斯各民族平等自主；（二）俄羅斯各民族有自由自決，乃至分離、成立獨立國家之權；（三）廢除一切所有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權和限制；（四）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和部落自由發展」。隨後列寧和斯大林又聯合署名，發表了告東方各民族書，號召俄國境內的回族人、伏爾加流域和克里米亞的鞑靼人，西伯利亞和土耳其斯坦的克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南高加索的突厥人和韃靼人，高加索的切爾克斯人和戈爾茨人，都可以獲得自由而毫無阻礙地建立本民族生活之權，他們的權利，和俄國境內的其他民族一樣，都受革命及其機關所有力量的保護。

但是單單宣佈民族的權利，還不足以解決民族問題。從前被壓迫的各民族，在其經濟的發展上，極為落後。所以，問題是：怎樣把所宣布的政策實行起來，變為事實。換句話說，怎樣把各落後的民族提高到更高一級的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上，而造成各民族的事實上的平等。據統計，居住在蘇聯境內的大小民族，共有一百九十餘種之多，所用語言達一百五十餘種。人口共計為一萬萬九千餘萬，其中俄羅斯人佔八千六百萬，烏克蘭人約為四千萬，白俄羅斯人八百萬，烏茲別克人四百萬，哥薩克人四百萬，韃靼人約三百萬，猶太人約二百五十萬，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突厥人各約二百萬，餘

爲其他民族。在政治上，蘇維埃政權爲了適應這樣複雜的民族生活，就在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先後成立了好多獨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在獨立共和國之下，又成立自治共和國，自治特別區，民族區。在每個獨立共和國或自治的單位以內，各民族經濟和文化都得獨立的發展。

國家組織形式，各少數民族互有不同，其區別係取決於各民族的生活條件。一切國家形式都是富有彈性，都能够從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都能够從自治區過渡到自治共和國，都能够從自治共和國過渡到聯邦共和國。所有這些，都代表蘇維埃政權的民族形式。蘇維埃政權考慮各地條件以後，在某種民族裏面，運用某種國家組織形式，以便教育訓練它們的勞動人民，並使它們參加國家管理及生產，以便推進它們爲全面展開本身的文化及經濟發展而鬥爭，以便建立它們國際友誼的鞏固基礎。

十月革命以後，烏克蘭、白俄羅斯、南高加索，都首先獨立，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內亂削平後，爲了迅速地恢復破壞不堪的經濟和保障革命的勝利，這三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於一九二三年，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簡稱的蘇聯。但蘇聯的成立，並未妨礙各民族經濟文化生活獨立的發展。僅外交、軍事、交通等需要統一的行政，歸蘇聯管轄外，而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內政如文化教育、衛生、司法等事業，都是自由獨立發展的。一九二四年，中亞細亞反革命勢力瀰漫，烏茲別克和土克門兩民族都成立了獨立共和國，加入蘇聯。一九二九年達吉克民族也從烏茲別克共和國分出，而成立獨立共和國，直接加入蘇聯。一九三六年，根據蘇聯新憲法，哥薩克和克爾吉斯兩個自治共和國（屬於蘇俄），都改爲獨立共和國。同時，從前組織高加索聯邦的喬治亞、阿才倍羅、亞美尼亞，也都改爲獨立共和國，加入蘇聯。一九三九年九月，波蘭被德國法西斯侵犯所瓦解，西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人民因得蘇聯紅軍

之助，得到解放，加入蘇聯。一九四〇年，立陶宛、拉特維亞與愛沙尼亞三國人民舉行革命政變，組成蘇維埃共和國，亦加入蘇聯。

在經濟上，蘇聯政府極力設法提高邊區落後民族經濟的幸禍，爲了在邊區開辦工廠、國營農場、鐵路、農業機器站，它投下了巨額的資本。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蘇俄舊有工業區域的工業產額，增加了兩倍；而在民族區域的共和國，則增加了三倍半。我們知道：空馮哥薩克草原，曾建築了土西鐵路（自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亞）；接着在中亞細亞，哥薩克及其他民族共和國，也建築起鐵路。此外，中亞細亞的大規模的紡織聯合廠，哥薩克巴勃哈什湖旁的龐大的新式鋼鐵廠，卡拉干達（在哥薩克）的新式煤礦；巴什吉爾，哥薩克及十克門的石油開採事業以及其他好多大規模的工廠，也都先後建築完成。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各民族共和國在工業化方面，更有着巨大的進步。烏克蘭的鋼鐵業，可以說已經逐漸地趕上了德國的鋼鐵業。在哥薩克北部，則生長了巨大的有色金屬冶鐵業和食物工業、銅廠、鋼廠、鋅廠、屠宰聯合廠、糖廠、麵粉廠、榨油廠等，不勝枚舉。在中亞細亞，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時，建造完竣的，有許多新的黨廠、石油、煤炭開採事業，強大的化學工業及有色金屬業（銅廠、鋅廠）等。在巴什吉爾，除了兩所強大的鋼鐵廠外，正在發展着的，有色金屬業，電氣機車廠、馬達廠、水力發動機廠，及食物工業等好多工廠。在南高加索，好多新的區域裏面，正在開採石油和煤炭開採事業，發展有色金屬業（銅、鉛）等，開辦鋼鐵廠（製造石油工業用鐵管）此外，還有許多化學廠，水門汀廠，紡織廠，纖維廠，食物廠等。比如喬治亞原爲帝俄的殖民地，在革命後已變成一個先進的農業共和國。其電力產額，跟戰前比較，竟增加了百分之三九五九。該國製錫工業，大加發展，且已改造一新。並創辦了好多石油提煉廠。化學工業，造紙工業，食物工業，也

都在發展着。專門的國營農場網，如種茶葉的，種煙草的，種橘柑的，也都廣泛地發展起來。在鞣鞣，則集中製造人造橡皮，各種建築材料、化學製品、木材等。

各民族共和國都建築了公路網，好多鐵路已經電氣化。在烏茲別克、土克門、及達吉克則建設了廣大的灌溉體系，使棉花的生產，達到空前未有的規模。巨大的遊牧和半遊牧民衆，都定居下來，而過集體農民的生活。棉產區域裏面，農戶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經集體化，在最近五年來，集體農場的收入，更有迅速增長，各民族的集體農民，已能享受文明而富裕的生活。這些成績證明：蘇聯境內從前那些落後的民族，由於正確的民族政策的實施，在經濟上已經大大進步起來。

蘇聯民族政策，在文化建設方面，是建立「民族共形式，社會主義其內容」的文化。蘇維埃政權給了各民族以極廣大的用他們的語言發展他們文化的機會，同時並幫助這些民族創辦先進的文化，排斥剝削方法和守舊的文化。蘇聯政府給各落後民族的教育補助費，年有增加。關於各民族共和國文化發展的情形，茲引若干數字於下，藉資證明。

比如烏茲別克在革命前，每個人口的每年國民教育經費，僅只二十五戈比，而現在則達四十盧布；土克門從前每個人口每年國民教育經費，爲五十戈比，而一九四〇年則爲五十盧布。烏茲別克在革命前，幾乎沒有識字的人；全部人口中識字的僅有百分之一·五，而且全是富有階級的子弟。到一九四〇年，識字的已達全體人口百分之九十一，兒童入學的已達百分之九十八，而在革命前只有百分之三。南高加索諸共和國——喬治亞，阿才倍羅，亞美尼亞，差不多已都成了全民識字的國家。僅在喬治亞共和國一國，自成立蘇維埃政權以來，在高等學校畢業的工程師、農藝家、醫師、教員等，已達二萬一千人以上。該國的戲院和電影院，已達七十二所。亞美尼亞的首都——葉里溫，居民在五十歲

以下的，都已識字。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八，已經識字。該國高等學校，共有十五所。阿才倍疆各級學校——小學、中學、大學——學生，共有一百九十萬名，而該國全國人口不過二百九十幾萬而已。該國現有大學十八所，革命前只有一所。中亞細亞各共和國，在革命前，根本沒有高等學校，而在這裏中學校求學的只是俄國僑民官吏和當地富有階級的子弟。現在這裏已有數十所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及數百所職業學校。

在革命前，有好多落後的民族，從沒有過任何學校，也沒有任何文學，到那裏去的精神統治者，乃是俄國去的各種牧師和僧侶。比如北方的各民族，就是這樣。他們被俄國資本主義殘酷剝削，而註定死亡。現在知識的光明，也深入於這些落後的民族。在遼遠的北方，也有了學校，出現了文字，出現了教師、醫師、合作社人員及作家。蘇聯政府在列寧格勒，曾辦了一所北方民族研究院，專給北方民族造就師資和其他幹部。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各城市大學和專門學校裏面，都有巨量各民族的青年在學習着。在各民族共和國和特別區裏面，創辦了數十所大學和專門學校。

各民族的出版物，也有廣大的發展。帝俄政府，不許用各民族語言文字，來出版日報、雜誌及書籍。只有宗教的書籍，才是例外。現在全蘇聯，已經找不出一個沒有印行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出版物的民族共和國。比如在亞美尼亞，在一九四〇年，就有日報七十二種，內中五十三種是用亞美尼亞語文印的。在白俄羅斯，在一九四〇年時，已有日報三百十四種，大多數都是用白俄羅斯語文印行的。又在西伯利亞的布雅特蒙古自治共和國，在革命前，只有一萬四千噉嘛在麻醉落後的遊牧人的頭腦；在知識之光也深入到這裏來：大學、職業學校、工人大學、俱樂部、戲院、電影院、圖書館、都無所不有了。在革命前，該自治共和國差不多沒有識字的人，僅少數富家子弟，識幾個字。現在識字的

已達人口百分之八十九，而男性識字的且已達百分之九十五。他們自己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技術人員、教育工作者人員，也逐漸產生出來。

當一九二四年蘇聯頒行第一個憲法的時候，各民族人民之間的關係，還沒有應有的和諧，小民族對於大俄羅斯民族不信任的殘餘，還沒有消滅，各民族的離心力還起着作用。當時需要在這些條件之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的互助基礎上來調整各民族人民底兄弟的合作，把他們聯合為一個多民族的聯盟國家。當時蘇維埃政權不能不看到在這一事業上的困難。它有了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建立多民族國家失敗的教訓。它有了舊奧、匈帝國失敗的經驗。然而它還是進行創立多民族的國家，因為它知道，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可以戰勝一切困難的。事實經過也正如他們所宣示的一樣。經過三到五年計劃的實行，與斯大林憲法的頒佈實行，毫無疑義的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經驗是完全成功了，這就是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毫無疑義的勝利了。

怎樣解釋這一勝利呢？因為現在的蘇聯已經沒有了剝削階級，而剝削階級是民族衝突的組織者；因為剷除了剝削，而剝削是培植民族相互猜忌和挑撥民族惡感的；因為有了工農階級的政權，而工農階級是反對奴役和剝削的，是希望各民族之間友愛合作的；因為真正實現了在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各民族人民相互的幫助；最後，因為發揮了蘇聯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形式為民族的，而內容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因為所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因素，就使得蘇聯各民族人民的面貌根本改變了。在他們之間，消失了互相猜忌的感覺，發展了互助友善的感覺；這樣，就培植了在統一的聯合國家系統中各民族的真正兄弟的合作。結果，現在就有完全創造成功了的，克服一切困難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的鞏固性，可以使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發生羨慕。

蘇聯各民族間親睦政策、友愛政策的成績，以及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底創造經過，大致如上所述。而且蘇聯各民族間的親睦關係，還正在增長着，還正在鞏固着。蘇維埃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顯然的，蘇聯各民族人民相互間這種友愛互助的關係，在對外政策上也有極重大的意義。斯大林說：「蘇聯各民族間的親睦友愛，是一個極大而嚴重的勝利。因為只要這一親睦友愛存在着，那末，蘇聯的各民族聯盟，便成了不可征服的力量。只要這一親睦友愛生存着，強健着；那末，不論國內的敵人，或國外的敵人，我們都不害怕了。」

現在蘇聯包括有十六個共和國及若干自治共和國和民族區，他們是和陸合作的大家庭，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而流汗，為抵抗法西斯主義而流血，這種事實是昭彰於世界人士之耳目，誰也不能憑空杜撰，誰也無法蒙蔽掩飾的。

第四節 強大的軍事國防力量

蘇聯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最愛和平的國家，然而因為他被敵視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是侵略好戰的法西斯主義的眼中釘，所以它經常所受的軍事進攻的威脅要比任何一國為大。這種條件，使蘇聯不得不建立自己強固的軍事國防力量，來捍衛自己祖國的邊陲，保障自己不受敵人的侵襲。倘竟不免遭受敵人的侵襲，也能有力量去擊退敵人。所以伏羅希洛夫說：「我們無論何時和無論如何，都一定應當擁有強大而牢不可破的工農紅軍和同樣強大而常勝的紅色海軍。因為只有紅軍和紅色海軍底經常的真正的戰鬥準備性，才能成爲避免那反對蘇聯的各種冒險的可靠保障。只有這樣，只有更加鞏固和更加完善的國防軍事力量，才能保護自己而擊退那想輕易取償於我國（蘇聯）以自肥的法西斯侵略者。」

，務使那想以軍事侵犯來破壞蘇維埃國家領土完整性的野蠻計劃。不備如此，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它根據自己建國的需要與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需要爭取世界的正義和平而反對非正義的戰爭。蘇聯紅軍的根本任務，既在反對侵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因此也就成了世界和平的柱石。工農紅軍是世界中最進步的軍隊，是先進人民的力量，而反侵略的和平外交政策是進步人類的事業；因此，工農紅軍愈強大，軍事國防愈堅固，蘇聯反侵略外交政策的推行，也就愈有勝利的希望和保證。

根據這樣的認識和立場，所以蘇聯對軍事國防與紅色陸海空軍的建設是不遺餘力的。根據伏羅希洛夫在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如果把一九三四年的紅軍人數作為百分之百；那末到一九三九年初，它的人數就是百分之二百零三，就是說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百零三，或者說整個軍隊已增至兩倍以上。步兵師的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的固定人數都有增加，如果從前紅軍每個步兵師底戰時編制人數為一萬三千人，那末到一九三九年初，每個步兵師則有一萬八千人。人數底增加，主要是由於加強砲兵武裝（自近射砲起，至師團砲止），是由於加強機關槍火力，同時也是由於加強各連突擊力，即增加每排戰鬥員人數的結果。這樣，紅軍每個正式步兵軍團，乃是頗有威力的戰鬥單位；它具有約近六萬個戰鬥員和相當的砲隊、坦克隊以及其他種武裝，連同各種各樣的勤務供應工具以及汽車運輸隊。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紅色騎兵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在這個期間，騎兵在技術設備方面的增加情形，有如下述：輕機關槍增加百分之三十，重機關槍增加百分之二十一，高射複合機關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大砲增加百分之四十三。除此以外，還創立了專門供騎兵用的高射砲隊，以便從空中來周密掩護它，把各騎兵師內的坦克團加強了百分之三十，並賦與它們以專門的鐵甲汽車部隊。

鐵甲汽車——坦克部隊底增加，有如下述：人員總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五。坦克部隊和坦克部隊集團，均已按其戰術的戰鬥的使命而完全改組了。坦克部隊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坦克總數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九十一，鐵甲汽車數量則增加至七倍半。同時，坦克部隊底機械部分也革新了，採用了各種新式坦克並改良了舊有的坦克，加強了它們的鐵甲保護及其特種裝置。坦克部隊底武裝，特別是他們的大砲武裝，已大大變更了。如果把坦克和鐵甲汽車所有各種軍器在一九三四年的發射量當作一百；那末，到一九三九年，它們的每一發射量則等於百分之三百九十三，就是說，坦克部隊發射量底火力，已比一九三四年增大四倍。再者，如果把蘇聯所有坦克在一九三四年的每分鐘火力當作百分之百；那末，到一九三九年時，這火力却已增至百分之三百三十四，就是說，增至幾及三倍半。在在這個時期以內，蘇聯紅軍的砲兵武裝，亦有很大的增長：輕砲（把反坦克砲和近射砲除外）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中等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重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高射砲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九。蘇聯的反坦克砲和坦克砲，在以前是發展得不充分的，而一九三九年，則已比其他各種大砲增長得更大了。在反坦克砲和坦克砲方面，蘇聯紅軍是用頭等武器所武裝起來的。從前，蘇聯幾乎沒有近射砲，到一九三九年，它們已創立了這種很重要的大砲（地雷發射器和迫擊砲），而且它們在軍隊武裝中已有這種大砲底必要數量和良好質量。隨着砲兵武裝在數量上的增加；同時，各種大砲的質量也提高了。除此以外，在砲兵部隊中，它們還根本改變了平射砲與曲射砲間的比例關係。曲射砲廣泛採用的增長程度，已等於百分之八十，這就是說，它們的砲兵已成為效率更大的了，因為它的殲滅性能已大大提高了。幾乎所有大砲底射擊速率都已增高，其中，重射砲程，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至七十五，反坦克砲和坦克砲底射擊速率則已增至兩倍以上。還有，砲彈底重量亦已增加，它們的戰鬥

性能也改善了。

紅軍防毒部隊也經過了組織上的改變，並且在數量上增至兩倍，而紅軍防毒部隊底使命，是在於保護紅軍不受敵人用毒氣襲擊所害，並同時準備以毒氣打擊去回答敵人用毒氣施行的打擊。到一九三九年，蘇聯所有的防毒設備，無論是在質量方面，或在數量方面，都與它們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所有的完全不同了，首先就是改善了保護戰鬥員皮膚暴露部份及其呼吸器官的防毒設備，已設有充分數量的防毒設備，以預防那一切可能的由空中對蘇聯紅軍戰鬥員的毒氣襲擊，並且已具有保護馬匹的防毒設備和預防軍需品中毒的設備。機械的和技術的地面消毒器具，在質量上是改善了，而且在數量上也大大增加了，它們在爲此目的而設備專用機器方面，已做過巨大的工作。

交通部隊是很重要的兵種，因爲在平時，特別是在戰時，軍中的全部管理和指揮工作，都是依靠於這兵種的。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蘇聯交通部隊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它之所以增加，就是由於交通部隊所具有的現代技術設備，是大大增進了。首先，它們採用了那加大放射綫並裝置有自寫儀器的無線電台；其次，它們採用了遠達電話儀器，速達電報儀器已增加百分之二百。再次，它們的交通部隊已幾乎全部摩托化了，交通部隊底機動能力已加強了。由於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原因，自然就增加這個兵種底數量並改善其質量。

在防空方面，蘇聯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間，高射砲數量已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八十八點三。同時，高射砲質量也改善了。比如，高射砲底射擊頂高度，已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蘇聯各重要工業中心和城市底防空工作，是建築在高射砲和驅逐機協同動作上的。和這協同動作在組織上的改善同時並進的，就是驅逐機在數量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二點三。

講到蘇聯的空軍力量，那在目前世界上更是數一數二的。到一九三九年為止，蘇聯空軍人員，已比一九三四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八，即幾乎增至兩倍半。飛機總數已增至百分之二百三十，即增至遠遠超過兩倍以上。如果以飛機摩托底馬力來表現空軍力量的增長情形，那末，一九三九年較之一九三四年，是增加了七百九十萬馬力，即比五年前增加百分之二百一十三。和空軍在數量上的增加同時並進的，就是它的質量和性能，也改變了。茲舉出幾個簡要統計數字來證實以上的說明（引自伏羅希洛夫在聯共十八次大會報告）：

機 種	增 加 程 度		
	速 度	高 度	遠 度
從一九三四年 到一九三九年			
驅逐機	增 56.5%	增 21.5%	增 111%
近轟炸機	增 88%	增 83%	增 50%
遠轟炸機	增 70%	增 77%	增 61%
偵察機和突擊機	增 67%	增 23%	增 45%

在這個時期內，空軍內部各種飛機比例關係也變更了，即輕轟炸機已由百分之五十點二減至百分之二十六，而重轟炸機則由百分之十點六增至百分之二十點六，驅逐機已由百分之十二點三增至百分之三十。這樣，由於各種飛機對比關係變更的結果，使重轟炸機和驅逐機在飛機總數中的百分比，已

增至兩倍以上。這就是說：蘇聯空軍，一般已成爲更有威力的空軍了，而它的打擊力也就隨着提高了。如果在一九三四年，蘇聯整個空軍在一次出發飛行時能攜帶二千噸炸彈，那末到一九三九年，蘇聯整個空軍所能攜帶的，已比一九三四年多過百分之二百零八；換句話說，同時齊放的投彈量已增至三倍，到現在當然更加多了。同時，蘇聯空軍底機關槍排射火力也增大了。如果把一九三四年空軍全部機關槍每秒鐘所能放射的彈粒總量當作百分之百來計算，那末，它們在一九三九年所能放射的彈粒總量，就已增加至百分之三百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蘇聯創立了新的、特種的武力——航空降落傘隊。這種隊伍，用飛機升空，然後再用降落傘落至敵人的陣地內，從後方來襲擊敵人。在蘇聯，還有一種很可注意的社會羣衆組織，那就是蘇聯國防航空學建設協會。它的使命，乃是爲着國防利益來訓練工人、職員、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及集體農場的農民，幫助紅軍來進行關於養成各種專門幹部的初步工作。

構成蘇聯紅軍戰鬥力增强的另一因素，是摩托化程度的提高。據伏羅希洛夫的報告：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在整個軍隊方面的摩托化程度，是增長了百分之二百六十。結果就有如下的情況：一九三四年每個紅軍士兵所能够平均攤到的，只有七點七四個馬力；而一九三九年每個紅軍士兵所平均攤到的，則是十三個馬力，即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七，而且這是注軍隊本身已增至兩倍以上的條件之下計算的。

蘇聯的海軍過去比較落後，但自一九三一年起即已急起直追。就一九三五年底而論，它的海軍作戰第一綫有主力艦三艘，航空母艦三艘，重輕巡洋艦七艘，驅逐艦三十四艘，潛水艇六十艘，共一八九·〇〇〇噸；第二綫有魚雷敷設艦、水雷艇、砲艦等共五五·八〇〇噸。最近幾年發展尤爲迅速，

至一九四一年，第一綫戰艦已比一九三五年增加三倍半，第二綫增至五倍以上。蘇聯最注意潛水艇的建造，現在它大約已有一千艘以上，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遠東。

蘇聯東西國界最感受威脅的沿邊，都建築有整串的看不見的地下防禦工程。例如在遠東國防綫，從海參崴起沿黑龍江、齊齊哈爾一直到赤塔、貝加爾湖，就築有七八十個用水泥和鋼骨造成的「德齊卡」防護，以防阻敵寇的侵襲。

工農紅軍乃是蘇維埃國家底統一軍隊，它是按普遍平等原則而由蘇聯公民構成的。據斯大林所說：「蘇聯紅軍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蘇聯紅軍是已獲得解放的工農之軍隊；第二，蘇聯紅軍是蘇聯各民族人民親密聯合的軍隊，是保護蘇聯各民族人民之自由和獨立的軍隊；第三，蘇聯紅軍是浸透國際主義精神與各國人民密切聯系的軍隊」。它有完善的政治訓練，精幹的政軍幹部和高度的技術作基礎，所以能够成爲無敵的軍隊。日寇在張高峯、諾門坎，已經受到相當的教訓，而希特勒德國却在三年侵蘇戰爭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第五節 和平政策的機敏運用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這種和平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蘇聯的利益與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聯系着的。蘇聯不但爲了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需要和平，需要鞏固蘇聯與世界各國間的和平關係。而且爲使世界人類免遭戰禍或結短戰禍，也需要粉碎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和挑釁，以爭取世界範圍的和平。然而帝國主義國家却需要戰爭，而且「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何況蘇聯又是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這樣，蘇聯要達到它爭取和平的目的，貫徹和平政策的外交，自然是够艱苦的。

社會的存在價值，不只在它能爲構成分子爭取生存，並要能爲他們謀得利益的發展，這必須要有個明確的政綱做根據，以定出有系統的政策來，爲有計劃的施行，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在國家尚未消滅的時期，一個國家的利益不能不與別國利益或相協調，或相衝突。因此，一個政綱的實現，就不能不與他國政綱的實現，發生相互作用，或相協調，或相抵觸。於是，只有各種建設計劃的政策仍屬不夠，必須再有一種外交政策，用外交手段，使本國的政綱政策，至少不致因和他國抵牾而減低實現的程度，而如果運用得當，却有可能使本國人民利益得到更大更快的發展。因此，所謂外交，決不是「水來土掩」那樣在專變發生以後才出來應付一下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消極辦法，而是應該知己知彼，爭取主動，來使本國政綱能在邦交關係上得着健全發展的一種積極政策。外交如用兵，必須爭主動，打先手，制敵機先；萬不可是被動的，追隨的，馬後炮的。指導外交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企圖外交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外交的勝利。外交人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憑藉這個舞台，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的傑作來。

蘇聯的外交政策，在基本上是和平政策。現在全世界具有智慧和良心的人士，都承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是現實存在的東西了。而在實現這一建設的過程中，則不但包含內部一系列嚴的酷諸鬥爭，而且刻印着對外一系列鬥爭的痕跡。每到一個緊急關頭，蘇維埃國家便發出巨大的獅吼，或作機敏靈活的應付，以貫徹它的和平外交政策。例如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中，鬥爭是非常嚴酷的。問題便是，或者：「當敵人力量顯然超過我方力量時，是要如何有秩序地退却，以便以最偉大的努力準備向敵人作新的進攻」，而與德國立即進行「苛刻不堪的和約」。要不然，就在帝國主義的混戰中自行滅

亡」。問題是這樣「要不然」式嚴肅的。列寧和斯大林及其所代表的最大多數人民，都很清楚的看到：當俄國還處在和德奧作戰狀態時，是不能認為蘇維埃政權底情形已經完全鞏固了的。爲要澈底鞏固蘇維埃政權，就會必須結束戰爭。所以，他們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最初幾天起，就開展了爲和平的鬥爭。蘇維埃政府曾建議於「各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立即開始關於正義的民主的和平之談判」。可是，當時英法兩國却不肯接受蘇維埃政府底建議，蘇維埃政府爲執行蘇維埃底意志起見，乃決定開始和德奧兩國進行談判。談判是在國民經濟遭受破壞的環境中，是在大家都疲於戰爭，在俄國軍隊從前綫跑回的環境中，在前綫瓦解的環境中進行的。顯然的，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來繼續戰爭，就是把剛才產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底生命拿去作孤注一擲。當時擺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的問題，就是必須接受苛刻的和議條件，必須在當時最危險的強盜——德國帝國主義面前退却，以便取得休息時間，鞏固蘇維埃政權，並建立新的軍隊——紅軍，這紅軍是能够保衛國家而打退敵人進攻的。

可是，當時一切反革命份子，自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起，到最頑固的白黨份子爲止，却進行了反對簽訂和約的瘋狂煽動。它們的圖謀是明顯的：它們想破壞和議，挑起德軍進攻，並使尚未強固的蘇維埃政權遭受打擊，使工農所獲得的勝利品受到威脅。它們在這個黑暗勾當中的同盟者，是托洛斯基及其幫兇布哈林，而布哈林趁阿拉狄克和皮達可夫領導了仇視蘇維埃的集團。這個集團爲掩飾自己的面目起見，乃自稱爲「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托洛斯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在蘇維埃政府內進行了殘酷的鬥爭反對列寧，要求繼續戰爭。這些人顯然是幫助了德國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革命份子，因爲，他們力圖使年輕的，還沒有軍隊的蘇維埃共和國去受德國帝國主義者底打擊，這是一種用左的詞句來巧加掩飾的奸細挑撥政策。

幸而列寧的炯眼看出了他們的陰謀，始終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堅持了和德國簽訂和約的主張。雖然中間由於托洛斯基（當時代表蘇維埃共和德國簽訂和約的代表團主席）違背了列寧的直接訓令，中斷了和平談判，使蘇維埃共和國受到了重大的損失（因為在和約談判停頓中斷，德軍又實行了軍事進攻，致使拉特維亞和愛沙尼亞都被德軍佔領），然而由於列寧的堅苦奮鬥，終於戰勝了托洛斯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的反動陰謀，達到了和平的目的，推動了蘇維埃共和國的向前發展。

又如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及退出，亦可看出蘇聯對於和平政策的機敏運用。國際聯盟絕不是一個「世界國家」，也不是什麼超國家的聯合會，因為它並不能對其組成份子行施獨立的權力。一般地說，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祇有在對付一個共同敵人的時候才能實現。拿破崙戰爭後神聖同盟的出現，是為着鎮壓革命的勢力，維持維也納會議的解決辦法與王室的復辟。從歐戰聯盟的起源中，也可以找出相似的因素。因為那時現存的秩序又遭受革命的威脅，長期的戰爭已使協約國取得勝利，而重新分配歐洲與世界的土地。國際聯盟就是維持大戰結果所造成的秩序，而反對新的修約戰爭或革命變動的趨向。同時在這樣的基礎上，又還加上消滅世界戰爭之十字軍的理想主義，這點又同神聖同盟有某種程度的類似。因此，我們可以從國際聯盟的組成中，找出三個因素來，即：第一，是戰勝帝國主義列強維持其戰勝結果的目的；第二，是整個資本主義維持其被威脅的統治而鎮壓勞苦大眾與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目的；第三，是阻礙未來戰爭的目的。這些目的，在事實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後來的歷史發展都把這些矛盾充分地表現出來。國際聯盟之與神聖同盟相似的一面，即它為帝國主義鎮壓革命與殖民地人民的一個組織。在它的最初階段中，即戰後革命浪潮最高漲的時期中，是特別的明顯。事實上國際聯盟實不是世界各國的聯盟，而只是戰勝國家的頭腦同二等國家的一種聯合。殖民地的人民只能

由他們的主人「代表」出席。蘇聯也同戰敗國一樣，開始並沒有被邀參加。

而蘇聯以前所以不參加國際聯盟的原因：第一就是因為蘇聯不願意替國際聯盟的帝國主義政策負責，不願替國際聯盟所發給的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國家的「委任狀」負責；第二，就是因為它不願意替國際聯盟所進行的軍備準備，增加武裝，組織新的軍事聯盟等勾當負責，因為這種勾當必然要引起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蘇聯之所以不參加國際聯盟，就是因為它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但到一九三四年，蘇聯為什麼又加入國際聯盟呢？這是因為客觀形勢已經起了變動，影響到國際聯盟已經不能不發生部分的變質。首先由於經濟恐慌與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結果，使帝國主義陣營分裂成爲一部分好戰冒險的侵略國，和另一部分主張暫時維持現狀的國家。前者如納粹德國與日本強盜已先後退出國聯；後者以英法爲代表，仍然留在國聯，並想利用國聯去阻礙前者。與上述因素相關聯的第二個因素，是國聯中之二等國與小國的地位與活動，隨着大國地位的削弱而增強起來。

原來，國際聯盟是全由大國把持的，小國的地位極不重要。國聯盟約就規定掌握國聯實際權力的行政院，是由五個常任理事與四個非常任理事所組成。常任理事由五個大國担任，四個非常任理事則由許多小國中選出，而且這四個席位還是經小國在和中力爭後才設立的。這種組織就表明大國在行政院中，佔有實際權力的多數。不過，由於各強國對立的尖銳化，把這種情形改變了。一方面，由於丹德的退出，國聯中之帝國主義強國的數目減低到三個國家；而另一方面，由於各種衝突與對抗而起的不斷更化，代表二等國與小國之非常任理事的席位，則由四個而增加到九個，這樣就把國聯的原來均勢改變了。這種變遷雖沒有打破大國，尤其是英法二國對於國聯的實際把持，但也不完全是形式上的，而實於均勢中反映出某種新變遷。因爲大多數的小國，都很怕戰爭，很怕鄰國野心或修約

策動，所以極想使國聯發展成爲一個維持集體安全的機構。加以蘇聯國力的增強及其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日益顯著，這就不僅使得許多小國樂於和它接近，甚至逼得法國爲要應付新興法西斯德國的威脅與國聯力量的減弱，也不得不邀請蘇聯加入國際聯盟。於是到了一九三四年，蘇聯就加入國際聯盟而造成一個全新的局面，雖然這新的局面並沒有支持到好久。

帝國主義的鍊索又一次被打破了，帝國主義強國已分爲二派，一派公開在國聯以外準備戰爭或向國聯挑戰；另一派則不願或反對立刻爆發戰爭，而極遲疑地與矛盾地要維持國聯成爲一個阻止或延緩戰爭的機關。這就使站在帝國主義圈外的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得以世界和平柱石的姿態在一定歷史條件之下，步入國聯行政院中行使職務。這樣一來，國際聯盟雖有其弱點，但也終於暫時做了揭露侵略者的場所，作爲某種限度的（雖然是薄弱的）和平工具，阻礙戰爭的擴大。雖然這種阻礙戰爭擴大的作用是很短暫的，但是當蘇聯加入國聯的一個時期中，對於蘇聯與世界和平也不能說沒有絲毫貢獻。

此外，蘇聯對和平政策的機敏運用，還可舉出無數實例，但這類實例，在以後史實敘述中，將有詳細說明，這裏就只得從略了。

第六節 國際的同情和援助

上列五項，說明了蘇聯在其對外政策中的內部條件和依據，這些條件當然是最基本的源泉。沒有這些基本條件，根本就談不上獨立自主的外交，那裏還有什麼外交的勝利。但是，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既然同時又是世界人民解放運動的根據地，既然資本主義內部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那末蘇聯在世界上也就有其不必孤立的根據在，它的外交活動也就不會得不到國際的援助。中國有句老話叫做

「得道多助」，用到蘇聯最爲恰當。這種國際援助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世界各國切身需要保持和平的勞動者之精神上的援助」，另一種是「那些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諸國家之清醒頭腦」。現在分別解說於下：

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主要的當然是依靠自力更生。因爲在蘇聯有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勞動人民既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就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從那時起，蘇維埃政權就採取着一切辦法，以便打破資本主義底經濟實力，並爲建成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造成條件。這些辦法就是：剝奪資本家和地主，把土地、工廠、交通工具和銀行變爲全民財產，實行新經濟政策，建成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實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特別是國家工業化，乃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的基本環節。把握住這個基本環節，就能在全國範圍內擴展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並因此而在經濟上也澈底打破資本主義。如果澈底實行這些辦法（事實證明蘇聯是按照這個道路前進的），那無論革命在西歐方面的延遲爆發，無論是資本主義在非蘇維埃國家裏的局面穩定，都不能停止蘇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行程。這是托洛斯基、季諾維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新老反對派份子所始終反對，始終不能了解的謎，然而却是蘇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真理。

可是我們要知道：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並不盡在於此。社會主義之在蘇聯建成，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轉變，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底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不過，這畢竟是蘇聯國內的事情，而且祇是社會主義勝利問題底一部分。說到這個問題底國內的方面，就是說，國內階級相互關係方面，那末，蘇聯底工人階級和農民是完全能够在經濟上克服自己本國的資產階級，並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

同時，還有這問題底國際的方面，就是說，外部關係方面。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蘇維埃人民與國際資產階級間的關係方面，而國際資產階級是仇恨蘇維埃制度的，它尋找機會舉行新的武裝干涉來反對蘇維埃國家，來進行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新的嘗試。而因為蘇聯暫時還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於是在蘇聯周圍就繼續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包圍，而這個包圍就產生着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蘇維埃人民祇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就能够消滅這種外來的危險，這種反蘇聯的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危險麼？不是的，是不能够的，因為要消滅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危險，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而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則祇有當勞動人民革命至少在幾個國家內取得勝利後才有可能。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這勝利是表現於已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消滅，并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成——還不能是最終的勝利，因為外國武裝干涉的危險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依然沒有消除掉，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尚無免除這種危險的保障。當然，在蘇維埃政權底正確政策之下，蘇聯人民及其紅軍一定能給新的外國強盜野蠻侵犯以應有的回擊，正如他們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會給第一次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以回擊一樣。然而這還不是說，新的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危險就會因此而消滅。第一次武裝干涉之失敗，並沒有消滅新的武裝干涉危險，因為武裝干涉危險底來源——資本主義的包圍還繼續存在着。怎樣才能消滅外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呢？除了增強蘇聯自己經濟、政治、文化、國防等方面的實力以外，還必須加強蘇聯與各國人民羣衆的聯繫，努力爭取一切直接間接的國際援助。差不多還在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就會說過：

「要社會主義完全勝利，要完全保證不致恢復舊制，就必須有幾個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這是不待說的。歐洲無產階級如不援助我們的革命，則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擋住合力的進逼。同

時，俄國革命如不援助西方革命運動，則這種運動就不能以它在俄國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所具有的那種速度向前發展——這也是不待說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給予我們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們同情於我們的革命，他們有破壞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這一切是不是援助呢？是不是重大的援助呢？當然是的。如果沒有這種援助——這種不僅歐洲工人，而且各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家都給與我們的幫助，則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極困難的地位。這種同情和這種援助，又加上我們紅軍的實力和俄國工農拚命護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所有這一切，至今是否足夠去擊退帝國主義者底進攻，并取得為進行認真的建設工作所必須的一種環境呢？是的，是足夠的。這種同情，現在是發展着，還是低落着呢？無條件地，它是在發展着（見斯大林所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七五頁）。

「最有可能實現的，世界革命底發展，將經過這樣的道路，就是許多新的國家，將以革命的方法脫離帝國主義國家底系統，而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却援助這些新的國家裏的無產者。我們知道：第一個已脫離這個系統的國家，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已經為其他一切國家中工人羣衆和一般的勞動羣衆所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擁護，則這個國家就不能維持。毫無疑問，這種擁護將會增強和發展」（同上書二〇八頁）。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斯大林在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中，又說到這個問題：

「至於為共產主義社會底完全勝利所必要的國際條件，那末它們是會隨著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危機及工人階級革命爆發的增長而形成和增長起來。決不能這樣的設想，以為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會同意只做一個旁觀者，來旁觀着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的發展。實際

上，每一個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的嚴重步驟，都必然會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不可阻遏地發動起來，以便在這些國家裏爭取專政和社會主義。這樣一來，在國際革命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將形成兩個世界中心：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兩個中心為佔有世界經濟的鬥爭，將在全世界上解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命運。因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失敗，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勝利」（同上書第十版四〇六頁）。

由於蘇聯利益與世界人類利益的一致，所以蘇聯和平政策的推行，能够隨時得到世界各國切身需要保持和平的勞動者之精神上的援助。諸如各國蘇聯之友社的發展，以及工人代表團和科學家文學家成羣結隊地前往參觀蘇維埃國家——這些人人皆知的事實，無疑地證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漸漸在開花結實了。二十七年來，我們已經不止一次看到過，當蘇聯每一個前進步驟受到帝國主義的阻礙時，却常常可以得到各國人民大眾的支持和援助。這種支持和援助，不僅表現在勞動人民國際團結中，給蘇聯外交政策的實行以應有的聲援；還足以督促他們本國的政府，使之順從民意，改進對蘇關係，使蘇聯的外交政策能更順利的執行。

至于第二種國際援助，即「那些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諸國家之清醒頭腦」，雖不是常常都很明白的，但有時對於蘇聯的進程，却也有很重要的意義。例如在十月革命時期，各基本的帝國主義者集團，因忙于自己相互間的戰爭，還沒有工夫集中力量，來反對新起的蘇維埃政權，而新俄工農人民却並因此得以乘機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及準備撲滅哥爾察克和但尼金。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那時帝國主義者集團矛盾的發展，甚至使得資產階級「最智慧」的代表如美國總統威爾遜

，也會發電祝賀蘇俄。下面就是一九一八年三月當德國軍隊進攻蘇維埃列寧格勒的時候，威爾遜寫給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信：

「我想趁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的機會，來代表美國人民向俄國人民表示誠懇的同情，特別是在目前這個時候。目前，德國軍隊深入俄國境內，其目的是在於妨害爭取自由的鬥爭，消滅這鬥爭的一切勝利品，實現德國底陰謀和束縛俄國人民。雖然美國政府現時可惜不能給俄國以它自己所願意給的那種直接的援助；可是，我還是想經過現在這次代表大會來使俄國人民相信：美國政府是利用着一切可能來保證俄國重新得到內政上的完全自主和完全獨立，來保證俄國完全恢復它在歐洲底和現代人類底生活中的偉大作用。美國人民極熱烈地同情于俄國人民底那種永遠解脫專制制度而謀得獨立自由的志願」（威爾遜總統這個祝賀電文會載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的真理報第五十期）。

雖然美國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與蘇聯恢復邦交，雖然威爾遜總統自己後來還參加組織了十四國對於蘇俄的武裝干涉，但是他這個祝賀電文却明白無比地說出了一個確切的真理，即：「美國人民極熱烈地同情於俄國人民底那種永遠解脫專制制度而謀得獨立自由的志願」。不管驅使威爾遜表示這個祝賀行為的，還有當時德美矛盾的緊張，因此他想拉攏新生的蘇俄去孤立德國，而這也總可以表現威爾遜頭腦一時清醒的地方。固然，當時蘇俄所以能够擊退德國的進攻，主要還是依靠它自己紅軍的力量與德國革命人民的援助。不過，當時像威爾遜總統這種清醒頭腦，確實也有相當的撥合作用，因為它分裂了帝國主義的陣綫，乃是客觀的事實。

在英國統治階層中，雖然在一九三九年以前佔支配地位的份子如張伯倫、哈里法克斯等，一直堅持反蘇主張，但其中資產階級的代表，亦不乏頭腦清醒之人士。例如在一九三九年初夏英法蘇談判時

，張伯倫政府不但不願與蘇聯簽訂一個公約或一個公平的互惠的親密的公約，並且在玩弄一套巧妙的把戲。因為英國的民意要這個公約，政府不敢公然反對或拒絕，乃不得不與蘇聯談判公約，但竭力設法不使它成功，並以種種方法，作談判失敗後把全部過失推卸蘇聯身上的準備。但路易喬治等却堅決反對張伯倫那種反蘇誤英之荒謬措施，而竭力主張接受蘇聯建議，並在議院中公開發表：「拒絕蘇聯建議，即等于拒絕和平」。當時克里浦斯與艾登等，亦都主張與蘇聯修好，以挽救歐洲之和平。雖然當時路易喬治，克里浦斯與艾登等之力量，還不足以改變英國政府的實際政策，但是他們的清醒頭腦，對於蘇聯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客觀助力，却是不容置疑的。

蘇聯目前所處的環境，在兩個制度尖銳對立的情況之下，蘇聯不能不善于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削弱帝國主義間的一致。蘇聯不能在國家羣中，完全孤立，孤立只有招致帝國主義國家間一致對蘇的便利。事實上，蘇聯不需要這種孤立，並且有不必孤立的根據在。這個根據，就是各國人民的精神援助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間矛盾存在的情形下，蘇聯正可以利用某些國家因懼于蘇聯的國防威力，或不願變更現狀，需要或忙于帝國主義的掠奪，而不願立刻與蘇聯敵對，不敢與蘇聯敵對；或因其他原因，不願破壞和平，而採審慎態度。這就可能在某一歷史條件之下，使帝國主義國家，不能在對蘇問題上（縱或是暫時的）採取一致態度。列寧斯大林都曾一再指示：不要過高或過低的估計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對於這種矛盾的正確估計，是蘇聯決定外交方針的一個重要根據。斯大林曾因為齊采林任外交人民委員長時，過份估計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一致，而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予以嚴厲的指摘。斯大林一再的說，研究和適當運用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應該是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

第四章 革命與內戰時期的蘇聯外交政策

第一節 從十月革命和平令到布列斯特和約

在蘇維埃政權初成立的年代，蘇俄外交的努力，是在於使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擺脫帝國主義戰爭，其次就是破壞帝國主義國家藉以困死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治封鎖。在人類歷史中，這個新型國家第一次執行了原則上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獨立的外交政策。蘇維埃政府公佈了帝國主義各國所締結的祕密條約，同時又向各國政府及其人民號召立刻停止流血的戰爭，並締結和平條約。因此，蘇維埃國家自從開始成立以來，它的外交政策，就與全世界人民大眾的利益相符合。

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中的新紀元，這個革命把世界分為兩個營壘。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消滅了俄國帝國主義，並將工廠、作坊、土地、鐵路、銀行，都變為全體人民的產業及社會的財產。

剛剛勝利的蘇維埃政權的狀況，在俄國仍與德奧作戰時，自然不能說是十分鞏固的。為了真正鞏固蘇維埃政權，只有結束戰爭。蘇維埃政府在其成立的第二天，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夜間，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和平法令。代表大會向各交戰國提議立刻締結至少以三個月為期的停戰協定，以便進行關於和平的談判。其條件為「對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攫取領土或壓迫任何國家」。代表大會向「一切交戰國的政府和人民呼籲時，同時又向「人類三個最先進民族和此次戰爭中三個最大參戰國：英國、法國及德國的覺悟工人」呼籲。代表大會號召這些工人來幫助「把和平事業以及把勞動者與被剝削者民衆從一切奴役與剝削之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有成效地進行到底」。這樣，蘇維埃政權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最初幾天起，就開展了為和平的鬥爭。蘇維埃政府曾建議於「各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

立即開始關於正義的民主的和平之談判」。可是，英法兩國却不肯接受蘇維埃政府的建議。因法國和英國拒絕進行關於和平的談判之故，蘇維埃政府乃決定開始和德奧兩國進行談判。

談判是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開始的。蘇俄方面，曾經提出左列三項：（一）德國佔領的里加灣及海峽諸島的駐兵，應即撤退；（二）德國雖與蘇俄締結休戰協定，也不得把駐在俄邊戰綫的軍隊，調往英法戰綫作戰；（三）議和條件，應以「不割地、不賠款」為原則。但這些前提條件，都被德國拒絕了。這時，列寧認為自己困難的軍隊，必需有「自由的休息」，至少要達到「休戰三月——甚至限期更短些」的目的；否則，十月革命的果實，就有得而復失的危險。於是蘇俄不把上述「自己的條件，當做最後通牒」，而在對德相當讓步之下，先於十二月五日，締結了休戰協定，再繼續進行媾和條約的商訂。

這時候，在蘇俄國內，乃至在布爾塞維克黨內，關於媾和問題，掀起了激烈的鬥爭。自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起，到最頑固的白黨份子止，都站在擁護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地主的立場，反對締結和約，主張繼續戰爭；同時，以布哈林、拉狄克為首的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和托洛斯基以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相勾結，在反對蘇維埃政府的陰謀之下，也拿「左」的詞句，反對締結和約。托洛斯基本人呢，他表示着一種「不和不戰」的態度，儘管布爾塞維克黨中央，有簽訂和約的命令，而他竟自作主張，以蘇維埃代表團主席的資格，聲明：蘇維埃共和國拒絕在德國所要求的條件下，簽訂和約，但同時，却又通知德軍說：蘇維埃共和國不會進行戰爭，並擅自把軍隊繼續遣散。這真是駭人聽聞的反常態度，不僅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簡直是邀請德軍來進攻。結果，德軍在廢棄休戰協定後，大舉進攻，很迅速的佔領了托賓斯克（Tobinsk），蒲斯可夫（Puskov）等廣大

區，進迫彼得格勒附近，幾乎要把俄國變成它的征服地。蘇維埃政權和布爾塞維克黨，乃採用了列寧的主張：一方面，發出了「社會主義祖國處在危險之中」的嚴正號召，組織起勞動階級的革命的新軍隊，打擊並阻止了德軍的進攻；他方面，仍努力和德國交涉，願意在德國所提出的和平條件之下，締結和約。但這時德國利用他在軍事上的優勢，提出了比較前次條件更加苛酷的要求。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締結，經三月十六日第四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正式批准的所謂布列斯特和約，便是根據德國所提更加苛酷的要求而產生的。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 俄國放棄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亞爾羣島、波蘭等地的統治權，由該地人民自決（實際上則讓給德國）；

(二) 承認烏克蘭為獨立共和國（實際上是變成德國的藩屬國）；

(三) 割讓愛里文（Erivan），卡斯（Kars），巴統（Batumi）等地給土耳其；

(四) 共產主義宣傳，不得發現於中歐及俄國所放棄的各地方；

(五) 一九〇四年的德俄商約，仍須履行；

(六) 付給德國賠款三萬萬盧布（表面上，說是俾斯麥的給養費）。

這在那些「左」的革命空談家和右的國權主義者看來，是絕對應該排斥的「屈辱」的條約，是新俄對於德國極大的一種讓步；但在事實上，在當時形勢之下，却是「加強了蘇俄的力量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的一種讓步」（列寧）。

布列斯特和約，是德國壓迫蘇俄的苛酷難堪的不平等條約，新興的革命中的蘇維埃政權，為什麼肯締結這種條約？尤其是布爾塞維克黨的指導者，蘇維埃政權的創造者列寧，為什麼堅決主張締結這種

條約？這是因爲：

第一，要拿一時的「屈辱」，換得全國民衆所切望着的和平。當時歐洲大戰，是帝國主義者瓜分世界的反動的戰爭，是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所反對的戰爭。尤其在俄國，民衆所迫切需要的是和平與麵包，是土地與自由，而不是戰爭。爲了這個，他們曾經示威和暴動；爲了這個，他們曾經推翻沙皇政權乃至克倫斯基政權。蘇維埃政權，是代表民衆利益的政權，是民衆所支持和擁護的政權，是應該尊重民意服從民意的政權，當然不能不把爭取和平，作爲他首要的任務了。固然，德國的條件，是苛酷難堪的。從德國手裏，取得和平，要支付極高的代價，忍受極大的犧牲。但是在德國的嚴重壓迫之下，在德國哀的美敦書之前，擺在蘇維埃政權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接受割地的和平呢？還是立刻進行革命的戰爭？」這上面，再不能有折中的解決辦法！托洛斯基的「不戰不和」，簡直是兒戲！進行革命的戰爭罷，在當時的蘇俄，還沒有這種力量。因爲「第一，大部份士兵，疲倦憔悴到極點；第二，騎兵已完全無用，從而將引起砲兵的覆滅；第三，完全不能保護從里加起，到萊維爾止的那個邊岸，使敵人有確定的機會，進佔里庫良地亞乃至彼得格勒；第四，在軍隊中佔着大多數的農民，贊成割地的和平，而不贊成立刻的革命戰爭；第五，憔悴的民衆，渴望停止綿延四年的流血戰爭」。再加以國民經濟的破壞，反動份子的蠢動，想要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繼續對德作戰，等於把剛才誕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底生命拿去作孤注一擲，結果，不僅必然遭遇嚴重的失敗，而且會招致滅亡的慘禍。事實逼迫着蘇維埃政權，不能不採取和平的途徑，因而不能不接受德國的苛酷條件。這樣，雖然爲少數人所反對，但却博得大多數民衆的擁護。

第二，要拿一時的退却，換取將來的勝利。列寧曾說：「革命的政黨，還應補習補習，他們已經

學習怎樣實行進攻，現在，應當了解，除了學會進攻之外，還必須學會怎樣來正確地實行退却。應當了解——而且革命的階層，正根據自身的辛苦經驗，來學習了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即在革命的戰略上，不僅要善於進攻，同時，在必要時，也要善於退却。「當敵人力量強大時，退却是不可避免的；受敵人壓迫而去迎戰，明顯地是不利的」。布列斯特和約的締結，就是正確地運用了退却的戰略。因為如前所述，繼續戰爭，只有失敗，只有滅亡，所以必要退却，才能取得休息的時間，才能保持農民的擁護，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才能建立新的軍隊——紅軍；同時，也才能「脫離兩個敵對的帝國主義的集團，利用他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阻礙他們會合起來反對蘇俄的行動，使蘇俄有機會去繼續和鞏固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布列斯特和約締結的結果：一方面「加強了蘇俄的力量」，他方面，「分散了帝國主義的力量」，使蘇俄走上了最後勝利的途徑。所以列寧當時很有自信地說：「和約條件，是奇醜難堪的，但是歷史總會勝利的。……不管有怎樣的艱難困苦，而勝利將來總會歸於我們」。當時，有人以為蘇俄自身的力量，雖不足以抵抗德國的進攻，但德國革命的爆發，是能夠幫助蘇俄勝利的，因而蘇俄不需要，也不應當和德國媾和。殊不知政策應該建築在現實的基礎上，而不應該建築在假設的基礎上。德國革命，必然是會爆發的，但它在什麼時候爆發，就連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自身，也還不能確定的知道。正像列寧在當時所說：「假使德國革命，在最近三四個月內爆發，那末，進行革命戰爭的政策，或許不會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假使它在最近幾個月內不爆發，那末，在繼續戰爭的狀況之下，必致遭遇嚴重的失敗，顛覆社會主義而建立別個政府」。在這樣的沒有把握的基礎之上，建築起繼續戰爭的策略，就多少帶有賭博的性質，而賭博是投機冒險的行爲，不是安邦定國所當取法的。

第三，要求得「一定的休息時期」，以「獲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當時俄國革命的形勢，如列寧在「和平提綱」中所分析：「差不多全體工人和極大多數農民，都贊助蘇維埃政權和它所開始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敗，是有保障的」。但是，「由於有產者階層最後掙扎的堅決反抗所引起的國內戰爭，還在繼續發展；蘇維埃政權，雖然有把握裁定這種內亂，亦必須經過相當時期，要使用相當力量，要在國內發生某種嚴重破壞和混亂的現象」。同時「他們採取了比較不積極的軍事事的反抗，如果蘇維埃政權不戰勝有產者階層及其走狗的消極的和隱蔽的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此外，「以社會主義來改造俄國的組織任務，非常艱鉅。要解決這一問題，也須經過極長的時間」，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要使社會主義的革命成功，「必須要有一定的至少幾個月的休息時間，使蘇維埃政權在實時期中，能有工夫，首先去戰勝本國有產者階層，並整頓廣大的深刻的組織工作」。這就是說，在當時的蘇俄，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爲了裁定國內的叛亂，爲了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爲了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必須要有一定的休息時期。縱使對德戰爭，不至滅亡，也應該講和；何況戰爭的結果，會招致滅亡之禍呢？

總之，布列斯和約的締結，在蘇俄，是尊重民衆的意見，適合蘇維埃政權的需要，適應客觀環境和具體形勢的要求，而不得不採取的正確措施；並不是無條件、無理由的對德屈服和投降。

布列斯和約締結的結果：第一，使蘇維埃政權有時間和力量，去肅清國內的反動勢力，而鞏固了自己；第二，使蘇維埃政權，有時間去整頓經濟和建立紅軍；第三，使蘇維埃政權獲得全國民衆特別是農民的擁護，而積聚他們的力量，準備向哥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第四，使蘇維埃政權，「可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的力量，加強自身的力量」；第五，特別明顯的，是使蘇維

埃政權，緩和了德國帝國主義的進攻，而得保障了自身的安全；第六，使蘇維埃政權有機會去加緊和擴大「一般的宣傳工作，特別是組織交戰國士兵聯歡的工作」，以促成歐洲的革命，特別是德國的革命。自然，蘇維埃政權所得到的這些結果，並沒有改變了布列斯特和約本身是「不幸的和約」的性質。假使能够像蘇維埃政權所曾提議，締結「以不割地、不賠款爲原則」的平等的條約，列寧、斯大林諸人當然不肯放棄他們的「公正的、民主的和平」的主張，而締結布列斯特和約這樣的「不幸的和約」。但在事實上，這已經是不可能。所以在「用盡一切力所能及的辦法，以延宕談判」，到了實在不能再往下延宕的時候，才不得已而締結這一和約。其次，布列斯特和約，雖然是奇醜難堪的「不幸的和約」，但它的「不幸」的程度，還沒有在割地賠款以外，更進而限制蘇俄的主權，干涉蘇俄的內政，剝奪蘇俄的自由，使蘇俄沒有鞏固新政權建設新社會的機會，所以締結這樣的和約，還不至危害到自己的獨立自由。如果和約的內容，是使蘇俄陷於萬劫不復的德國的附屬乃至殖民地地位，蘇維埃政權是決不會接受的。記得當時德國曾以保衛使節爲藉口，要求駐兵於俄都，但被蘇維埃政府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就是明顯的例證。

何況，布列斯特和約的締結，在蘇俄，原爲戰略的退却，並不是取消了戰鬥的本身；它是爲了準備將來的更英勇的戰鬥，並不是要在「不幸的和約」之下，苟且偷安。蘇維埃政府在和約商訂的過程中，並沒有忽略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道理，也沒有忘記了即在和約締結以後，「帝國主義國家反蘇的軍事發動，仍是不可避免的」，僅不過緩和一時罷了。所以當媾和談判停頓，德軍繼續進攻的時候，蘇維埃政權，會動員剛剛編制的革命的新軍隊，在納爾瓦一帶，給了打擊者以打擊。而在締結和約後，更加緊了編練紅軍的工作。同時，不僅是武力的鬥爭，蘇維埃政權並會實行了政治的鬥爭。

它曾經廢棄了秘密外交，在各國民衆之前，暴露了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它曾經向各國勞動者，做了「一般的宣傳工作，並組織了交戰國士兵聯歡的工作」，特別是促進了德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德國的統治者，曾自己承認：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在表面上好像屈服了蘇俄，而實際上，却正中布爾塞維克的圈套。以後，德國終於打敗，蘇維埃政府因善於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終於取消了布列斯特和約。

布列斯特和約的締結，曾經給予蘇俄以最後勝利的收獲。在這次德蘇戰爭中，蘇聯是不是也需要這樣的和約呢？不需要，絕對不需要。爲什麼？因爲歷史條件與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相同。那時新俄如果繼續戰爭，革命果實有被覆沒的危險，而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却救了蘇維埃國家。其中複雜道理，前面已有詳細敘述。現在蘇聯所進行的抗德戰爭，是全世界人民和民主國家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主要部分，全世界人民和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一大部分都繫於德蘇戰爭的勝敗誰屬。而蘇聯的內外因素，又決定了有打垮希特勒的絕對把握。現在蘇聯正在再接再厲的貫徹反法西斯戰爭的宗旨，決不中途妥協，因此也決不需要重覆締結布列斯特和約那樣不愉快的故事。

至於說到抗戰中的中國，是不是也需要這樣的條約呢？我們的回答是：不需要，絕對不需要。爲什麼？因爲第一，戰爭的性質不同。當時德俄的戰爭，是民衆所反對的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革命的新興的蘇維埃政權，沒有繼續這種戰爭的必要；而中國目前的抗日戰爭，却是民衆所擁護的被壓迫民族反抗日本強盜野蠻侵略的戰爭，中國如果能够團結抗戰到底，政府如能接受人民公意，實行民主改革，就能施行反攻，打敗日寇，而中途妥協，則必然要招致滅亡之禍；第二，客觀的環境不同。當時的蘇俄，如前所述，是處在內憂外患。民窮財盡，四面楚歌，不堪再戰的情況之下；而中國目前

的抗戰，雖然也遭遇到無數的困難和痛苦，但抗戰潛力尚未發揮出來，敵人的得法和使用得當，不再加以浪費，不怕沒有力量來支持；第三，建國的途徑不同。過去的俄國，是半封建的帝國主義，不會受其他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支配，蘇維埃政權的任務，主要在剷除封建殘餘和有產者階級的勢力，以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所要求的，只是和平；而中國則為久處於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和壓迫之下的半殖民地國家，非把帝國主義的力量，首先是日寇的力量，驅逐出去，無由完成建國的大業。當年蘇俄可以對德媾和，因為祇有媾和，才能爭得時間從事建國。我們不能對日媾和的，因為「媾和，中國就等於亡國，根本就談不到建國。漢奸、親日派、民族失敗主義者，自「九一八」以來，就援引布列斯特和約，做爲他們主張妥協、屈服和投降的先例，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謬論。因爲布列斯特和約的締結，如上所述，是伴隨着許多必要的條件的，即它的內容，沒有限制蘇俄的主權；它的締結，沒有取消蘇俄的鬥爭；它的產生，是在不得已的情勢之下；它的消滅，是有預期的把握。試問主張對日媾和的人們，中國現在的具體情形有那一點和上述蘇俄對德媾和的條件相似呢？鐵和事實告訴我們：兩者在根本上是沒有相似之點的。所以，站在敵人的立場，無條件地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漢奸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之流，是不能拿布列斯特和約做例子，來掩蓋他們的賣國罪行的。

第二節 從各國武裝干涉到國內戰爭之結束

當戰爭還在西歐劇烈進行的時候，布列斯特和約既已締結，而蘇維埃政權又因自己採取許多革命經濟設施而臻于鞏固——這個情況就在西歐帝國主義者中，特別是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中，引起了

極大的驚惶。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害怕；俄德兩國和約之締結，會有利於德國軍事狀況，並相當增加協約國軍隊在前綫上的困難。其次，他們害怕：俄德兩國和約之成立，會加強在一切國家中，在一切戰綫上，要求和平的趨向，並因此而破壞戰爭事業，即帝國主義底掠奪事業。最後，他們害怕：蘇維埃政權在巨大國家境內的存任，以及蘇維埃在國內推翻克倫斯基政府以後而獲得的成功，會成爲薰陶西歐工人和兵士的榜樣，而這些工人和兵士已對長期戰爭抱着深刻的不滿，並會仿效俄國工人和兵士而掉轉槍頭去反對本國的統治者和壓迫者。因此，各協約國政府就決定開始向俄國實行武裝干涉，以便推翻蘇維埃政權，並成立資產階級政權，希望這個資產階級政權能够在俄國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取消與德人所訂的和約，並恢復反對德奧的作戰陣綫。

在遠東，日本帝國主義一開始就把新俄的出現，認爲是對於日本的最大的威脅，認爲和它不能並存的死敵。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蘇俄的廣漠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正是它所食指頻動應該染指一嘗的異味。例如日人夏秋繩一在他所著「日美戰爭呢？日俄戰爭呢？」一文中，就曾這樣說過：「所謂西伯利亞問題的解決，一言以蔽之，第一步，就是使從貝加爾湖到東太平洋沿岸居住的西伯利亞各民族獨立（引），在共存共榮，機會均等的原則下，開放其門戶，開放其廣漠無垠的天然資源，使其成爲遠東的樂園（引）」。又說：

「日俄兩國是死敵。我不殺彼，彼必殺我。膺懲亦俄，西伯利亞獨立問題是日本的死活問題。日俄衝突到底不可避免，愈速實行愈爲得策」。

日本清浦內閣的發言人更公然主張：

「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以東的土地，都是亞洲，都是接受日本文化的區域。在那亞洲東北角的地帶中，日本的影响必須變成高于一切，而且日本必須努力至少獲得貝加爾湖以東的土地」。

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法律上，不承認俄國的革命政權；在事實上，則企圖以武力撲滅這新政權，並謀進而佔領蘇俄遠東的領土，掠取蘇俄遠東的富源，想使蘇俄的遠東淪為它的殖民地。爲要企圖實現這個目的，日本首先燃起遠東反俄的戰爭烽火，而自任出兵西伯利亞的急先鋒。當然，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蘇俄實行武裝干涉，是與西方協約國相配合的。那時對於蘇俄武裝干涉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在西方，是法國的老虎總理克里孟梭，而在遠東的支持者和實行者，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更加樂意來幹這種黑暗勾當，是因爲它們深信蘇維埃政權是不穩固的，以爲只要蘇維埃政權底敵人作相當的努力，那末蘇維埃政權就必然會很快滅亡的。於是，還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已經形成兩種確定的，準備來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勢力：協約國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俄國內部的反革命。在這兩種勢力之中，如果單獨來幹，則無論那一種勢力，都沒的充分條件可以單獨去進行。俄國內部的反革命，會擁有某些軍事幹部以及幾許的人力，這主要是哥薩克的上層份子和富農——這些力量是爲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陰謀所必需的。但是，俄國內部的反革命派，沒有金錢和軍火。反之，外國帝國主義者擁有金錢和軍火，但是它們不能拿出足數數量的兵力來供武裝干涉之用，這不僅是因爲這些兵力要用去與德奧繼續作戰，而且因爲這些兵力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將會是不完全可靠的。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條件，曾要求這兩種反蘇維埃勢力——國內的和國外的——

聯合起來。而這種聯合，果然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形成起來了。

以俄國內部蘇維埃政權底敵人反革命叛亂爲內應的反蘇維埃政權的外國武裝干涉，就是這樣形成的。休戰時間，就是這樣終結的。而在俄國的國內戰爭，即俄國各民族工農人民大眾爲反對蘇維埃政權內外敵人而進行的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九日，英國海軍部隊在莫爾曼斯克登陸，是協約國干涉蘇俄的正式開始。在它們的計劃中，這是在適當的時機經過彼得羅柴伏得斯克向彼得格勒繼續進攻的準備步驟。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日本帝國主義的陸戰隊在海參崴登陸，那是着手準備早就計劃了的，向西伯利亞內部的繼續進攻。

帝國主義者如何組織及實行自己的干涉，是非常有趣的。原來它們是看準了在莫爾曼斯克蘇維埃的首腦部中，是站着著名的托洛斯基黨徒——尤利耶夫。他是對德作戰的擁護者，締結布列斯特和約的反對者。英國的統帥部想經過他來實行自己的干涉計劃，於是便和莫爾曼斯克蘇維埃締結了關於對抗德國人的共同行動的協定。事實上，莫爾曼斯克蘇維埃領導了的行爲，成了出賣祖國的叛逆。在這以後，表明了莫爾曼斯克蘇維埃在自己的叛逆行爲中，是根據托洛斯基的訓令。托洛斯基命令莫爾曼斯克的蘇維埃，和協約國的代表簽訂關於援助對德軍進攻事件的任何協定。尤利耶夫接受了這個命令，並且締結了協定。根據這個協定，英國軍隊「合法地」借用了即是事實上佔據了莫爾曼斯克區。當時列寧和斯大林曾拍電企圖感化這些叛徒，要求取消這種可恥的協定，但追隨托洛斯基的莫爾曼斯克蘇維埃首腦部，却繼續在干涉者的支配下跳舞。干涉者祕密地運來了軍隊，推廣了自己統治的界綫，蹂躪了蘇維埃公民，創立了白衛軍，在各方面準備繼續進攻彼得格勒。

日本帝國主義者則按別種方式組織了自己的干涉，在進兵西伯利亞之先，它本已利用俄國的內亂而作着侵略的準備了。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日本的巡洋艦便曾有一艘駛入海參崴港口；二月五日，它又製造出一夥「無名強盜」襲擊凡爾塞旅館，劫掠各國居住僑民的怪劇，以作進攻蘇俄遠東的藉口。當時，海參崴的領事團曾通電全世界，謂遠東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外僑的生命財產已無任何保障，於是日本帝國主義便自任「保障」的責任了。三月二十六日，日本外相在國會公開宣稱：

「假使西伯利亞的狀況，將要威脅到日本帝國的安全，或其僑民的生命利益，則政府準備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自衛步驟」。

巧的很，就在幾天之後的四月四日，海參崴便發生了所謂二個日本人被暗殺的事件，這其實就是日寇自己在海參崴殺了兩個日本人，日寇是慣于這樣製造侵犯口實的。接着，日本的陸戰隊便于四月五日上午六時，在海參崴登陸了。它所持的理由，除却日本人被暗殺外，還有一個關係協約國共同利害的理由，那便是德國俘虜將在蘇俄政府縱容乃至援助之下，佔領西伯利亞鐵道。其實，這都不過是拿莫須有的虛構事實做爲一種藉口罷了。這顯然是有計劃的侵略行動的開始。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列寧立刻對遠東蘇俄負責當局發出了指示的電報，他指示着：

「我們認爲現在的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並嚴重地預告同志們：你們不要忘存幻想！日本一定將要實行進攻，這是不可避免的。協約國的一切國家，大概都會援助它，支持它。所以你們應當不容稍緩地，開始作嚴密的準備，用一切力量來進行準備。最重要的，最需要注意的，是正確的開動，退却以及一切輕重機器，鐵路器材的運走，不要爲那些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所昏迷」。

誠然，日本陸戰隊在海參崴的登陸，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俄進攻的開始，同時，也就是協約國共同

武裝干涉的開始。在日寇國戰隊登陸後，緊跟着，就有英、美、意各國國戰隊的登陸。到一九一八年九月，在海參崴登陸的協約國軍隊已有十萬人，而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日本軍隊。日本軍隊從海參崴很迅速地向北方——烏蘇里與黑龍江區——及西方——海蘭泡、赤塔、扎巴加里亞——侵入。他們活動的主要地帶就是黑龍江區和濱海省，日本帝國主義除了它自己的武裝外，還組織着白俄軍和援助着捷克軍。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所及的範圍內，蘇俄的財富橫被掠奪，蘇俄的人民慘遭屠殺，而在日本帝國主義羽翼下的各傀儡組織，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命令下，和它細結了一些出賣祖國的協定，企圖把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行為合法化。這事實，連當時站在捷克軍方面的伊高諾夫也在指摘着。他說：「日軍援助克爾梅可夫佔據伯力、下阿木丹、伯力到尼古拉斯克的鐵道，而克爾梅可夫便幫助日軍掠奪伯力的無數財富，同時，日軍也樂得讓克爾梅可夫去公然搶掠，任意屠殺，並建立了他自己慘無人道的苛酷專政。」

依靠日本鬼子援助的謝米諾夫也是放縱他那夥強盜在後貝加爾省照樣的橫行、掠奪、強迫把我們的糧食徵發去，而賞給那些投機的商人，所得利益，大家平分」。

上面是日寇及協約國在遠東侵犯蘇俄的情形。在北高加索一帶，科爾尼洛夫、阿列克塞也夫和尼金將軍們在列強援助之下，組織了白黨的「義勇軍」，掀起了哥薩克上層份子的叛亂，並開始了反蘇維埃的進攻。在頓河區一帶，克拉斯諾夫將軍和馬蒙廷夫將軍在德國帝國主義者秘密援助（德國帝國主義者因有俄德和約存在之故，沒有敢於公開援助他們）之下，掀起了頓河區哥爾察克的叛亂，佔領了頓河區並開始了反蘇維埃的進攻。

在伏爾加河中游和在西伯利亞一帶，由協約國英法兩國陰謀而組織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

本來，這個由軍事作唐組成的軍團，曾被蘇維埃政府允許經過西伯利亞和遠東而開回自己祖國去的。不料它却在半途被「社會革命」黨人和協約國所利用去舉行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受蘇維埃政權的死敵——「社會革命」黨領導的反革命組織，遵照協約國的命令，準備在莫斯科及其附近的二十三個城市中舉行暴動。協約國的預定計劃，是要和這些暴動同時，使捷克斯拉夫部隊在東方和反革命組織在蘇俄中部發動反黨蘇維埃政權，並且使自己的軍隊從北方進發，來對進加以策應和援助。因為全俄肅清反革命特別委員會機關的警告性，因為處置的時機適宜，致他們預定在某些城市中的反革命暴動，大部份都沒有成功。結果協約國也只能部份地執行了自己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聯合出動的計劃。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遵照協約國的直接命令，捷克斯拉夫軍隊在他們那時駐紮的區域中開始了暴動。在幾天內，捷克斯拉夫軍隊就佔領了馬魯斯克、切那賓斯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現在的新西伯利亞）、潘治、奧木斯克和海參崴，並且在鐵路區中，成了伏爾加流域、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區的主人。捷克斯拉夫軍隊的首領們，用了關於蘇維埃政權如何要把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由德奧軍隊中逃到俄國來的捷克斯拉夫軍隊集合起來，仍把他們交給德國人和奧國人的假話，恐嚇了自己的士兵。對於受了欺騙的士兵，唆使他們起來自衛。事實上，捷克斯拉夫軍隊恰好是協約國手中的盲目工具。

德國未曾參加，而且也不能參加這羣體的武裝干涉，這至少是因為它那時還處在與這個聯盟交戰的狀態中。但是，雖然有這種情況，以及雖然有德和約的締結，而蘇維埃政府却深信德皇威廉政府之為蘇維埃國家底惡敵人，也正如協約國武裝干涉者一樣。而且實際上，德國帝國主義者是作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情，以便孤立、削弱和滅亡蘇維埃國家。他們從蘇維埃俄國奪去了烏克蘭，並實行慘無人道地搶劫和壓迫烏克蘭人民，禁止烏克蘭人民與蘇維埃俄國保持任何連繫，他們又從

蘇維埃俄國奪去了南高加索，並藉口格魯細亞民族主義者和阿才倍羅民族主義者請求而派來德國軍隊和土耳其軍隊進駐該地，並開始在第夫里斯和巴庫肆意橫行。他們在暗地裏，多方面地以軍火和糧食援助當時在頓河區活動的叛亂將軍克拉斯諾夫去反對蘇維埃政權。

當蘇維埃國家正準備着作反對外國武裝干涉的新的戰鬥時，在西歐，在交戰國後方和前線上發生一決定意義的事變。德國和奧國被戰爭和糧食恐慌壓迫得呻吟喘息。當英國、法國和美國運用着一批批新的後備時，德國和奧國却已用盡最後一點後備。同時，在德奧兩國內部，又沸騰着人民的義憤，反對延綿不已的和禍國殃民的戰爭，反對把人民淪於筋疲力竭和飢寒交迫境地的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十月革命之偉大的革命影響，蘇俄兵士與德奧兵士還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前就已在戰線上實行聯歡，以及與蘇維埃俄國停戰並與它締結和約這事實本身的影響，在這裏也是起了作用的。在俄國，人民用推翻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方法達到了停止他們所痛恨的戰爭，——這個實例，不能不是對於德奧工人的教訓。曾駐在東方戰綫，而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後又被調到西方戰綫的德國兵士，不能不以其關於跟蘇俄兵士聯歡以及關於蘇俄兵士已如何擺脫戰爭的敘述，去瓦解當地的德國軍隊。至于奧國軍隊，則它還在更早就因為上述原因而開始瓦解了。

因為有這一切情況，所以在德國軍隊中間就加強了要求和平的趨向。這些軍隊已經失去從前那樣的戰鬥力，於是他們就在協約國軍隊進攻之下開始退却；而在德國本國內，則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爆發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德國不得已而承認自己為戰敗國，並向協約國求和。

從蘇維埃政權底地位方面看來，這個情況是有一些不良的影響，因為它使那些組織武裝干涉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協約國變為歐亞兩洲的統治力量，給他們以可能來加強武裝干涉，並組織對蘇維埃國

家的封鎖，更加緊圍困蘇維埃政權。（而結果正是如此，這是我們在下文中就可以看見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協約國把德國打敗這個事實，却也有在基本上有利于蘇維埃國家地位的良好影響：第一，蘇維埃政權得到了可能來取消掠奪性質的布列斯特和約，停止支付賠款並進行公開的軍事的和政治的鬥爭，把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白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南高加索從德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第二，在歐洲中部，在德國，共和制度和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之存在，曾應當使歐洲各國革命化，而且果然已使歐洲各國革命化了，這個情況就不能不鞏固俄國蘇維埃政權底地位。固然，當時在德國所發生的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那裏的蘇維埃，又成了資產階級國會底馴服工具，因為在那裏的蘇維埃當中，社會民主黨人，也如俄國孟什維克一樣的妥協派，佔統治地位；而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這個革命是軟弱無力的。然而這終究是一個革命，威廉是被推翻了。

各協約國戰勝德奧以後，就決定調遣大批軍力來反對蘇維埃國家。自德國遭受失敗並將其軍隊從烏克蘭和南高加索撤退以後，英國和法國就起而代替德國，把自己的軍隊駛入黑海，並在敖德薩和南高加索一帶，派自己的軍隊登陸。協約國武裝干涉者在其所強佔區域中的專橫達到如此殘暴的程度，他們竟不惜以武力摧殘整批整批的工農人民。在佔領土耳其斯坦以後，武裝干涉者又大批地槍殺無辜民衆。經過一些時候，武裝干涉者就宣佈對蘇聯的封鎖。蘇俄與外界交通的一切海路以及其他路線，都被塞斷了。於是，蘇維埃國家就陷於幾乎四面都被包圍的地位。當時，協約國把主要希望寄託於海軍上將哥爾察克，而哥爾察克當時駐在奧姆斯克城，乃是協約國在西伯利亞的走狗。它們宣佈哥爾察克爲蘇俄最高執政者，俄國整個反革命勢力都須服從他指揮。

一九一九年春，哥爾察克聚集了巨大軍隊以後，幾乎進到伏爾加河。爲反對和消滅哥爾察克起見

，蘇維埃政府乃動員了廣大的革命力量。結果，由於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方面，紅軍會得到在白軍後方發生的強大游擊運動之援助，蘇維埃政府終於打敗了哥爾察克，並把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從白軍手裏解放出來。一九一九年夏，帝國主義者責成西北反革命首領（在波羅在海沿岸，在彼得格勒附近）尤登尼奇將軍進攻彼得格勒，來轉移紅軍對東方戰線的視線，駐守在彼得格勒附近兩個砲台上的部隊，接受了舊時軍官底反革命的煽動，掀起了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而在前線參謀部中又發現了反革命的陰謀，彼得格勒處在敵人威脅之下了。但是，蘇維埃政權採取了適當的辦法，在工人與海軍兵士援助之下，把兩個舉行叛亂的砲台從白軍手中解放出來了。尤登尼奇底軍隊遭受慘敗，連尤登尼奇自己也被驅逐到愛沙尼亞去了。

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附近的慘敗，就使反哥爾察克的鬥爭易於進行。一九一九年末，哥爾察克底軍隊，被紅軍完全粉碎了。哥爾察克本人被擒，並在伊爾柯次克被革命委員會判決死刑，當即執行槍決。當時，在西伯利亞民間，唱出了關於哥爾察克的歌謠：「英國的軍裝，法國的肩章，日本的烟草，奧木斯克的執政王」。這意思就是說，在哥爾察克這些反革命的俄國將軍背後，顯然是站着帝國主義列強，沒有它們的策動和資助，俄國的嚴重內戰是不可能的。

武裝干涉者既看到哥爾察克沒有實現它們對他所抱的希望，就改變它們進攻蘇維埃共和國的計劃。駐紮在敖德薩的德戰隊不得已而調回去了，因為武裝干涉者軍隊在與蘇維埃共和國軍隊接觸時受到革命精神的薰染，並開始舉行起義來反對自己的帝國主義統治者。例如，在敖德薩地方，法國海軍兵士曾在安得列·馬爾梯領導之下實行起義。因此，這時在哥爾察克被消滅之後，協約國就把主要視線轉向鄧尼金將軍身上，而鄧尼金乃是反革命「義勇軍」的組織者，在這個時候，鄧尼金是在南方，在

庫班一帶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勾當。協約國就以大批武器和金錢供給鄧尼金底軍隊，並把它向北移動去反對蘇維埃政權。

爲組織擊潰鄧尼金起見，布爾塞維克中央特派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奧爾忠尼次基、布強尼四人到南方戰綫，拜洛斯基被撤消南方戰綫上紅軍作戰的領導。因爲在斯大林四人到此以前，南方戰綫指揮部與托洛斯基共同擬定了一個計劃。按照這個計劃，要由沙麗城經過頓河草原而達諾伏羅斯克城去攻擊鄧尼金；可是，經過頓河草原，紅軍將會在自己途程上遇到交通完全不便的地帶，而且必須經過哥薩克居民區域，而當時有頗大一部分哥薩克人，是處在白黨影響之下的。斯大林給了這個計劃以嚴厲的批評，並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關於粉碎鄧尼金的計劃：經過哈爾科夫——頓巴斯——羅斯托夫而給鄧尼金以主要打擊。這個計劃，能保證紅軍迅速前進去反對鄧尼金，因爲紅軍是經過工農區域前進，所以沿途就能得到居民方面的同情援助。同時，在這個區域裏有豐富的鐵路網，這就使紅軍有可能來保證一切必需品的經常供給。中央採納了斯大林底計劃，於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下半月，鄧尼金經過殘酷抵抗以後，就在奧勒爾附近以及在沃龍尼什附近的決戰中被紅軍擊破了。

帝國主義者看見白黨軍隊已被擊潰，武裝干涉沒有成功，蘇維埃政權又在全國鞏固起來。而同時在西歐方面，工人由于武裝干涉者進攻蘇維埃共和國戰爭而發生的義憤，又日益增長，於是帝國主義者就開始改變自己對蘇維埃國家的態度。到一九二〇年一月，英、法、意三國就決定停止對於蘇維埃俄國的封鎖。而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蘇俄就與英國代表在哥本哈根開始了關於交換戰時停火的談判，其後又和法國、奧國、匈牙利也開始了同樣的談判。

但是，雖然如此，雖然哥爾察克和鄧尼金已被擊潰，雖然蘇維埃國家已從白軍和武裝干涉者手中

收復了北方邊疆、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頓河區、烏克蘭以及其他等地，而因此擴大了自己的領土；雖然協約國不得已而取消了對俄國的封鎖，但是各協約國一想起蘇維埃政權已成爲牢不可破的，已成爲勝利者的事實，總是不肯甘心。和這有關聯的一件事情，就是：雖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九日，蘇維埃政府就與羅馬尼亞總統部的代表簽訂協定，根據這個協定，羅馬尼亞必須在兩個月以內退出比薩拉比亞，但是羅馬尼亞不執行已經接受的義務，並因協約國的影響，吞併了比薩拉比亞。

雖然協約國內部因爲分配勢力範圍發生了紛歧，但是它們還是決定再來實行一次武裝干涉蘇維埃國家的嘗試。在這一一次，武裝干涉者們決定：一方面利用波蘭軍閥皮爾蘇斯基；另一方面，利用弗蘭格爾將軍——他當時在克里米收集鄧尼金軍隊殘部，並從那裏威脅頓巴斯和烏克蘭。正像列寧所形容的一樣，地主波爾皮爾蘇斯基和弗蘭格爾，乃是那企圖撲滅蘇維埃國家的國際帝國主義的兩隻手。當時皮爾蘇斯基的計劃，是要佔領蘇維埃烏克蘭的第尼泊河右岸部分，佔領蘇維埃西白俄羅斯，在這些區域中恢復波蘭地主的政權，擴大波蘭國家境界。它們那時的行動方針，是「由一海到另一海」，即由俱澤到敖德薩。並爲酬報弗蘭格爾所給他們的幫助起見，也來幫助弗蘭格爾擊破紅軍，企圖實現蘇維埃俄國境內恢復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陰謀。

這個侵略計劃一經各協約國批准，就着手佈置實行。蘇維埃政府爲保持和平並預防戰爭起見，曾再三企圖與波蘭開始作外交談判。可是這種善意企圖，不但沒有得到善意回答，反而遭受了惡意的拒絕。因爲波蘭反動統治者皮爾蘇斯基根本不願談判和平，只一心想要戰爭。他曾打算着：在與哥爾察克及鄧尼金作戰已陷于疲勞的紅軍，將不能抵抗波蘭軍隊的進攻。

一九二〇年四月，波蘭軍隊闖入蘇維埃烏克蘭境內，並佔領基輔。同時，弗蘭格爾也轉爲進攻，

並威脅着頓巴斯。爲答覆波蘭軍隊的進攻，紅軍就開展全線總反攻，而在收復基輔，並把波蘭地主驅出烏克蘭和西由俄羅斯以後，南方戰線的紅軍，就更猛烈進攻，直逼加里細亞省的里烏夫城下，而西方戰線的紅軍，則已逼近華沙。波蘭軍隊因無力繼續作戰，才不得不放棄自己企圖佔領烏克蘭的第尼泊河右岸部分和白俄羅斯的計劃，而與蘇俄訂立和約。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蘇俄就與波蘭在里加城訂立和平條約。在這次外交談判中，波蘭反動統治者皮爾蘇斯基雖屬敗軍之將，但因持有協約國作奧援，竟依然橫橫地把加里細亞和白俄羅斯的一部分攘爲己有，以後蘇波邊疆問題的糾紛，即由此而起。

蘇維埃共和國既與波蘭訂立和約，乃決定集中力量消滅弗蘭格爾。弗蘭格爾從英法方面領得最新式的武器如鐵甲汽車、坦克、飛機及其他軍需品。他擁有白軍的突擊部隊，主要是軍官部隊。然而，弗蘭格爾在他所謂往庫班和頓河區的陸戰隊周圍，並不能收集得多少農民和哥薩克勢力，蘇維埃共和國却取得了比以前較好的政治優勢。因此，雖然弗蘭格爾擁有技術優勢，雖然紅軍沒有坦克，而紅軍終于把弗蘭格爾驅逐到克里米半島上去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紅軍奪得皮列可普的堅固陣地，突入克里米，粉碎了弗蘭格爾軍隊，克里米就爲蘇維埃所有了。

一九二〇年初，協約國列強決定放棄武裝干涉政策，取消對於蘇俄的經濟封鎖，並由西伯利亞撤退軍隊。這使日本強盜的侵略政策，也多少發生動搖。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阿穆爾州的日軍開始撤退，到三月三日撤盡。八月間，日本政府公開承認：

「歐洲一般的情況，是表現着紅軍在波蘭戰綫上的勝利，蘇維埃政府的威脅的日益增長，美國和中國對日惡感日益明顯，所有這些，都迫使我們不能完全進行西伯利亞的政治計劃。目前的形勢

，使我們暫時放棄佔領西伯利亞的計劃，我們只好把有日軍的地方鞏固起來。」

估據後貝加爾省的日寇軍隊，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撤退完畢，十月二十一日，估據伯力的日寇軍隊也全部撤退。但是這些撤退的軍隊，並不是撤回日本，而是集中在濱海省。同時，又由中東路把後貝加爾省內尚未去的殘部和滿洲里的白俄軍隊都送到濱海省。這正如日本政府所宣布，是要「把有日軍的地方鞏固起來」。這地方，就是濱海省。日本帝國主義要經過以它的力量扶助白俄傀儡政權的方式，鞏固它對於濱海省的佔領和統治。據遠東共和國獲得和公布的日軍與白俄外交上的秘密文件，明白寫着：

「日本再度佔領西伯利亞後，則將在日本的監督與保護之下，組織傀儡政府，而日本則允許以財政和武裝供給謝米諾夫以進行反對遠東共和國的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濱海省組織傀儡政權的目的，是在扶助反革命勢力，以破壞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雷英、法、意三國外交部，指出：

「海參崴的白黨只有極少數的人，但在日軍刀槍保護之下，突然奪取了該城的政權。同樣的變動，在梭城子以及其他日軍強佔的地區內也都實現了。日軍就這樣地，用武裝的力量把最陰險的反革命勢力在它強佔地區內扶植起來了」。

在協約國已經從西伯利亞撤兵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仍不肯放棄侵略西伯利亞的企圖，而盤據在濱海省，這不僅爲蘇俄所反對，而且是協約國也都不能表示同意的。特別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美國倡議召集華盛頓會議，使日本帝國主義感覺到不安。因此，爲了緩和各國的反對，爲了掩護它的侵略行動，日本帝國主義在表面上，故意裝出願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的老態，而於一九二二年八

月二十六日，和遠東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暨林奉行所請大連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日本代表幣原，即以大連會議為盾牌，而在遠東問題總委員會中，對於它自己沒有完全從西伯利亞撤退的軍隊作如下的辯解：

「日本於一九一八年參與聯軍出兵西伯利亞，雖已於一九一九年達到目的，然日本因地理上關係及保護朝鮮領土的安全，是以未能與美國同時撤兵。

一俟俄國成立穩固政府或日本與俄國赤塔政府在大連會議有結果，日本在西伯利亞的駐軍即將全部撤退。至於北庫頁島的佔據，原由日人在廟街被害事件所引起。一俟俄國正式政府成立，自可圖圓滿解決。

日本聲明尊重俄國領土完整，信守不干涉俄國內政與各屬地之機會均等原則」。

其實，日本帝國主義決沒有誠意，它在大連會議中，也不會且不肯公平而合理地解決日俄之間的問題。它提出蘇俄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十七條苛酷的要求。它要求海參崴變為純粹的商埠，並受外國管轄，以便日本人民在遠東共和國領土以內，對於漁業、礦業、林業、航業等，都享有廣大的權利。遠東共和國政府並須保證「在自己區域內，永遠不實行共產制度」。海參崴區及和朝鮮毗連的所有海岸防務工事，必須破壞；在太平洋內的俄國軍隊須摧毀，永遠不得恢復。北庫頁島須租與日本，以八十年為期。日本強盜堅持：必須遠東共和國接受這些條件，日本才肯撤退濱海省的海軍，但並沒有明白指定撤退日期。這樣苛酷的要求條件，自然是要被遠東共和國所拒絕的。會議舉行了半年以上。到一九二二年四月，終於無結果而散了。

可是蘇俄軍民的勇敢的鬥爭，終非日本帝國主義所能征服，而處於國內外形勢都很不利的情况下

的日本帝國主義，更沒有征服蘇俄的可能。不管主觀上願意與否，而在客觀條件逼迫之下，日本帝國主義終于不能不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宣佈決定從濱海省撤退它所集中的軍隊，而是最後據點，也於十月二十五日放棄了。剩下的，只有北庫頁島還沒有交還蘇俄。在日本撤退海參崴以前，日俄雙方曾於九月四日，繼大連會議之後，舉行長春會議。日方代表為松平，赤塔政府代表為有名的越飛，而莫斯科蘇俄中央政府也派代表列席。在會議中，日本帝國主義者提出十項要求，即：

- 一、莫斯科和赤塔二政府須保障外僑生命財產的安全；
- 二、赤塔政府允許不再作有妨礙邊疆和平的宣傳；
- 三、開闢海參崴為自由港埠；
- 四、赤塔政府承認並尊重日本和遠東各國所締結的某類協定；
- 五、赤塔政府承認外僑得租賃土地以供經商之用，其租賃期為三十六年；
- 六、承認日人對於木業有投資及經營的權利；
- 七、承認日人在日俄共管下的開墾權；
- 八、承認日本在黑龍江的自由航行權；
- 九、修改稅則並解禁黃金皮貨的出口；
- 十、保護兩國間的商約關係。

這些要求和大連會議中的十七條要求，是同樣地苛酷而不合理，蘇俄政府當然加以拒絕。到日本帝國主義撤海參崴的日軍，赤塔的遠東共和國也併消後，乃由蘇俄政府出面，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和日本帝國主義，舉行所謂東京會議，以謀解決日蘇間的懸案。日本代表為駐波蘭領事川上

，蘇俄代表仍急赴拜，而馬中韓旋來，明爲日本聯俄論者東京市長後藤。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所提的條件，依然相當苛酷，爲蘇俄所不能接受，會議仍無結果而散。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曾提出六項要求，即：

「一、俄國允許日本以一萬萬五千萬元購買北庫頁島，或允許其長期租借；

二、關於廟街事件，俄國應向日本道歉，賠款；

三、日本在俄國遠東一帶，有伐木及探礦的權利；

四、俄國須承認日本借與沙皇政府的債款及和沙皇政府締結的條約；

五、俄國應與日本締結新商約以保障日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六、俄國應停止赤化宣傳」。

在這六項要求中，除第三項外，雙方意見距離甚遠，自無成立妥協可能。例如第一項，據中野正剛說，越飛曾索價十萬萬日元，而日本僅給價一萬萬五千萬日元，相差百分之八十五，這買賣如何做得成功！其實，即使日本真正給價十萬萬日元，蘇俄亦未必輕易出賣它的領土。何況蘇維埃國家底主要敵人，武裝干涉的主要敵人，到這時候在基本上已被擊潰，日本帝國主義固然十分燈檮陰險，到此時會也只好徒喚奈何了。

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些年間，在經濟上與技術上說都是處在很落後的地位；而蘇維埃國家底敵人，都是有著强有力的、有新技術裝備的，從脚跟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列強。蘇維埃國家到內戰開始以前，幾乎沒有任何的軍隊，沒有用來建立新軍隊的指揮幹部。它的敵人却有好幾百萬受過訓練的軍隊，和在帝國主義四年戰爭中受過鍛鍊的善戰的軍官幹部。紅軍在技術裝備上是非常薄弱的，據伏羅希

洛夫的估計：那時候，紅軍由舊軍隊繼承了自己的武裝，這些舊軍隊是歐洲最落後的軍隊。在內戰期間，紅軍的技術，只能靠那些軍備來改善，這些軍備是在戰鬥中由白衛軍和外國干涉者方面奪取來的。干涉者的武裝力量，有着無數的軍需品的供給，而蘇維埃國家却處在敵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遭受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封鎖。可是在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國家和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帝國主義方面有着一切勝利條件的鬥爭中，蘇維埃國家在這個鬥爭中却獲得了勝利。

應該怎樣來解釋蘇維埃國家這個勝利呢？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紅軍所奮鬥擁護的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是適合人民利益的正確政策，因為人民覺悟和理解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是自己本身的政策，於是就一貫到底擁護了這個政策。我們知道：為着不正確的、人民所不擁護的政策而鬥爭的軍隊，是不能勝利的。外寇干涉和白黨的軍隊，就正是這樣的軍隊。外寇干涉者和白黨的軍隊，曾具有一切：有着老練的指揮官，有頭等的武器，有彈藥，有服裝，有糧食，只是缺乏一件東西——這就是俄國各族人民的擁護和同情。因為俄國各族人民不願意，而且也不能擁護武裝干涉者和白黨軍隊底反人民的政策。於是，武裝干涉者和白黨底軍隊，終遭失敗。紅軍是人民的產兒，因為它始終一貫地忠實於解放事業和忠誠於自己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愛戴和擁護它，認為它是與自己血肉相關的軍隊，正因為如此，紅軍就能得到勝利。

這就是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終結，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底有歷史意義的勝利。蘇維埃共和國保持了自已的國家獨立，自己的自由生存。

第五章 和平建設時期的蘇聯外交政策

第一節 和平建設初期蘇聯與各國復交活動

蘇維埃國家結束戰爭以後，就開始過渡到和平的經濟建設軌道。這時，武裝干涉者既然已從蘇維埃國家全境被驅逐出去——一九二二年十月，蘇維埃共和國取得了巨大的勝利：紅軍和遠東遊擊隊把海參崴，即最後一塊陷於武裝干涉者手中的蘇維埃國土，也從日本武裝干涉者手中解放出來了。而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的任務，又要求更加鞏固蘇維埃國家各民族底聯盟，於是關於各蘇維埃共和國更親密聯合於統一的國家聯盟中的問題，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爲了把一切人民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爲了要組織堅固的國防，並且也爲了要保證蘇維埃國家所有各民族底各方面的發展，都須要使蘇維埃國家所有各民族更加密切接近起來。

爲着上述目的，它們便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根據列寧和斯大林底提議，成立了各民族自願的國家的聯合，定名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爲蘇聯。最初加入蘇聯的，有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久以後，在中亞細亞又組織了三個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烏茲別克蘇維埃共和國，土爾其曼蘇維埃共和國和塔什克蘇維埃共和國。並且，所有這些共和國都抄襲原則而聯合於統一的蘇維埃國家聯盟，即蘇聯之中，同時爲每一個共和國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成立，就是表示蘇維埃政權之鞏固，和布爾塞維克黨關於民族問題底列寧——斯大林政策之偉大勝利。

到這個時候，國際形勢已經變更。資本主義抵抗住了羣衆在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實行的第一次革命進攻。在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波蘭及許多其他國家所發生的革命運動，都被鎮壓下去了。在西歐，資本主義底暫時的局部的穩定到來了。

和資本主義穩定並行的，就是蘇聯的穩定。不過，這兩個穩定是彼此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的穩定，並沒有除去那些撕裂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而且預告着資本主義新危機行將到來。而蘇聯的穩定則是表明說：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更加增長。雖然西歐方面的革命遭受了失敗，但是蘇聯底國際地位仍然繼續鞏固着，不過是比較慢速度鞏固着。

一九二二年，蘇聯被邀請參加在意大利一個城市——熱拿亞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在熱拿亞會議（Genoa Conference）上，各帝國主義政府，既然因資本主義各國革命遭受失敗而氣餒增長，乃企圖對蘇維埃共和國實行新的進迫，不過這一次是用外交形式而已。帝國主義者向蘇維埃國家提出了橫蠻無理的要求。它們要求把已由十月革命所收歸國有的工廠交還外國資本家，要求清償舊俄沙皇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債。帝國主義列強聲稱：如果蘇聯接受並實行這些條件，它們可以給蘇維埃國家以不大的借款。

蘇聯拒絕了這些要求，熱拿亞會議沒有什麼結果。

帝國主義列強所以向蘇聯提出這種要求及其遭受拒絕，都有它一定的背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和蘇維埃國家在武力上第一次的搏戰，終之以蘇維埃國家的勝利。但是，接着那搏鬥却突入了經濟的範圍，突入到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的艱難事業上。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步，就是取消那爲應付內戰和干涉戰爭的需要，而暫時採行的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或定額徵發制，而代以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

政策。新經濟政策在當時曾被資本主義世界廣泛地誤解爲退却，實際上這是奠定了五年計劃進展的基礎。新經濟政策是原始農業和落後工業國家中建立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它的作用就是把經濟的力量——如銀行、大工業、運輸、對外貿易，以及一般經濟的統制等——集中於工農政權的手裏，在小型經濟範圍中，仍讓私人貿易自由存在着，而只一步一步地由新的集體組織去代替。因此在開始的時候，國營和合作社的部分，或集體的部分，較之私營部分要少得多，雖然國營和集體部分的比例是在日益進展着。

在這個時期中，帝國主義武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企圖既告失敗，乃轉而希望新政權之經濟的崩潰，及其向資本主義必然的投降，一面即行計劃着經濟力量的侵入。一九二二年十月，英國財政大臣霍恩（Mr. Robert Horne）曾很坦白地宣布了這新的希望：

「摧毀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最好的途徑，就是用高尚的商業方法侵入這巨大的國家」。

上述熱拿亞會議的企圖，也是受這同一的策略所支配。爲實行這一企圖，英國保守黨領袖鮑爾溫並提出一個通過德國以開拓蘇聯市場的計劃，企圖從俄國工農取得戰債和賠款最後的償付：

「就我看來，我們所要分享的世界貿易，最好的辦法當由德國去發展俄國的貿易，出超的收入便可作爲償付賠款之用，因而也可多少償付我們對美戰債的利息」。

很明顯的，它們是想把蘇聯作爲帝國主義列強的市場，最後則把蘇聯恢復爲資本主義制度。蘇聯爲了保持它們的革命果實，自然只有採取拒絕之一途。

帝國主義列強爲想強迫蘇聯接受它們的條件，又曾提出新武裝干涉，作爲威脅。英國外相克爾遜於一九二五年對蘇聯所提出的最後通牒，就是這種威脅的明顯表示。但是，蘇維埃國家到這時候，業

已踏定脚跟，經濟和政治力量都穩固發展到相當程度，所以對於這種新干涉的威脅，能穩穩以相當當硬的回擊。而資本主義國家既已覺察到蘇聯埃成權底堅固性，就與蘇暫時放棄武裝干涉的企圖相轉而與蘇積極復發關係命在廿九日四年當軍界蘇聯與英國、法國、日本以及意大利的邦交關係都恢復了。當時看得很明白，蘇蘇維埃國家已經取得整個和平時期了。

爾然就這種相交關係的恢復，並非一個風順雨而無阻。例如蘇聯與日本邦交關係的恢復，其曲折經過頗為複雜。而前已述說蘇聯的共產黨會議沒有結果，長春會議沒有結果，而東京會議又沒有結果，這似乎表示着日蘇關係尚有調整的可能。然則而客觀環境的要求，使日本帝國終不能不承認蘇聯的共產黨會議。而締結所謂「北京條約」，而同時交還北庫頁島。先是蘇聯駐華代表加拉漢在東京會議停頓後，曾向日蘇駐華公使勞羅薩吉建議在東京續開日蘇談判。適值一九三四年五月，日本國會總選舉的結果，政府反對黨大勝，獲得主分之政權。以最近反動的政黨政友會為支配力量的清浦內閣登台，而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主義政黨憲政會的加藤內閣繼起。新內閣的對蘇政策是出較妥協的，因而在是年八月，終於與會勞羅薩吉接受加拉漢建議，舉行北京會議。在談判的過程中，曾繼續過四出聯次的會商，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締結了北京條約。其中最重要的條款如下列各項：

一、日蘇兩國政府約定條約生效後，互派使節和領事。

二、兩國政府承認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締結的朴資茅斯條約繼續有效。

三、兩國政府於本條約生效後，須考慮一九〇七年日俄海約締結後一切事態的變化，可以修改該海約；在未修改以前，蘇聯政府關於租借漁區與日本人民之應照一九二四年的成例辦理。

四、兩國政府於本條約生效後，應根據下列原則，重訂通商及通航條約：

(1) 兩國根據其本國法律，允許彼此的人民有入境、遷移、居住的完全自由，以及生命、財產的永久充分保障；

(2) 兩國根據其本國法律，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並在相互的條件下，允許彼此的人民享受私有的財產權及從事商業、航業、礦業及其他和平職業的自由；

(3) 締約國的任何一方，不得用賦稅等限制手段以妨礙兩國商業及其他的關係。關於貿易、航業、實業方面，雙方應以最惠國的權利互相待遇。

五、兩國希望彼此和平，互相尊重彼此在法權內自由處置自身事務的權利，並在法權內自由處置下述事項的權利，即某項公務人員及受政府津貼團體以秘密或公開的行動侵害蘇聯或日本任何一部分領土的和平與安全。

締約國雙方政府不准有下列二種情事於自己的領土內存在：

(1) 宣稱爲對方任何一部分領土的政府的團體；

(2) 從事政治活動企圖組織前項團體的外國人民。

六、蘇聯政府特許日本人民、公司、團體在蘇聯領土內，得從事開礦、伐木及開濬其他天然資源。

此外，日本帝國主義交還了它所佔領的北庫頁島，而蘇聯則給予日本以它在北庫頁島所調查測量的石油田之中的百分之五十的租借權。像這樣，日蘇之間以外交折衝結束了武力衝突，而他們之間曾經極度尖銳化的對立和矛盾，是一時和緩了。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所以不得不忍痛放棄武力侵略蘇聯的企圖和行動而採取外交折衝的方針，在相

當讓步的條件下，和蘇聯締結所謂「北京條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日本人民一致要求承認蘇聯，停止侵略，這使違反民意的清浦內閣垮台，而代之以加藤內閣，新內閣的對蘇政策自不能不多多少少反映民意。在一九二〇年西伯利亞撤兵之前，日本軍隊中，已經瀰漫着反戰運動。例如是年二月二十八日，海參崴日軍司令部會把整個一連士兵和軍官，全部繳了械，原因就是反戰。又如是一月，日本報紙自己所登載：

「西伯利亞軍事法庭判決監禁的士兵人數一天一天地增加着。凡從海參崴開到日本去的輪船，沒有一次不載走幾個被擄的士兵」。

甚至參加侵蘇戰爭的西川少將也說：

「就事實論，朝鮮及日本在俄僑民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危險。當時，我曾向當局提出我的意見，可是誰也沒有去注意。大軍在那裏停據二年有半，耗費若干國帑，實爲一件憾事」。

同時，在日本國內，反對武裝干涉蘇俄，要求撤兵西伯利亞的運動，也鬧得如火如荼。不僅是日本先進人士組織了「反對武裝干涉俄國同盟」，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由濱海省撤兵，正式承認蘇俄，與蘇俄建立正常通商關係，不僅是日本工人農民到處舉行示威運動，要求把日軍從西伯利亞撤退；而且日本資產階層也贊成這種要求撤兵的運動。反對武裝干涉蘇俄，要求西伯利亞撤兵，差不多已成爲日本人民全國一致的要求。比如中野正剛，盡人皆知他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代言人，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雖然是積極地主張侵略南洋，但同時也公然反對蘇聯。但是在那個時候，他還是資產階級政黨憲政會的鬥士，他曾曾在日本第四十六屆議會中，提出「政府應迅速承認蘇聯政府，確立並貫徹對蘇國策的根本方針」這樣的一個決議案。在說明這個決議案的理由時，他曾關於廟街事件爲蘇聯辯

護，而痛罵日本軍閥。他說：

「廟街事件是由於日本陸軍當局的命令，在出兵中，朝令夕改所引起，而發生於日軍警備區域內的事情。其責任當然在日本陸軍當局。當時，日本軍閥頭目還有一些不值錢的宣傳家，聰明地公然主張爲了雪廟街事件之恥，必須食俄人的肉而寢其皮。但我們則以爲關於這件事，不應該食俄人之肉而寢其皮；應該被食其肉而寢其皮的，倒是日本軍事當局。」

他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東方時論」上所發表的「日蘇交涉的暗礁」一文中，更指出：

「當我們對民衆說明：『廟街事件的責任者不是俄人，而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政治家。軍閥們曾宣傳應該食俄人之肉而寢其皮，但日本國民不能不食這些日本政治家之肉而寢其皮，爲因他們以無辜的國民，供了慘劇的犧牲』時，民衆不覺拍手而歡呼」。

這不僅表示連中野正剛一流人及他所代表的階層，也反對日本軍閥藉口所謂廟街事件，去佔領蘇聯的領土，而且表示日本民衆是如何同情蘇聯而痛恨軍閥。像這樣，在日本全國人民的要求和壓迫之下，日本帝國主義在對蘇政策上，自然不能不改絃更張了。

其次，國際形勢也不利于日本，而利于蘇聯；日本已處于孤立的地位，勢不能再一意孤行地繼續侵略蘇聯。本來，武裝干涉蘇聯，出兵西伯利亞，雖爲協約國的共同行動，但最積極，最賣力氣，出兵最多，進攻最力的，則爲日本帝國主義。而日本帝國主義在西伯利亞的擴張勢力，正引起了其他協約國列強的忌嫉和反對。特別是美國表示得最露骨。還在撤兵之前，日美之間，便存在着種種矛盾和衝突。斯台勃諾夫曾有這樣的記載：

「日本的競爭者只是在工業和財政方面強，而在軍事關係上弱的美國人。這種競爭，在目前的場

合，是日本人對美國人採取着一種嘲弄的態度。例如最近日本人派到西伯利亞的軍隊超過了出兵協定所規定的人數，會引起美國的抗議。但是日本人的回答，却是冷笑和譏諷。日本人說，如果美國能派出日本無論如何不能派出的更多的軍隊到西伯利亞，則日本是一點也不表示反對的。中島將軍及其他日本將校曾經亞細亞式地，到處煽動其他同盟者特別是我們俄國人，說美國人是露骨的布爾塞維克的共鳴者」。

英國西伯利亞派遣軍司令官王爾德中校也說：

「忽視日美雙方的執拗的鬥爭，實為英法的大誤。這對於協約國在遠東所實行的善事，非常地給與了毒害。在地球的那一方面的這兩個國家的競爭已是最有名的。而阻止他們的競爭，實有必要。他們爲了權利和貿易，自然要延長這一競爭。希望他們爲了無私慾地援助俄國而忘却這種競爭，那恐怕是過大的期待」。

這還表示着，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在西伯利亞出兵的問題上，曾經起過極大的摩擦，致使英國方面也認爲不能袖手旁觀。

到協約國決定並且實行撤兵西伯利亞，而日本帝國主義獨盤據濱海省，遲遲不肯撤兵後，美國遂在一九二二年一月的華盛頓會議上，作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聲明，即：

「美國政府無論現在和將來，都不能承認由目前佔領西伯利亞所產生的任何要求或地位」。

日美衝突的結果，使當時羽毛未豐的日本帝國主義不能不一方面對美國讓步以緩和緊張的局勢；他方面，向蘇聯妥協，幻想聯蘇以抗美。於是侵略西伯利亞的企圖暫時被放棄，而所謂北京條約遂締結了。

第三，是由于蘇俄國力的加強及其軍民的英勇的鬥爭，在事實上，到處擊潰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及其所驅使的白黨，使日本帝國主義不可能貫徹其武力干涉政策。如前所述，一九二〇年八月間，日本政府地恥公開承認「紅軍在波蘭戰綫上的勝利，蘇維埃政府的威脅將日益增長」，「迫使日本不能完全進行西伯利亞的政治計劃」，「不能不暫時放棄佔領西伯利亞的計劃」。何況在蘇聯的國力增強和外交勝利的條件下，一般的國際形勢都對蘇聯有利了。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英國工黨政府正式承認了蘇聯，隨着，法西斯意大利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承認蘇聯。又經過半年，曾經反蘇最力的法國也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承認蘇聯。此外，許多小的國家也都先後承認蘇聯：挪威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奧國是二月二十日，希臘是三月八日，瑞典是三月十五日，丹麥是六月十八日，阿爾巴尼亞是七月六日，墨西哥是八月一日，海地是八月六日，匈牙利是九月十二日。特別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蘇協定的締結，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極有力的刺激。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自己已完全陷于國際孤立的地位，而處于中、美、蘇聯的包圍之中了。這更使它不能不暫時放棄侵略西伯利亞的企圖而和蘇聯締結表示友好態度的「北京條約」。

新俄對於中國的外交關係，開始於一九一八年。是年七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長齊采林已通知中國之謂蘇維埃政府決定放棄帝俄時代在華所得的一切特權。後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蘇俄外交人民代理委員長加拉罕宣布第一次對華宣言，其內容如下：

「(一) 勞農政府宣布取消帝俄時代與中國所訂條約(一八九六、一九〇一)及與日本所訂密約(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六)，換言之，即付還中國人民以帝俄用欺詐手段直接攫取，或與日本暨協約國訂約內所得之權益；

(二) 退還庚子賠款全部（按庚子賠款共為四萬萬五千萬元，俄國方面實分得一萬萬三千二百餘萬元，佔總數三分之一）；

(三) 放棄在華一切特權及在華各工廠；

(四) 勞農政府即派全權代表與中國開議，取消帝俄與日本及其他協約國共同對華不合理之強暴行為，另訂一勞永逸之平等條約。

這個宣言在外交史上是空前創舉，根據中國外交界前輩吳鶴宸先生的研究；這個宣言，「完全為中國打算，絲毫沒有為她（蘇俄）本身利害而設想，寫的何等痛快淋漓，令人感動，若是由我們中國方面任何外交家或律師來起草，亦未必有那末周到詳盡，算是把中俄數十年來新仇舊恨一筆勾消，是何等快人快事」（見蘇文化半月刊十二卷十期）。

當時這消息傳到中國，全國人士受寵若驚，歡欣鼓舞，尤其是教育界及學生方面，正在拒絕巴黎和會之後，在國際上感覺苦悶的時候，對於蘇俄這種自動放棄特權的宣言，格外表示好感。但是那時北俄政府却昏聩反動，甘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卵翼和支配，對於蘇維埃政府這種好意，不但不接受！而對帝俄駐華代表，反依然優禮待遇，照常撥付庚子賠款，使人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時蘇維埃政府對中國政府未答復第一次宣言，使中蘇兩國不能早日恢復邦交，引為遺憾，遂又宣布一九二〇年對華第二次宣言，內容與第一次宣言相同，也是聲明願意自動放棄在華一切特權，不過加以五惠之限制，如宣言聲明放棄在華治外法權，但中國人民在蘇俄境內，亦須遵守蘇俄法律等。這本是平等五惠關係應有之義，所以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與第一次對華宣言比較起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蘇俄自宣布第二次對華宣言之後，遂派侵林爲全權代表，釋蒙古至北京，希望與中國政府訂立新約。時北京政府仍受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控制，不敢與蘇俄開議。一九二二年夏間越飛應派來華，對於中蘇邦交促進甚多，尤其以和國父孫先生訂立「孫文越飛協定」，對於中國革命推動甚大。因北京軍閥政府仍不肯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故談判仍無結果。於是加拉罕率命來華，全國人民要求恢復邦交的運動，較前益爲高漲，且當時英意兩國均已正式承認蘇聯，中國政府勇氣稍增，於是幾經波折，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簡稱中蘇協定）終於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由加拉罕代表蘇聯政府與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同時簽字。茲將其中條款，錄之如左：

「一、本協定簽字後，兩締約國之平日使領關係，應即恢復。中國政府，允設法將前俄使領館舍，移交蘇聯政府。

二、兩締約國政府，允於本協定簽字後一個月內，舉行會議，按照後列各條之規定，商定一切懸案之詳細辦法，予以施行。此項詳細辦法，應從速完竣，但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過自前項會議開始之日起六個月。

三、兩締約國政府，同意在前條所定會議中，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蘇聯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定等項。

四、蘇聯政府，根據其政策，及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宣言，聲明前俄帝國政府與第三者所訂立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屬無效。締約兩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

第五、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屬於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在本協定第二條所訂會議中商定，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

第六、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担保，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爲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爲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

第七、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彼此將疆界重行劃定；在疆界未劃定以前，仍仍維持現有疆界。

第八、兩締約國政府，允將兩國邊界江湖，及他種流域上之航行問題，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則，在前條所定會議中規定之。

第九、兩締約國政府，允在前條所定會議中，根據上開原則，將中東鐵路問題解決：

甲、兩締約國政府聲明，中東鐵路純係商務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各司法民政軍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項，均由中國官府辦理。

乙、兩締約國政府，允將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之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均移歸中國。

丙、兩締約國政府，允將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解決附屬之款項數額及條件，暨移交中東鐵路北平續

丁、蘇聯政府，担任對於中東鐵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革命以前，所有股東持債票者，及

橫置人，負一切完全責任。

我、兩國政府，承認對於中東鐵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商決，不許第三者干涉。

已、兩國政府，允在本條約內項所規定各事未經解決以前，特行規定暫行管理中東路辦法。

庚、在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未將中東鐵路各項事宜解決以前，兩國政府，根據一八九六年

九月八日所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所有之權利，與本協定及暫行管理中東鐵路辦法，暨與中國

主權不相抵觸者，仍為有效。

十、蘇聯政府，允諸勳業前俄政府在中國任何地方，根據各種公約，條約、協定等，所得之一切

權利等特權及特許

十一、蘇聯政府，允諸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

十二、兩國政府，允諸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

十三、兩國政府，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中，訂立商約時，將兩締約國關稅稅則，採

取平等互惠主義，同時協定。

十四、兩締約國政府，允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討論賠償損失之要求。

中蘇協定簽字後，兩國邦交立即恢復，但必發生小小風波，即因內容關於奉方利益未能盡行履及

，為奉張所不滿。加撻登登派使一層，祕魯庫斯頓侯夫赴奉訂立奉俄協定，計條文七款，聲明書二種

，由庫氏代表加拉罕與奉方代表鄧讀等三人在奉天簽字，北京政府對奉俄協定起初曾提抗議，隨後也

就追認該協定併入中蘇協定大約有同等效力。

綜觀此中蘇復交經過及中蘇協定的訂立，對於前此帝俄政府，根據不平等條約所根據的種種權

利，中國於此得以明文收回。且所訂中蘇協定與華俄協定，完全根據平等精神，是中國與外國第一次所訂立的平等條約，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從此以後，中國民衆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便益發不可遏制了。

第二節 從參加軍縮活動到加入國聯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德奧同盟的失敗，當時國際力量的新對比，已經寫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賽和約中。凡爾賽和約的意義，就是造成一個國際的政治組織以鞏固戰勝國的統治，並在法律上確定這一權利。由於德國軍事的瓦解，提高了法國在歐洲的暫時政治霸權。破碎的波蘭，就在德國與蘇俄之間起了緩衝的作用，把它們彼此分開。在凡爾賽和約以後，法國在歐洲的外交政策之重心，是造成所謂小協約國的集團（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與波蘭一起，成爲法國在東歐與東南歐的政策執行者。

但是凡爾賽系統自其發生以來，就包含了內部的矛盾與瓦解的萌芽。事實上，凡爾賽和約剛剛締結以後，英法的競爭就十分明顯的表現出來了。這些矛盾特別明顯表現於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召集的羅加諾會議。英國打算由德國的復興對抗法國的霸權，以便自己起着仲裁與保證人的作用，而法國則企圖把保證推展於自己同盟國，即波蘭與捷克斯拉夫的邊界，但是英國不贊成。同時，根據英國的計劃，德國應該加入國際聯盟與反蘇集團，但是當時德國政府雖願縮結保證的協定，却不願放棄由一九二二年拉巴羅條約所確定的德蘇正常關係。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德國與蘇聯又締結了中立條約，使國際陰謀家促使蘇聯孤立的陰謀，歸於粉碎。

此時蘇聯在國際地位的增長，更明顯的表現於縮軍活動上。根據國際聯盟盟約，各會員國爲了和平，認爲必須限制國家的軍備到僅適於民族安全與執行國際義務的最低限度，但是在很久的時間內，國聯在事實上並沒有提出這一個問題。當各種矛盾開始尖銳與軍事衝突的危險重新增長的時候，縮軍問題才被提出來，於是通過決定，打算召集國際裁軍會議，開始了組織此種會議的各種籌備活動，而屢次都毫無結果。反而在許多和平決議與裁軍宣言的嘈雜中，帝國主義者開展了瘋狂的軍備競爭。可是，在這些年代，資本主義各國已不能不顧到蘇聯，已不能撇開蘇聯來解決比較重要的國際問題。

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國聯行政院已不得不致函蘇聯，請它參加裁軍的預備會議。蘇聯政府接受邀請參加縮軍工作，以便利用此種參加爲實際和平利益而奮鬥。蘇聯的提議，就是在四年之內做到普遍的全部的裁軍，這些提議，在預備委員會和裁軍會議中，先後被各帝國主義代表否決了。這個事實，使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列強的軍備競爭已使戰爭日益迫近，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解除自己競爭者的武裝，而使自己的武裝完整無缺。蘇聯提議的坦白和公平，剝下了帝國主義「和平」的假面具，而在各國人民的面前，暴露了真相。帝國主義的代言人，除了說這提議是一種「恫嚇」以外，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答。那是非常明白的，如果蘇聯的提議真的是恫嚇，那末帝國主義列強只要接受了再來說「恫嚇」好了。可是相反的，事實上，帝國主義列強却聯合起來把那建議否決了。這就充分地證明了它們感覺着這些建議之並非恫嚇，而在它們看來，倒是一種必須打倒的危險。以後蘇聯代表團又提出新的累進的按比例的裁軍方案，在這新方案中，蘇聯提議取消一切對於和平人民最危險的戰爭工具，即廢止一切重砲、轟炸機等，但這個新提案，在籌備委員會討論議定書時，也被置之不理。很然的，那裁軍會議是死亡了，甚至最低限度裁軍的一切企圖，也因帝國主義的矛盾而失敗。

重整軍備是向前席捲着，新的世界大戰的威脅是日益迫近了。正因為如此，蘇聯爲和平而進行的堅決不懈的鬥爭，引起了帝國主義者對它的極端忌恨。加以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中，各資本主義國家看到了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威脅。因此各帝國主義國家就採取各種辦法，以便給蘇聯以新的壓迫、干涉、破壞，至少阻礙蘇聯的工業化。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國反黨份子組織了對英蘇通商協會的挑釁和襲擊，五月二十六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佈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與商務關係。同時，在蘇聯境內，英國的間諜和軍事破壞者向列寧格勒黨俱樂部投擲炸彈，被炸傷者約三十人，其中有數人受傷甚重。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加入波蘭國籍的俄國白黨份子在華沙刺死蘇聯駐波大使沃伊柯夫。同年夏季，在柏林、北京、天津和上海，差不多同時發生襲擊蘇聯使館和商務機關的事件。

特別是在遠東，以五卅慘案開始的中國反帝運動，被英國保守黨內閣認爲是受蘇聯的唆使，因而它們極力策動反蘇運動以報復蘇聯。當英政府宣佈對蘇斷絕邦交時，保守黨的機關報「每日電報」曾說：

「由於斷絕邦交，英國對於在近東、中東和遠東的蘇聯的體面，給予了致命的打擊。在中國、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斷絕邦交的影響，大概要很快地實現出來罷；他方面，從芬蘭起到羅馬尼亞止的蘇聯鄰國，大概歡迎英國政府所採取的斷然態度罷。」

當時在法國執政的白里安內閣也曾經倡議組織有反美意味，但同時，主要是反對蘇聯的所謂「泛歐洲聯盟」，像英國曼哲斯特導報所指出：

「白里安被共產主義的危險弄得不知所措了，使蘇聯陷于孤立，已經成爲他底政策的主要目的之

一。我們有理由相信，使蘇聯孤立的願望，和他底泛歐洲聯盟的全盤計劃，是很有關係的。

但是，反蘇儘管反蘇，而實際上，在當時誰也沒有作戰的決心和勝利的自信。帝國主義陣營內敵對于反蘇政策，又難以協調。特別是第七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和一些弱小國家，都不肯替別人從火中取栗。在蘇聯方面，則始終堅持和平政策，對于帝國主義的反蘇願望加以及时的揭發，以原以蘇聯在國際外交活動中，反而非常活躍。

這道祖活躍狀態，除了前所說蘇聯參加某種活動以外，還表現在蘇聯與強國的商榷活動。這裏可以蘇聯對于日本的商務外交來作例。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北京條約締結後，是伯士到蘇聯，即在日本東京設立駐日蘇聯通商代表部，並在函館及神戶各設支館，以促進與蘇貿易關係。從那時候，北京到神戶的公航停止，日蘇間的貿易已有了飛躍的發展。至爾充分推論，蘇聯才點位自念不為不慮。從本年甫得一冊至次年九月三十日。

四年計

度

輸與日貨

輸與日貨總額

一九三五年

一〇三、五八〇

三三、七六三

。一九二六年

一一、六八一

一八、五八〇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五九五

三九、七三八

。一九二八年

二二、七六四

三六、八八七

對照上表，可知日蘇貿易無論在輸出和輸入上，都沒有例外地，表現着逐年增加的趋势。一九二九年度的貿易總額，比較一九二五年度竟激增二倍半乃至三倍。尤其在日蘇方面增進更速，日本向蘇聯的輸出，雖遠劣于輸入，但其激增的程度却遠超乎輸入。一九二八年度の輸出，達一千五百一十二萬。

三千萬元，比較四年前，增加五倍以上。對蘇貿易的利益，使日本帝國主義不肯輕易和蘇聯破裂。因為日本的大資本家對日蘇貿易，都採取着積極的態度。三井曾和蘇聯締結契約，一手經營在蘇聯對日輸出中佔重要地位的三道年（藥名）的輸入事業，和小麥等的輸出事業。而三菱則代王子製紙系的日俄木材公司和蘇聯國營出口貿易公司締結契約，經營在輸入品中，佔着大宗的木材，享有獨佔的輸入、販賣之權。這些大資本家的態度，無疑地是可以影響日本政府，使它不能不對蘇聯採取妥協政策的。

和貿易的發展同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根據北京條約，日蘇之間又締結了北庫頁島石油開採權利讓渡的契約。根據該契約，日本有在契約所規定的地帶開採石油的權利及經營已開發的石油礦的權利。前者有效期限十一年，後者四十五年。契約簽訂之後，日本資產集團如三菱、三井、日本石油公司、大倉、大原等大資本家，即紛紛投資從事開採。這種經濟上的利益，使它不能不多所顧忌，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蘇聯，就被迫採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和妥協的政策。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條約締結後，除却同年十二月又締結北庫頁島的石油開採權利讓渡契約和煤礦權利讓渡契約外，又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根據北京條約第三條的規定，由日本駐蘇大使田中開始和蘇聯當局談判修改一九〇七年的日俄漁約。經過二年以上的折衝，在雙方互作相當的讓步之下，卒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締結了有效期限八年的日蘇漁約，關於漁業權的意義，漁稅的繳納，漁區的租借以及漁業地域的範圍，都有詳細的規定，使日蘇之間的漁業糾紛暫時告一段落。

在日蘇漁約生效後的第一年，即一九二九年，曾經發生關於漁區標實和虛布換算二問題的糾紛。前者，是因為屬於日本的三百零四個漁區和屬於蘇聯的二百八十三個漁區，將於一九二九年九月七日

爲最後截止漁期。蘇聯要求將日人所經營的三十個漁區改爲國營漁區，又將獲魚限制額自下年度起，減低至三百五十萬磅到四百五十萬磅，制定保護魚類繁殖的五分稅，還有容許蘇聯個人和團體以及其他各國人參加漁區標賣等，通知日本當局。日本方面，不肯接受。同時，蘇聯漁區的標賣反覆經過三次，而日人都沒有得標。九月七日，轉瞬即逝，雙方交涉，尙無結果。日人揚言將不顧一切，「自由出漁」，於是糾紛惡化，形勢嚴重。調經雙方諒步的結果，蘇聯當局和日本漁業團體即日俄漁業股份公司締結在一年內有效的臨時協定，使日人得在九月七日以後，繼續「出漁」，糾紛暫告解決。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海參崴舉行漁區標賣，日人方面的得標數，僅佔四百三十七個漁區中的八十六個。日本漁業家們遂開會決議，否認投標有效，通知日蘇關係當局。經雙方交涉結果，得再度投標，日人又標得六十一個漁區，始得相安無事。後者，是因爲關於繳納漁區租稅時，盧布和日幣的換算率，雙方意見，頗有距離，惹起了激烈的爭執。在糾紛還沒有解決的時候，蘇聯駐日商務代表安尼克也夫，竟於一九三一年三月間，爲日人所刺，受了重傷。蘇聯深表憤慨，駐日蘇使托洛亞諾夫斯基遂致日俄漁業股份公司以最後通牒，催促解除契約。當時日本的民政黨內開爲了一方面避免事態的擴大，他方面保持已得的權利，不願與蘇聯破險，乃由外相幣原和駐日蘇使於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簽訂一臨時協定，才算暫時解決了這個糾紛。

但不久即發生九一八事變，國際關係又重復趨于緊張。因爲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最後破壞了資本主義穩定的脆弱基礎，卒使對外貿易大爲縮小，並造成殘酷的商業貨幣戰爭，又開始形成新的關稅壁壘。多次召集的國際會議，也不能以條約形式解決任何政治問題。帝國主義列強採取的一切辦法，欲以協定方式調劑關稅問題，結果都完全失敗。凡爾賽體系開始崩潰，裁軍的談判也最

後停止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中國關外滿洲地域內，日寇的大炮聲已經告訴全世界：「國際關係相對穩定的時期已經終止了」。爲了尋找恐慌的出路，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開始軍事冒險。日寇沒有正式向中國宣戰，而是以擄騙手段利用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地方事件」，用盜賊行竊方式把自己的軍隊調到東三省，就把滿洲完全佔領了。同時準備着方便的陣地，以便進一步侵犯中國本部。日寇爲便於自由行動起見，就退出了國際聯盟，並加緊武裝起來。

當然，日寇還抱定另一個目的——佔領蘇維埃的遠東。而其他帝國主義者，則更希望日本在滿洲所點起的戰火，就是對於蘇聯實行新軍事干涉的開端。像哈耶瑪在他所著「日本論」中所說：「日本佔領滿蒙，會引起一部份英法統治階層希望日蘇發生衝突，希望日本在向滿蒙進攻時，可將中東鐵路佔領，作爲反對蘇聯的國際反革命的急先鋒」。不過帝國主義者的如意算盤打錯了，蘇聯不允許把自己牽入戰爭冒險中，却用加緊鞏固遠東邊疆國防能力與堅持和平政策的方法，去粉碎戰爭陰謀家的冒險企圖。

國際舞台上新的力量對比，在蘇聯五年計劃期間形成了。當蘇聯正飛快順利的發展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時，資本主義世界却被一九二九年所爆發的經濟恐慌所苦惱。這一恐慌在三年中（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日趨深刻和惡化，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錯縱結合起來，並因此而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狀況更加惡化了。在上述經濟恐慌的三年內，蘇聯的工業若與一九二九年的水準相比，增加了兩倍以上，即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國工業到一九三三年末與一九二九年水準相比，却已降到百分之六十五。同一時期，英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國工業降到百分之

蘇聯五年計劃之完成，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在總結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斯大林指出：「蘇聯已由軟弱的國防準備不足的國家變成國防能力強大的國家，變成可以隨時應付一切意外事變的國家，變成能够大批製造一切現代國防武器，並將其供給自己軍隊以防外侮的國家」。我們知道：舊俄羅斯歷史的內容，差不多和近代中國史很相像，充滿了因為落後而時常挨打的悲慘故事。蒙古的可汗會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會打過它，瑞典的封建諸侯會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會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會打過它，日本鬼子也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如今它已變成經濟獨立和強大國防的國家，各國對它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經濟危機，不僅已使資本主義矛盾在遠東尖銳化。同時，它使這些矛盾在歐洲也尖銳化了。拖延的工業危機和農業危機，人數浩大的失業，以及貧窮階級底生活之更加痛苦，就使工農民衆不滿情緒更其加強起來了。這種情形在德國表現得尤為明顯，於是為挽救資產階級統治命運起見，德國法西斯蒂就在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權。德國法西斯蒂希特勒，以火燒國會，殘酷鎮壓工人階級，消滅民衆組織，消滅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權利的方法，來表示了它們自己的對內政策。它們以退出國際聯盟和公開準備戰爭來用強力修改歐洲各國疆界以利於德國的方法，來表示了它們自己的對外政策。於是就在歐洲中部形成了第二個戰爭策源地。不言而喻的，蘇聯不能忽視這樣一個嚴重的事實，於是，它就開始來銳利地注視西歐事變的進程，並鞏固自己西方邊境方面的國防能力。

不僅如此，和兩個有名的侵略國——德國和日本糾合的，還有第三個國家——意大利。一九三五年，法西斯的意大利實行侵犯阿比西尼亞，並強佔了阿比西尼亞。意大利之侵犯阿比西尼亞，從國際

公法的觀點看來，是沒有任何根據或理由的。它這種侵犯，是用不宣而戰的方法，是用盜竊的方法來進行的。這種方法，乃是法西斯國家的通用手段，日寇對於中國也是採用這種方法的。這不僅是對於阿比西尼亞的打擊，這並且是對於英國，對於英國從歐洲到印度，到亞洲的海路底打擊。爲便於肆意橫行起見，意大利後來亦退出國際聯盟並加緊武裝起來。

很明顯的，蘇聯既然看見這樣的國際局勢，是不能不過問這些凶險事變的。侵略者所開始的任何一個戰爭，即使是範圍不大的戰爭，都是於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危險的。蘇聯一方面是實行着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時又擴展工作來繼續加強自己邊界的防禦能力和紅色陸海空軍的戰鬥準備；自然，蘇聯在這一方面的措施，其根本目的仍在爭取和平。爲達到這一根本目的，蘇聯于一九三四年末加入國際聯盟。因爲蘇聯知道：國際聯盟雖有其弱點，但它總還是能夠成爲揭穿侵略者的場所和某種程度的和平工具，雖然是薄弱的和平工具，但多少是能阻礙戰爭爆發的工具，蘇聯認爲：在這樣多災多難的時候，甚至像國際聯盟這樣薄弱的國際組織，也是不應當忽視的。

蘇聯的加入國際聯盟，正當帝國主義內部和國際內部均勢改變的時候。最積極挑戰的帝國主義國家——納粹德國和日本，已經退出了國際聯盟，並在會外進行着攻擊國際的勾當。這時候，國際本身如果不願意立刻毀滅自己，那只有努力把自己變成一個反對戰爭災禍的國際組織，或至少要設法去阻礙（就算是暫時的）戰爭的擴大。爲着真正忠實於和平事業，蘇聯對於這種可能自應予以澈底的利用，但是國際根本的錯誤，如盟約之帝國主義的觀點及其無力阻止戰爭的弱點，則依然存在。蘇聯在接受了加入國際聯盟的邀請之後，就明白聲明它並不會改變對於這幾點的觀點；而且，它可以遵照盟約，忠實地合作和接受一切國際的義務以維持和平，但是盟約的某些部份却必須除外，例如委任統治地制，就

表示着有帝國主義稱霸的意味，這完全違反蘇聯的立國精神，它自然不能接受。這些保留，在李維諾夫加入國聯的演詞中是說得很明白的：

「蘇聯是以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代表的資格加入國聯了，它並沒有放棄它自己立國的任何特質，正像這裏所代表的其他任何國家，加入國聯之後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個性一樣，蘇聯於加入國聯之後，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個性。這就是說，我們已參加國聯，我們却要堅持對於國聯盟約中某幾條的意見，我們特別要反對的是承認戰爭合法的第十二條和第十五條。還有，我們要反對關於委任統治地制的第二十二條，我們也要抗議保證種族平等的第二十三條的刪除。但是這一切，却並不足以阻止蘇聯的加入國聯，好在一個組織的任何新會員只有對於經它參與或同意的決議，才負道德上的責任」。

蘇聯於一九三四年參加國聯之後，曾使國際局面改觀；帝國主義的鍊索又一次被打破了，國聯雖然仍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聯合，其中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最活躍的挑戰國家則已經退出國聯，或對國聯採取一種公開消極的態度。而新加入的社會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圈外的一大強國，却已在國聯內部的行政院中行使職務。李維諾夫曾提出有名的侵略國定義，並主張用集體安全制來保障世界和平。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亞，蘇聯代表不獨在國聯抨擊意國最力，而且是堅決主張並首先實行對意國制裁的國家。同時，蘇聯代表又在國聯擁護阿比西尼亞，使其代表能繼續出席國聯。可惜當時英法政府却無意制裁侵略者。它們對於阻止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之侵略，日本強盜對於中國之侵略，以及德意法西斯對於西班牙共和國的軍事干涉，均未採取任何行動。甚至對於侵略者表示讓步，如所謂荷蘭——賴伐爾計劃（Hoare-Laval settlement）實無異以阿比西尼亞作犧

牲品，去酬報意大利的侵略行爲。所以莫洛托夫指出：「我國（蘇聯）加入國聯，不是說從今以後，蘇聯國際政策和資本主義列強的政策，已無根本的原則區別，例如在意阿戰爭中，我們就看到相反的景象……只有蘇聯在意阿戰爭中，站了與任何帝國主義任何殖民地掠奪政策不同的特別原則立場。」

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到一九三四年蘇聯加入國聯的這一時期，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關係以及各國內部關係更加尖銳化的時期。日寇對華開戰和佔領東北四省，就使遠東關係尖銳化；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取得勝利和復仇及侵略思想的猖獗，就使歐洲關係尖銳化；日德兩國退出國際聯盟，就更推動軍備擴張和帝國主義戰爭準備。在這種經濟震動和軍事政治災變的狂風大浪中，蘇聯却好似中流砥柱，巍然獨立，繼續進行其社會主義建設和爲維護和平而奮鬥的事業。

第三節 集體安全運動和多邊互不侵犯協定

在上述基礎上，築下了蘇聯加入國聯的必要和前提，也產生了蘇聯爲與各鄰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和侵略國定義公約而進行的運動。在這個時期，蘇聯不僅和西方及南方大多數鄰國（其中包括芬蘭和波蘭）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而且還和法意這樣的國家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同樣也是在這個基礎上，還鞏固了蘇聯與土耳其之間的友善關係，改善了蘇聯與意大利、與法國、與波蘭以及與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關係，恢復了蘇聯與美國、與我們中國的邦交關係。

在這裏，特別是蘇美兩國與中蘇兩國正常關係的恢復，具有重大的意義。主要問題還不僅在於這一舉動提高保持和平事業的機會，改善兩國間的關係，鞏固兩國間的商業聯繫，並造成彼此合作的基

礎。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這一舉動劃清了新舊兩時期的界綫：在過去，美國是固執仇視蘇聯並始終不肯承認蘇聯的；而在新時期中，美國統治階級中雖還有不少仇視蘇聯的份子，然而大勢所趨，資本主義系統最雄厚的一個支柱——美國，也不能不承認蘇聯並與之正式恢復邦交了。至於講到中國與蘇聯兩大民族，則照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原應永保「革命朋友與同志關係」的。可惜不幸，由於帝國主義的挑撥，自一九二七年以後，竟斷絕了外交關係，從此帝國主義者竟把中國當作反蘇支柱，使中國失了一個好朋友，便利了日寇的侵略。但是，由於中蘇兩國的共同需要，一度中斷的邦交關係也終於恢復了。

這一時期，英國爲禁止蘇聯輸出品而頒布的禁令，已經取消；但英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却沒有成功，甚至英蘇兩國商務條約的談判，也沒有成效。同樣，日本需要互不侵犯協定的程度，並不下於蘇聯，但日本却拒絕締結互不侵犯協定；而且日本軍閥和浪人還在中東路方面破壞鐵路交通，非法逮捕蘇聯職員，進而作武力奪取中東路的準備。蘇聯當局忍無可忍，乃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經塔斯社發表日寇計劃並實行奪取中東路的祕密文件四件，前三件是日本駐「滿」大使菱刈隆呈給日本外相的報告，後一件是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呈給菱刈隆的報告。在這些報告中，詳細地敘述着奪取中東路的計劃和執行的狀況。由於這些文件的發表，日寇的陰謀和舉行動已完全暴露於全世界。因而不僅失掉國際間的同情，而且引起日本國內「和平份子」的不滿。爲了挽救不利的形勢，日寇乃裝作真願斡旋蘇聯和偽「滿」間的售路交涉的樣子，使一時停頓的談判，又於一九三四年初，在東京繼續舉行。自二月起，到八月止，經過半年以上的折衝，仍因日「滿」無誠意，而告中斷。然而由於蘇聯的加強，已使日寇不敢輕視，同時，蘇聯的國際地位侵犯，同鞏固，特別表現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十六日的美蘇外交關係的確立和一九三四年九月由西門·「我風」(譯音)加入國際聯盟擔任理事，遂使俄寇放棄武力奪取中東路的預定計劃，而命令它的工具——滿洲國，和蘇聯重開傳路談判，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簽訂傳路協定及其附屬文件。在附屬文件中，最重要的是日蘇兩國全權代表簽訂的日本政府担保付款的日蘇兩國交換公文。

中東路問題解決後，李維諾夫又重新提出締結日蘇互不侵犯協定問題，但日本帝國主義依然置之不理。這更充分地表示着，日本帝國主義仍在繼續企圖侵略蘇聯。不過在前一段落中，中東路問題為日蘇糾紛的中心，而在這一段落中，則日蘇糾紛的中心，是所謂邊境問題了。原來，自九一八事變爆發，特別是偽「滿洲國」成立以來，所謂邊境問題，便已呈現着緊張狀態，據日本報紙東京朝日新聞的特派員渡邊的調查，大規模的蘇「滿」邊境武裝衝突，自九一八事變起，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止，竟達八百二十七件之多，其他小規模的糾紛更不計其數。在這些衝突和糾紛中，除却七七事變以後的張高案及諾門坎等事件外，主要都是發生在從中東路問題解決，到七七事變爆發，這一時期。日「滿」軍不斷地侵入蘇聯的領土，日「滿」軍艦不斷地侵入蘇聯的領水，日「滿」飛機不斷地侵入蘇聯的領空；而外蒙的領土主權，尤其常被橫加侵犯和蹂躪。其最嚴重的，在陸境方面，有如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的格羅德科夫事件，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的金廠溝事件，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東寧事件；在水境方面，有如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波耶爾可夫事件；而在「滿」蒙邊境，則有哈爾哈廟事件和海拉爾事件等。

蘇聯對於所謂邊境問題也是採取着和平解決的態度，如莫洛托夫一九三六年一月在聯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大會所報告：

「我國（蘇聯）駐日大使尤列尼夫建議協商設立一個可以調查和肅清邊境事件的蘇日「滿」邊境委員會。但是直到現在，日本政府還沒有答覆」。

當時，蘇聯是希望和平解決，而日本帝國主義却不願和平解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蘇聯自也不能不在和平折衝之外，更作實力對抗的準備。一九三六年一月，當日寇正繼續集中軍隊於邊境，企圖大舉侵略外蒙時，斯大林對美聯社社長霍華德氏的公開談話，特別鄭重聲明：

「倘若日本決意進攻外蒙，侵犯它的獨立，則我們就要援助外蒙。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曾經援助過外蒙，現在，我們要給以同樣的援助」。

同年，三月十二日，蘇聯更進一步和外蒙締結了「軍事互助協定」，規定：「以全力互相援助，以避免及防止武裝攻擊的威脅，並於任何第三國攻擊蘇聯或外蒙時，彼此援助」（該協定前文）。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一種嚴厲而有力的警告，它對外蒙的冒險的侵略行動一時是被止住了。

戰爭在國際關係中造成了新的環境，它給這些關係帶進驚惶不安和恐慌焦慮的氣氛。戰爭既已打破戰後和平制度的基礎，既已推翻國際公法底起碼概念，於是就使國際條約和國際義務的價值發生問題了。和平主義和裁軍草案已被拋到九霄雲外，而擴大軍備的狂熱，却已起而代之。毫無疑義的，由侵略者所開始的任何一個甚至不大的戰爭，即令是在世界上某一個很遼遠角落裏開始，也都是對於愛好和平國家的一種危險。對於各國人民，首先是對於蘇聯，更不能不是最嚴重的危險。蘇聯既然看到這一點，一方於自然不能不加強自己邊界的防禦能力與紅色陸海空軍的戰鬥準備，同時自然亦不能不開展自己的和平外交活動。基於這樣的立場，蘇聯曾於一九三四年末加入國際聯盟，又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和法國締結了互助公約，以反對從侵略者方面可能的侵犯，同時，和捷克也締結了同樣的公約。

蘇法互助公約訂立之後，經過約一年之久，始由法國衆議院批准實施，而且只實施了很短期間，即被頓伐爾、達拉第、勃魯姆之流所破壞；但是，當它付諸實施的短期間內，總不能不算是愛好和平的人們事業上一個新勝利，因為這公約在它存在的期間，對於敵視和平的人們，總不能不算是相當的障礙。法蘇互助公約締結之後，蘇聯更發起東歐互助公約，號召東歐的集體安全，雖然不幸中途流產，但是這個提議，始終是有意義的。當時蘇聯所提議的東歐互助公約雖沒有成立，但是蘇聯與比利時終於恢復了邦交，而且和波蘭的關係亦有某種程度的改善。當時蘇法捷比等國的親善，曾大大引起德國法西斯的不安和反對，甚至造謠中傷，硬說「蘇聯已由反對凡爾塞條約者變為擁護凡爾塞條約者」。斯大林對於這種不合事實的中傷，曾經有過嚴正的駁斥，他說：

「有些德國政治家一提到這個問題（即指蘇聯與法、捷、波等國接近的問題——引者）時，就說蘇聯現在是以指靠於法波兩國為方針的，說蘇聯已由反對凡爾塞條約者變為擁護凡爾塞條約者，說這種變化是由於在德國建立了法西斯制度。這是不對的。當然，我們是決不因德國有法西斯制度而歡喜的。可是，這裏問題不在於法西斯主義，這從以下一件事實中就可看出：例如意大利雖然也是法西斯主義統治着，但這却沒有妨礙蘇聯去與意大利建立友好的關係。問題也不在於我們對於凡爾塞條約的態度已發生如人們所臆想的那種改變。受過布列斯特和約恥辱的我們，那裏會讚美凡爾塞條約呢！我們所不同意的，不過是那種藉口於這一個條約而把全世界捲入新戰爭漩渦的事情。關於人們所臆想的蘇聯改變方針，也要這樣說。我們未曾有指靠於德國的方針，也好似我們現在沒有指靠於法波的方針一樣。無論在過去或現時，我們都是以指靠於蘇聯自己，而且只是以指靠於蘇聯自己為方針的。而如果蘇聯利益要求我們去和某些不願破壞和平的國家接近

，那我們就毫無猶豫地去和這些國家接近」。

事實上，蘇法互助公約與蘇捷互助公約的出現，乃是德國法西斯向世界挑戰之邏輯的發展。但是，雖然如此，蘇法互助公約也並沒有拒絕德國的加入。因為它完全是保障安全維持和平的條約，公開地締成，任何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可以加入，蘇法互助公約成立之後，就會經表示歡迎德國加入。德國所以反對加入，這正是表示德國法西斯始終是要戰爭，而不要和平。

納粹德國不但自己在歐洲發動戰爭，與意大利協同武裝干涉西班牙共和國，而且與日寇締結所謂防共協定，以便東西呼應，實行侵略。一九三六年五月間，駐德國使希特勒會談時，希特勒即已提議成立所謂反「布爾塞維克」的共同戰綫。到七月間，日本政府將德日防共協定草案通過，而德國方面，也召駐日大使和武官回國，研究日本方面所提的協定內容。到十月間，談判完成，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在柏林簽字。協定內容，據它們自己所公布的，祇規定德日二國為「消滅共產主義思想及防止共產國際活動」，特訂立協定，「互相交換情報，以剷除共產主義國際的勢力」。這條文雖然簡單，但作用却並不小。第一，很明顯的，這是德日準備進攻蘇聯的同盟條約，雖然日本外交當局會發表聲明：防共協定僅直接反對共產國際，並不反對蘇聯及其他任何國家；但在事實上，正如蘇聯當局所指出，防共協定明明是一個變相的軍事同盟，是一個以防共為號召的反蘇協定。

其次，依協定中的規定：「簽約國為防止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的活動，得在本國領土以外從事防共的工作」，這就是說，可以干涉他國內政。這條規定不啻使日寇對中國的進攻更得一個有力的援助，因為在防共協定簽訂的前後，日寇常藉口防共，在華北一帶擴張軍事的佔領區域，並且還要求中國加入防共協定，以便日寇得在履行防共協定的名義下，派兵到中國來「防共」。所以這個協定雖名為「

防共」，實際上則爲法西斯國家實行侵略弱國的一種掩護工具。「因爲要在蒙古沙漠間，在阿比西尼亞山嶺間，在西屬摩洛哥密林中去找共產國際底策源地，那是很可笑的！」

再次，這協定對於德國的作用，是日寇盡力在遠東實行侵略，打擊中國及英法美等國的利益後，得使德國在歐洲方面解除條約的束縛，擴充軍備，準備侵略的戰爭。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國加入防共協定後，這個法西斯侵略陣綫的範圍就更擴大。其對象已不限於蘇聯與弱國，而實際擴充到英法美等大國的身上了。當意國加入防共協定時，巴黎的迴響報就發表這樣的批評：「德日意三國的新組織，與其說以蘇聯爲對象，毋寧說以不列顛帝國爲對象。德日意三國暫時都無攻擊蘇聯的可能，而對於英國及其屬地，則很易攻擊。例如德國空軍可以襲擊倫敦，意國之力量足以威脅埃及，日本則可威脅香港及新加坡，這對於法國亦是一樣的」。英國的報紙也有同樣的評論，例如曼哲斯特導報就說：「這次德日意防共協定的真義，如不在反共，而在共同圖謀攫取利益，則此約與其說是對蘇聯，不如說是對英法，因英法兩國是他們所欲覓取利益的源泉」。德日意三國防共協定，不僅是政治思想的同盟，而且還是一種含有軍事意義的同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日寇在這個時期內強佔了中國很大一塊領土——侵佔了東北，又進而侵佔華北；意大利強佔了阿比西尼亞，德國強佔了奧大利和捷克蘇台區；德意兩國共同侵佔西班牙，而所有這一切，都是根據防共協定的精神而進行的。

蘇聯決不因德日防共協定的締結而恐懼，而畏縮，而張皇失措，而屈服於侵略者的恫嚇和威脅之前。莫洛托夫會說：

「法西斯國家對於蘇聯和平政策的答覆，是締結兩個國家和三個國家的軍事同盟，而反對共產主

義。它們這種作法，是要手牽着手，恐怕跌跤。兩個牽着手，或可能是三個，四個！顯明地，因為它們之中，誰也不相信自己固有的力量了。可是，它們雖則手牽着手，它們還是不能够把它們從危險中救出來，它們脚下所踏的基礎已經滑動了。

蘇聯對於防共協定的答覆，首先是拒絕簽訂已經談判有成議的日蘇新漁約。本來一九二八年締結的日蘇漁約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滿期，日蘇雙方為續訂新約曾在一年前，即開始談判，並將原約展期半年到一九三六年底止，以便進行談判。十月初，該項談判已在原則上成立妥協，預定在年底以前簽字，而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起發生效力，其期限為十年，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但德日防共協定的締結，已經成為確定的事實後，蘇聯立刻宣布新漁約展期簽字。雖經駐蘇日使重光葵向蘇聯當局解釋、疏通，其結果，只不過是把原約的效力，延長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罷了。

蘇聯對德日防共協定第二個有力答覆，就是更積極援助西班牙共和國與中國抗戰。七七事變爆發僅一個半月，八一三淞滬抗戰才八天，蘇聯便和我們中國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規定着：

「倘兩締約國的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另一締約國約定在全部衝突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爲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被侵略的締約國」（第二條）。

這表示蘇聯是絕對站在中國方面，決不像有些國家那樣，還不時想向侵略者妥協和拉攏。誠如巴黎日報所說：「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是插入日本雙牛頸項的第一枝火箭」。到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蘇聯更進一步和我國簽訂中蘇通商航海條約。一方面，鞏固和擴張中蘇商務關係，使我國更

容易取得在抗戰建國上，所必需的物資上的援助；他方面，也就粉碎了日寇對我國的封鎖。蘇聯對於我們中國，不僅是道義的援助，而且是實際的援助；不僅是言論上的援助，而且是人力和物力上的援助。

爲了威脅和阻止蘇聯，使不能援助中國；同時，使中國因不易獲得蘇聯援助而失望，最後，也爲了表示執行東方反蘇警憲任務，以爭取歐洲反蘇病者的同情，日寇曾於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後掀起了有名的張高峯事件和諾門坎事件。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僞「滿洲國」外交當局憑空向蘇聯提出抗議，謂蘇聯士兵三十餘人，於十二日，先後侵入「滿洲國」境內，在張高峯地方「構築陣地」，「實爲不法」，要求立刻撤退該項士兵，並採取必要處置，以防止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否則「滿」軍將實行採取應付的措施。實則蘇聯士兵並未越境一步，也沒有任何軍事行動。十五日，日本政府也向蘇聯提出抗議，反對蘇聯士兵「侵入」滿洲國「領土」；十七日又提抗議，謂「十五日有日邊防軍一名，在琿春南，雙方爭執區內，被蘇軍擊斃」；十九日，三度提抗議，並謂：蘇軍如果撤退，則僞「滿洲國」擬與蘇聯談判劃界事件，如不撤退致形勢日趨險惡，則蘇聯應負全責。同時，並宣布日本士兵十二人在張高峯被擊斃。二十日，駐蘇日使重光葵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要求立刻撤退張高峯蘇軍，並大言恫嚇，謂必要時，擬採取軍事有效處置。李維諾夫當即以鎮靜的態度，根據一八六九年中俄條約及其附圖，加以痛駁，謂張高峯係蘇聯領土，蘇聯不能放棄，而蘇聯邊境駐軍調動，乃係蘇聯自身之事，不容他國干涉，且以幽默而強硬的口吻，譏諷重光，謂：

「倘閣下以爲用恫嚇的外交手段，施諸他國，已得成功，因而也可施諸蘇聯，則我想閣下是餓了

。閣下係一有經驗的外交家，而蔑視條約的態度如此，殊屬可異！

日寇的敲詐勒索的技術既無可施，遂在表面上，裝出和平的態度；而實際上，則加緊軍事行動的準備。二十九日，日僞軍兩隊向張高峯進攻，三十一日晨五時，佔領張高峯。蘇聯方面，當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同時，作軍事上的反攻。紅星報曾作如下的表示：

「日本軍閥一切挑釁行動，實即對於蘇聯作戰的一步驟。吾人毫無所畏，且當以殲滅手段答覆黷武之輩，將日本軍閥予以摧毀，不任其立足于地球之上。」

蘇聯是具有很充分的自信心的。八月四日，蘇軍已完全克復張高峯。又經過一個星期的繼續戰鬥，日寇在事實的教訓之下，知道了蘇聯的實力是不可侮的，於是被迫採取了和平解決的手段。十三日，雙方成立妥協，正式休戰。在協定中，規定雙方各堅守十日夜半的防綫。界綫的劃定，由蘇聯派代表二人，日「滿」共同派代表二人，組織混合委員會調查處理，並以蘇聯所提供的一八六九年的中俄條約中的地圖為委員會工作的主要根據。

這顯然是蘇聯對侵略者的重大打擊，然而還不足教訓日寇放下侵略政策。在張高峯事件後，日寇又把它的侵略的鋒刃，轉向自己所認為抵抗力較弱的方向——外蒙，掀起了諾門坎事件，却不料它又遭遇到堅強的抵抗和嚴重的打擊。事先，日寇即將一部分陸空軍調至「滿」蒙邊境，自五月十一日起，開始進攻諾門坎，戰鬥是斷斷續續在進行，延至八九月間，終於遇到蘇軍斷然的反擊。如莫洛托夫所指出：

「大家都知道衝突的所以發生，是因為日本企圖攫取外蒙一部分領土，並這樣以暴力改變「滿」蒙疆界，以利自己。」

結果，蘇聯雖遭受到一些損失，但日「滿」所遭受的犧牲是更鉅大的。僅就飛機一項而言，在這次衝突期間，日軍就損失六百六十架，而蘇聯聯軍的損失，則僅一百四十三架。這使日寇不得不停止冒險的行動。加以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締結，國際形勢的激變，使它不得不再度向蘇聯屈服，而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締結了日蘇停戰協定。

在講到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先，還得簡單敘述一下英法蘇談判的經過。上面我已引證英法報紙的言論，證明德日意防共協定的訂立，其目的原不僅在對付蘇聯，同時亦在對付英法等民主國家。無奈當時張伯倫等昧于正義，不顧世界人民利益，反以德日意為可親，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陣地讓給侵略者，作為驅使它們發動反蘇戰爭的交換條件。這種助紂為虐的行為，以慕尼黑談判為最高峰。但是侵略國却得寸進尺：在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的簽訂後不久，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就滅亡了捷克，接着又強佔了立陶宛共和國底米爾港和米爾區。意大利法西斯蒂也不甘落後，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摧毀了阿爾巴尼亞的獨立。接着，四月末，納粹德國撕碎了兩個重要的國際條約，即英德海軍協定和德波互不侵犯協定。不久，德意之間底軍事政治協定又公佈了。這是一個特別富有侵略性質的協定，根據這協定，在此兩國中任何一方所發動的戰爭，包括任何侵略行動，德意兩國均將互相援助。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德意軍事政治協定裏，竟公然宣稱：這個條約老實說來，是用以對付歐洲一些民主國家的。

這種情況迫使英法當局不得不和蘇聯進行談判，藉以保護它們自己的利益。英蘇會談的序幕，始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蘇大使邁斯基與英外相哈利法克斯的談話。四月十五日，英駐蘇大使與蘇外長李維諾夫正式在莫斯科開始會談，當時英國并提出第一次提案，內容約為蘇聯以一般性質的詞句，

聲明在接到波蘭或羅馬尼亞請求時，即當在某種條件之下予以援助，惟此種僅限於空軍及軍火糧食原料的供給。蘇聯接獲英方第一次建議後，經考慮結果，於十八日向英提出第一次對案，其中包括幾點：（一）英法蘇成立互助協定，十年為期；（二）保證範圍包括波羅的海諸國；（三）談話範圍應包括遠東。

英方接蘇方對案後，對（一）、（三）兩點，均難同意。英國自奉所以反對訂立互助協定的理由有三：（一）恐有「包圍德國」之嫌；（二）擬對德留迴旋餘地，俾他日受蘇聯威脅時，仍可與德接近；（三）波蘭與羅馬尼亞堅決反對蘇聯陸軍假道。在上述「理由」之下，英國在四月二十八日對蘇聯對案提出意見幾點：（一）英蘇協定成立後，英法蘇可在軍事上交換意見，不必由英法蘇訂立互助協定；（二）希望蘇方能明白表示，若其鄰邦被侵略向蘇求援時，蘇聯政府將採何種態度；（三）為使日本與軸心國分離，不贊成談話包括遠東問題。

當英國意見送到莫斯科後，引起極大的反感，談判陷于停頓，僅由邁斯基在倫敦折衝。五月七日，英大使西慈與蘇聯新外長莫洛托夫約期會晤，並提出新提案。主張一旦英法兩國為履行其對波蘭與羅馬尼亞二國之保證而採取軍事行動時，蘇聯即須立刻援助英法二國，至蘇聯如因履行對東歐若干國家之援助而採取軍事行動時，英法如何予以互惠之援助，則仍略去不提。

蘇聯接獲英國第二次提案後，以互助協定及波羅的海各國保證問題仍未解決，故於五月十五日致英覆文堅持三點：（一）英法蘇應訂互助協定，以維持歐洲安全；（二）保證範圍不僅限於波蘭與羅馬尼亞，并應推及拉特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三國；（三）英法蘇三國應商定各項軍事措施，以便一旦有事，現行政治協定即可迅速付諸實施。蘇聯此項覆文發出後，英政府知蘇聯態度的堅決，乃為相

當的讓步，如對蘇提出波羅的海諸國保證問題，表示原則的接受，但對於訂立互助公約的主張，仍不贊成，於是英法蘇談判，又陷于僵局。

這時，蘇聯正舉行蘇維埃最高會議，莫洛托夫于五月三十一日（一九三九年）在這會議上，提出了轟動一時的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報告。在報告中，莫洛托夫嚴正說明了慕尼黑會議後黑化的國際形勢，戰爭危機的擴大，以及蘇聯堅持和平與反侵略的外交政策。「蘇聯已不是十年或甚至五年以前的蘇聯可比了，蘇聯的力量已經大增了。蘇聯的外交政策，一定要把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蘇聯作為和平的有力因素所起的較大作用反映出來」。在報告中，莫洛托夫特別提到中蘇邦交的進展：

「我們（蘇聯）對中國的態度，是無需我來說明的。諸位對於斯大林同志關於援助已成爲侵略犧牲品而正爲獨立而戰的國家的聲明，當然都知道得很清楚。這聲明對中國及其爲民族獨立的鬥爭，完全適用。在實際上，我們是堅決地執行這個政策的。這與我們在歐洲的任務，完全一致」。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間，在國際環境中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英法蘇軍事談判，由于不可克服的歧異點而陷入絕境之後，當英法蘇談判表示出簽定一種互助公約成爲不可能時，蘇聯就不得不從事於探求在蘇德之間保障和平與限制戰爭擴大的其他可能。適遇納粹德國也還不願馬上進犯蘇聯，而需要先集中力量打擊英、法、比、波。於是蘇德兩國即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簽訂商約，二十三日進一步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一條約的訂立，曾經受到許多非難，其實這只是一個極普通的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一貫主張和平，反對一切侵略行動，任何國家都可以和它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何能獨外德國？至于後來納粹德國進犯蘇聯，那是德國背信棄義，而且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它存在的期間，至少起了延緩德國進犯蘇聯的作用，它使蘇聯得到一年半時間，以準備反對德寇的進攻，並使英美由自己

經驗中覺悟過來，由反蘇轉而聯蘇，也不能說沒有絲毫意義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納粹德國進犯波蘭，英法政府聲言援助波蘭，於是英法波德戰爭開始。但破產的波蘭統治者於戰爭開始未久，即放棄國家，讓自己的軍隊與人民聽天由命，蘇聯對於波蘭變為可以發生任何意外威脅蘇聯的場所，不能漠不關心；同時蘇聯政府對於處在納粹德國蹂躪之下的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同胞，亦不能袖手旁觀。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蘇聯政府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在其廣播演說中指出：蘇聯政府認為向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兄弟伸出援手，是自己的神聖義務。為執行這樣的神聖義務，蘇聯紅軍進入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蘇聯人民對於他們呻吟在波蘭地主軍閥壓迫之下的兄弟伸出了援助的手，把一千三百萬的勞動人民從血腥的屠殺中挽救了出來，而且暫時堵住了納粹德國的東進。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烏克蘭的國民會議與十月二十九日的西白俄羅斯國民會議一致通過宣言，宣佈在從波蘭地主解放的領土上成立蘇維埃政權。接着，蘇聯最高蘇維埃批准了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兄弟的請求，允許他們加入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芬蘭之獨立，是十月革命勝利的結果，但芬蘭人民未能因此享受自由與獨立的權利。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把芬蘭當作緩衝地帶和反蘇前哨的緣故。蘇聯為策邊境的安全，曾委曲求全的進行談判，建議將卡累利阿地峽一帶蘇芬國界向列寧格勒之北移動數十公里，而以二倍于芬蘭讓與蘇聯的領土之面積，讓與芬蘭，並建議用互相保證的方式，以加強蘇芬互不侵犯條約。無如芬蘭政府完全加以拒絕，反而進行反蘇的敵對宣傳，發動軍事衝突，在國際陰謀策動之下，砲擊列寧格勒附近的蘇聯部隊。蘇聯紅軍衛國有責，不得不實行抗戰，卒將曼納林防線突破，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挑釁武力，到一九四

○年三月十二日，簽訂了蘇芬和約。芬蘭讓出了卡累利阿地峽及維堡灣全境，並將漢哥半島租與蘇聯，因此成立了第十二個蘇維埃共和國，即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

蘇聯的領土比薩拉比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羅馬尼亞的統治者用武力佔去的。這個問題，成爲蘇羅邦交的障礙。到一九四〇年六月間，羅馬尼亞接受了蘇聯的建議，比薩拉比亞及北布哥維納歸還蘇聯。七月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兩院第二次聯席會議決議成立加盟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比薩拉比亞得與聶斯德河東岸的摩爾達維亞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重新聯合，而比布的烏克蘭人區也和烏克蘭共和國合爲一體，回到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

蘇聯對於波羅的海三個國家，曾竭力使雙方獲得安全及其經濟關係之發展。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它與愛沙尼亞訂立了互助公約與商務協定，同年十月五日與拉特維亞訂立互助公約與商務協定，十月十日與立陶宛訂立了關於交還維爾納城及維爾納省給立國與蘇立互助公約。但可惜的是這三國的統治者始終與國際帝國主義相勾結，它們不但不願與蘇聯和平共處，而且走上敵視蘇聯的道路，從愛拉的反蘇軍事同盟，擴大成爲立、拉、愛三國的反蘇軍事同盟。蘇聯爲要貫徹和平的目的，不得不接受三國人民的熱烈請求，派紅軍進駐各該國。至此三國政府在民意公決之下，不得不加改組，並實行自由的議會選舉。這次選舉是根據普遍、直接、平等、祕密投票方式進行，結果產生了眞能代表民意的新國會，並一致自願贊成加入蘇聯。這樣，蘇聯人口便由一萬萬七千餘萬增加到兩萬萬，構成聯邦的蘇維埃共和國，也由十一個增加到十六個了。

在遠東方面，自諾門坎停戰協定締結後，日蘇雙方又因臨時漁業協定即將屆滿，而進行續訂新約的談判。自然，日本帝國主義是迫切期望有利的新漁約能够締結，而蘇聯呢，則決不肯輕易放棄自己

的權利，損失自己的主權。蘇聯不僅在漁約談判的本身上，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且拿日本政府應使僞「滿洲國」支付拖欠將近二年的最後一期中東路價款，以履行其條約所規定的担保義務、爲談判締結漁約的條件。結果，日本政府爲要締結漁約，不得不接受這一條件，而所謂關於支付中東路最後一期價款協定，遂和新的日蘇臨時漁業協定，同時締結了。這一協定的主要內容，是：

「日本政府向蘇聯政府担保，由僞「滿洲國」政府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支付中東路最後一期價款，連同由於金價變動而生的貼水，以及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止，以年利百分之三計算，所應付的利息，一併支付，共爲日金七，〇九三，八八三日圓又五角五分。蘇聯應付僞「滿洲國」之款一，二八四，三一七日圓又七角四分，即於其中扣除」。

即日本政府担保僞「滿洲國」立刻支付蘇聯的，不僅是最後一次價款五，九八一，六二五日圓，而且包含着「由金價變動而生的貼水」七九二，二〇〇日圓六角四分，以及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起，至付款之日止，以年利百分之三計算的利息」。這在蘇聯，是對日外交上的一大收獲。而日本政府拿在這一協定上的讓步所換得的臨時漁業協定的續訂，則並未能使它自己滿意。它所希望的原是締結一個長期的新漁約，但結果，却只不過是又締結了一個臨時漁業協定。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和德意締結了三國同盟條約。在該條約中規定着，德意承認並尊重日本在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上的「領導地位」(第二條)；同樣，日寇承認並尊重德意在所謂「建設歐洲新秩序」上的「領導地位」(第一條)。這是軸心國家互相劃定勢力範圍，共同瓜分世界；而對妨礙它們這種計劃的國家，則作互相援助，共同對付的同盟條約。但因這個同盟條約係訂立在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締結後不久，同時由于日寇幻想拉攏蘇聯以孤立中國，如有田外相在日寇議會

報告外交政策時所說：「希望蘇聯政府能充分合作，糾正援助中國抗日政權的政策，以建立東亞全部的和平」。所以該同盟條約第五條曾明白規定「德意日三國聲明上述條款並不影響簽字國與蘇聯現存的政治關係」。這當然是軸心國家的一種陰謀詭計，藉以離間中蘇兩國及其他反侵略國家間的關係。其後日寇和中國大漢奸汪精衛締結了所謂「調整日支關係基礎條約」，雖在第三條中明白規定：「兩國政府茲同意對於一切含有共產性質的破壞的活動，足以妨礙兩國和平及福利（！）者，應共同實行防衛」。然而日寇外次大橋亦曾向蘇聯駐日大使史梅丹寧聲明：「該條約中關於反共的第三條，決非針對蘇聯。上述條款純粹由內部情況而生，且對日本欲調整日蘇邦交的願望亦毫無影響」。

蘇聯對於日寇這一套花樣，自然瞭如指掌，當時史梅丹寧代表蘇聯政府的答覆，是：

「蘇聯對日本政府所聲稱：日本與汪精衛所締結的條約第三條，決非針對蘇聯，並謂對日本欲調整日邦交的願望，亦不致發生影響一節，表示注意。至於蘇聯政府方面，則認為必須鄭重聲明：蘇聯對華政策依然如故，決不變更」。

大體上說，日本方面，有欲與蘇聯增進邦交的某種表示。但據莫洛托夫所聲明：「日蘇邦交的增進，必須日本將已失去重要性的某種障礙加以排除，相互尊重雙方利益」。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日本外相松岡在衆院預算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演說謂：「日蘇關係最近頗多改善」，並謂：「本人將努力促使兩國邦交的調整，更獲進展」。但對一宮議員等主張：修改三國同盟條約第五條及廢除防共協定等的答覆，則爲：

「日蘇關係如果有發生危機的危險，則日本自將設法修改三國同盟條約第五條」。

「至反共協定實非針對蘇聯，而係應付全世界的共產黨及其活動。德蘇二國已締結互不侵犯協定

，但並未提出廢除反共協定問題」。

這表示日本帝國主義雖然願意調整日蘇關係，但還不願廢除成爲調整日蘇關係的障礙的防共協定。一直到四月十三日，松岡訪歐歸來，道出莫斯科，和蘇聯締結日蘇中立協定，使防共協定一時失掉作用，而調整日蘇關係的障礙，才被掃除。當時，蘇聯真理報的社論，關於日蘇中立協定的締結，曾有如下的評述：

「若干日本政治家企圖以蘇聯爲他們的侵略政策的對象，這實在是極大的錯誤。蓋蘇聯始終一貫奉行和平政策，決不允許任何人以與蘇聯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強施于蘇聯。過去如此，今後亦必如此」。

「今日發表的中立協定和宣言，實爲具有無限政治意義的文件，因此項協定和宣言，乃增進日蘇邦交的重大步驟。蘇日兩國政府在此場合中，都以深願鞏固蘇日兩國間的和平與友好邦交爲指針」。

蘇日中立條約訂立的時候，曾經有人說：這一條約是德國拉攏之下簽訂的，這是完全錯誤的看法。我們知道：納粹侵蘇是在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二個月零九天，這樣短促的時間以內，只要希特勒不是傻瓜，他絕對不願東方小夥伴去與蘇聯講中立的。尤其是當松岡訪問德意並簽訂蘇日中立條約的時候，正是納粹向巴爾幹侵略，蘇德關係已臻極微妙的階段。蘇聯在這時期，首先斥責了保加利亞加入軸心同盟，其次保證了土耳其的中立，第三，南斯拉夫政變，公開支持反對依附軸心的南國新政府，歐洲局勢激變的徵候已顯。所以在這時候，蘇日條約的簽訂，應該說是蘇聯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是對於希特勒包圍蘇聯野心的一個打擊。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國際間很多人駭汗驚呼，有人說，蘇聯將成爲便利日德勾結的橋梁。但是，條約簽訂半個月後，蘇聯下令禁止各種軍火飛機零件及附屬品，製造軍火炸藥及毒氣之機械過境。蘇聯這一措施，即使正在苦戰中的英倫人士，亦皆一致認爲是項禁令，將令德日間之軍火運輸爲之中斷，並阻礙日寇對華作戰。有人說，蘇聯援華，將因蘇日條約而中止，可是事實上，蘇聯仍照常援華不已。若是了解蘇聯和平政策的人，就很難了解蘇聯對日的嚴正態度的。

第六章 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蘇聯外交

蘇聯軍民進行反抗希特勒納粹侵略的正義戰爭，已經越過困難崎嶇的道路，快要到了勝利的結束的時期。在這種將近四年的非常時期中，充滿了一連串震驚世界的種種國際事變，而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着整個國際局勢的，則是蘇聯抗戰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輝煌的成就。假如說，蘇聯抗戰在軍事上的成就，替反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那末，蘇聯抗戰在政治上的成就，首先是對外關係的發展，即替反希特勒聯盟各國戰時戰後的團結合作創造了最大的保證。於是蘇聯的軍事勝利與外交勝利，就構成了一副明朗雄偉的畫圖。

蘇聯完全懂得：在這世界上，還只有蘇聯一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而其餘各國則都還是資本主義國家與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但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中，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結果，却又分成許多不同的類型。大別言之，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家，一種是實行軍閥與大地主大金礦資本集團恐怖專政的法西斯國家。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中人民還多少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權利；而在法西斯主義國家中，則人民的所有一切政治權利都被剝奪了。尤其重要的，就是前者雖仍保有殖民地佔領，但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威脅之下，尙願意維護和平而反對侵略，而後者則公然變成蓄意破壞和平進行侵略的反動力量。自希特勒上台執政以來，這兩種力量便在國際上日益形成了對立的發展。顯而易見，只有蘇聯與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結成一個廣泛的反侵略的國

際統一戰綫，這樣來與破壞和平進行侵略的黑暗反動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才有可能產生符合所有各國人民利益的積極效果。

自立國以來，蘇聯即始終努力不懈地採取組織愛好和平自由的各國人民的共同陣綫來鎮壓侵略勢力，防止戰爭威脅，維護世界和平。無論侵略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也不論那一個國家的生存利益受到致命威脅，蘇聯都始終一貫忠實遂行着自己保衛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扶助弱小民族這一具有高度原則性的外交政策。

固然，蘇聯這種努力，並未達到防止戰爭的目的；但這並不是蘇聯的過錯，而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以張伯倫達拉第為首的反動統治階層實行短視的綏靖政策的不幸結果，它們基於反對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階級仇恨和階級偏見，對那樹起反蘇旗幟的法西斯主義不斷予以縱容和教唆；而相反，對於與蘇聯結成真正的民主聯盟以制止侵略的事業則始終缺乏誠意，甚至不惜加以阻礙和破壞。然而，被饕養教唆的法西斯強盜却是首先向綏靖主義的西歐開刀，這無論怎樣說，也是一頁值得時時記住的血的教訓。

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的法西斯強盜，把歐洲十四個國家攪到自己魔爪中以後，就從西方跳到了東方，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那天，發動了侵略蘇聯的戰爭，企圖把蘇聯土地剝進德國納粹的版圖，並企圖把蘇聯人民也編入奴隸的籍冊。從那天起，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部重担就在蘇聯的肩上。蘇聯人民和他們的軍隊在蘇維埃政府和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奮起進行抵抗，始終不屈不撓，不但把希特勒軍隊的強大攻勢抵抗住了，而且還把它打垮了。在戰爭過程中，蘇聯軍民為他們祖國而進行的鬥爭，就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與民主自由的鬥爭匯合了起來，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全

世界民主國家間各民族人民間的大團結，並在這種團結合作的基礎上，重新整頓了和改編了反侵略的陣容，結成了強大的反納粹的聯盟，建立了反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綫。這種政治上輝煌的成就，正是蘇聯在新的情況和新的形勢之下，積極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並進一步發揚了和發揮了這個政策的原則精神和實質的邏輯發展。在反法西斯戰爭這將近四年的非常時期，蘇聯外交政策的推行，也就是它底對外關係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自希特勒開始侵蘇戰爭到斯大林格勒蘇軍大捷是第一階段，從斯大林格勒蘇軍大捷到西歐第二戰場的開闢是第二階段，從西歐第二戰場的開闢到現在是第三階段。

第一節 從蘇德戰爭爆發到斯大林格勒大捷時期的蘇聯外交

在斯大林格勒蘇軍大捷以前，當時蘇德戰場上的軍事形勢是一種持久消耗的形勢：納粹喝血軍隊由於擁有進攻的突然性所造成的暫時的優勢，掌握了一時的戰爭的主動權，連續不斷發動了對蘇聯的猛烈進攻，博得了一些暫時的戰術上的成就，霸佔了蘇聯西部大部分領土，包圍了列寧格勒，威脅着莫斯科，出現在高加索油田的大門，造成了對蘇聯的嚴重威脅。而蘇聯則因動員員與組成戰爭機構不是一蹴可幾，遭受着暫時的失利，且不得不實行長距離的退却，不得不把若干地區暫時讓給敵人。但是，在蘇聯人民和軍隊的猛烈打擊之下，在持久消耗的過程中，希特勒的戰爭計劃畢竟破產了，閃擊戰畢竟失敗了，速戰速決的目的畢竟沒有達到，反使它底人力和物資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攻勢的鋒芒也因此逐漸退化起來，由於德國法西斯進攻的突然性所造成的雙方作戰條件的不平等也逐漸消滅了，而蘇軍則在戰爭的發展中，實力不斷增長，戰鬥技巧不斷提高，反攻的威力也便不斷增強，直到後

來，一九四二年的秋季戰鬥中，就從敵人的手中逐漸把戰爭的主動權扭轉到了自己手中，造成了斯大林格勒的大捷，直到最後改變了整個戰爭形勢。

蘇聯在抗戰之初，就把它底自衛和正義的作戰目的，告訴全世界。斯大林元帥在開戰後首次文告中就說：「在保衛我們國家，抵抗法西斯壓迫者，而進行的這種民族戰爭的目標，不僅在於消滅籠罩着我國的危機而且也在於援助正在德國法西斯鐵蹄下呻吟待斃的所有歐洲各國人民」。這就是說，蘇聯作戰目的有兩個：第一個是保衛自己的國家，把因希特勒法西斯軍隊之侵入而被其奴役的蘇聯各族人民解放出來，並消滅希特勒主義威脅蘇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危機；第二個是援助那些被希特勒暴政奴役下的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即援助他們對納粹強盜的反抗，援助他們從希特勒暴政下解放出來。到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時，斯大林元帥在文告中更明確的說：「我們並不懷抱着，而且也決不能夠懷抱着，像霸佔外國領土，征服別國人民之類的戰爭目的。不拘是歐洲各國人民的領土，還是亞洲的人民和領土，包括伊朗在內，都和我們底戰爭目的無關。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要把我國的領土和我國的各族人民全從德國法西斯鐵蹄下解放出來。我們並不懷抱着，而且也決不能夠懷抱着，使那正等待我們援助的斯拉夫各族人民以及歐洲其他被奴役的各國人民，跟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制度發生同化作用之類的戰爭目的，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要援助這些國家的人民，對希特勒暴政進行解放戰爭，然後使他們享有在自己的領土上，依照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絕對自由地安排自由生活的可能性，我們的戰爭目標，對別國的內政絕無妨害呀！因為希特勒的宣傳機關，以及其他國家的一些反蘇份子，總是說蘇聯有心侵略別的國家，有心赤化世界。斯大林的話，就是對這些妄言的駁斥，並把蘇聯自衛解放的戰爭目標，正直地向全世界宣告。

但是，如果祇有這些駁斥和宣告，還不能保證蘇聯戰時外交的決定勝利；所以在戰爭發展的過程中，蘇聯人民和軍隊就進一步以他們所表現的抵抗的強度和威力，所獲得的軍事勝利和真實成就，打開了世人的眼睛，博得了世界人民的一致公認和重視，於是蘇聯的國際地位才大大增強起來。正如斯大林元帥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文章中所說：「所有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都已團結一致，反對德國帝國主義。他們的眼睛都望着蘇聯。我們各族人民為自身的自由榮譽和獨立而進行的英勇戰鬥，博得了進步人類的讚美。所有一切愛好自由各國人民，都一致認為蘇聯是能够使全世界從希特勒瘟疫中得救的一種力量」。

正因如此，所以蘇聯與英美的友誼和同盟關係，也就跟着蘇聯抗戰的得手而日益發展和增強。如所週知，希特勒法西斯所以敢於悍然不顧一切的來進攻蘇聯，同時他底戰略計劃終究不免歸於失敗，就是因為他對蘇聯的國際關係，首先是與英美的關係，作了錯誤的估計。希特勒以為，只要他發動東線的戰爭，就可以結束西線的戰爭，只要他進行所謂反蘇聯的「十字軍」運動，就可以煽動英美統治階層中某些人士的反蘇情緒和偏見而建立起反蘇聯的聯合戰綫；只要用革命的幽靈和布爾塞維克威脅的鬼話來恐嚇英美統治階級就可以在國際關係上完全把蘇聯孤立起來。鼎鼎大名的國社黨副領袖赫斯一九四一年五月間的渡海奔英，就是以希特勒的全權代表的資格到倫敦去說服英國當局去加入共同反蘇的遠征。結果是很明顯的，希特勒這套政治把戲可恥地失敗了。英美不但沒有參加德國法西斯強盜對蘇聯的遠征，而且恰恰相反，與蘇聯站在同一的陣營去反對希特勒。蘇聯不但沒有孤立，而且恰恰相反，希特勒却被孤立了起來，蘇聯和英美建立了友好互助的同盟關係，並在蘇英美三大強國團結合作的基礎上，建立了反希特勒的民主聯盟。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即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的一天，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廣播演說中，就公開堅決聲明：「蘇聯的危難，就是英國的危難，也就是美國的危難」。英國將盡力援助蘇聯和蘇聯人民」。第二天，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代表美國政府也發表譴責納粹德國的宣言，宣言中說：「本國政府認為：任何抵抗希特勒主義的防衛以及任何抵抗希特勒主義的軍隊，不論來自何方，都將加速德國現政權的瓦解，並增強我國的防禦和安全」。這就是說，蘇聯抗戰與美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六月二十四日，即蘇德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羅斯福總統也就宣布：「美國決全力援助蘇聯」。接着，蘇聯和英美之間的外交接觸就頻繁和廣泛起來，互相派出了軍事和經濟的代表團。後來，在莫斯科，英蘇舉行了談判，結果就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締結了「英蘇對德作戰一致行動協定」。在這個協定中，英蘇兩國政府彼此保證互相給予一切種類的援助和支持，並同時規定，除非雙方同意，絕不與希特勒德國進行談判，也決不締結休戰條約與和約。這個協定算是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把推毀希特勒主義規定為英蘇雙方共同的作戰目標；因此，它不但成為英蘇關係重大改善的一個標誌，奠定了英蘇友好互助和戰鬥合作的基礎，而且也是蘇聯與其他愛好和平自由的各國關係改善的一個起點，開闢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寬廣道路，這個協定，同時也是希特勒法西斯陰謀分裂民主國家的有力回擊，希特勒企圖各個擊破其對手的計劃和希望，從此就一鼓腦兒被粉碎了。

構成蘇聯和英美外交關係鞏固發展的第二個重大事件，就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英美蘇三國會議。我們知道：現代戰爭是人力和物資的總決賽。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之後，在人力和物資方面佔有優勢的就會打勝仗。戰爭的發展，因此也就把合理運用與分配三國聯合資源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還在七月尾，羅斯福就會派出他底私人代表賀浦金斯到蘇聯，與斯大

林討論共同作戰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援助蘇聯的物資供應問題。其後，羅邱在八月間舉行第一次大西洋會議，宣布了大西洋憲章，並同時決定聯名致函斯大林，爲使三國聯合資源的合理分配達成迅速的决定起見，提議在莫斯科舉行三國會議，斯大林當即表示熱烈歡迎。三國會議的出席代表，英方是卑維勃魯克，美方是哈立曼，蘇方是莫洛托夫。三國會議經過很是圓滿，實際上把英美援助蘇聯對德作戰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根據哈立曼在大會閉幕前發表的演說，三國會議「審查了正對軸心作戰的蘇聯關於英美應運交的軍需的種類和數量所提出的要求，也審查了蘇聯政府就英美能力方面所能利用的資源。會議中決定，實際上把蘇聯當局所需要的物資，全部供蘇聯政府自由使用，而蘇聯政府也以英美兩國所迫切需要的原料供給英美」。根據三國會議所擬定的龐大計劃，蘇聯自十月份起，就開始從英美得到飛機坦克和其他軍需物資的援助。莫斯科三國會議底政治意義是很大的，特別因爲這個會議是在德寇發動對莫斯科第^二次猛烈攻勢的前夜舉行的，尤其顯得重要。莫洛托夫說得好：「它是在事實上昭示了我們：愛自由的各國人民，由蘇聯做先鋒，已形成了反希特勒的強大陣線，自尊自大的希特勒還從不會遭到這麼強有力的各國的聯合，還從不會感受到這種抵抗的威力。我們一點也不懷疑，我們的偉大的反希特勒陣線的實力一定會迅速增長，天下決沒有能够打敗這種反希特勒陣線的力量」。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反希特勒聯盟的實力之所以一定能够增長，就是因爲三國會議給這個強大的聯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羅斯大林的話說：「現代戰爭是發動機的戰爭，在發動機的產量方面擁有壓倒優勢的就會打勝仗。如果英美蘇三國發動機的生產聯合起來，那末，我們在發動機方面，和德國比較起來，至少就會取得三倍的優勢」。除此以外，我們還應知道：英美把物資運到蘇聯去，要突破敵人海上的封鎖，抵抗敵人軍艦和潛艇的襲擊，事實上有許多船隻都在半途覆沒了，在最初的

時期這種損失幾達百分之五十。這就更加說明，蘇聯和英美的友誼關係，是用戰鬥和義俠來凝固的。

還在三國會談以前，即八月十八日，英國會與蘇聯成立商務協定，由英國以一千萬鎊信用貸款借給蘇聯。在三國會談以後的第三天，即十月三日，美國又答應按照租借法案借款十萬萬美元給蘇聯，以便蘇聯支付在美購物的應用，規定戰爭結束五年後蘇聯以原料或貨物償還。接着，一九四二年二月間，美國又重新貸款十萬萬美元給蘇聯。羅斯福還發表了聲明，斥責美國孤立派份子，因為他們以恐懼增強蘇聯勢力過於龐大做理由反對這次新貸款。

蘇聯與英美之間友誼合作關係發展的新因素，就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英國外相艾登訪問莫斯科，以及接着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莫洛托夫的訪問倫敦和華盛頓。艾登在莫斯科，曾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關於戰爭的佈置和戰後組織歐洲的和平等問題，進行有效的談判。根據事後的公報，這次會議「充分表示對於戰爭佈置有關的一切問題，雙方意見完全一致。關於戰後組織和平與安全等問題，交換意見時，也提供了極其重要而有效的資料，大大有益於更進一步擬定關於這些問題的具體提案」。這就是說，這次會議是英蘇之間更進一步團結合作的一個新的重要的步驟。這個談判，後來在倫敦繼續進行了，到四月間，英方就邀請莫洛托夫到倫敦去完成這個談判。同時，羅斯福也邀請莫洛托夫到華盛頓去談判具有緊急性質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

莫洛托夫於五月二十一日到倫敦，五月二十六日就與艾登分別代表英蘇雙方締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對希特勒德國及其歐洲伙伴作戰同盟暨戰後合作與互助條約」。這個條約，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規定了蘇聯與英國在對德作戰期間的關係，大體上與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的英蘇協定內容相同，只不過以更富於明確性的方式把協定改變為條約，規定雙方互相保證

援助與支持，不僅是爲了對付德國，而且是對付「在歐洲與德國合夥參加侵略行動的各國」。第二部蘇德互不侵犯條文，主要的是規定了英蘇兩國戰後友好合作的原則，以及兩國和其他聯合國在議和時和勦完全的同意蘇德如所避論些原則就是兩國同意在和平再建後「共同工作，以組織歐洲的安全與經濟繁榮」。雙方當擬的聯合國對此類問題的利益，遵照決不會自身追求領土之擴張及決心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兩項原則而行動。蘇德戰後互相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蘇德雙方保證決不締結針對另一方的任何盟約，也決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任何聯盟。蘇德條約的有效期限規定爲二十年，而且還有繼續延長的可能。

這個條約關於戰後團結合作的諸原則，是根據一九四一年八月羅斯福和邱吉爾聯名宣佈的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大西洋憲章，可以說是反希特勒聯盟的共同的作戰綱領。蘇聯還在同年五月間在倫敦舉行的同盟國會議上，就表示對這個作戰綱領完全贊同。後來，一九四三年六月聖日列耳蘇國在華盛頓又發表共同宣言，贊同大西洋憲章所包含的共同作戰目的和原則，蘇聯也參加在內河場在英蘇同盟條約則把這些原則概括成爲更加明瞭更加精確的條文，這正說明，反希特勒聯盟已把現行戰爭的目的和性質的共同認識確立了起來，它們有了一個團結合作的堅實的思想基礎。我們知道希特勒是有他底作戰綱領的。這個綱領就是：種族的仇恨，「上等」民族的優越，對其他民族的征服，佔領別國的領土，對被征服民族的奴役和對他們國民財富的掠奪，民主自由的消滅，恐怖統治的到處建立，從希特勒這個作戰綱領可以看出，希特勒所進行的戰爭是掠奪的非正義的戰爭，到同時也就更加充分表現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是全世界進步人類的最兇惡的敵人。而反希特勒聯盟的作戰綱領，則在基本上已規定在大西洋憲章和二十六國共同宣言中。其要點是：種族排斥行爲的廢

止，民族的平等和他們領土的完整，被奴役的各民族的解放以及他們的主權的恢復，每一民族都享有按照自願的方式安排自己事情的權利，給予曾受苦難的各民族以經濟援助，以及幫助它們取得物質的幸福，民主自由的恢復，希特勒統治的消滅。這兩個敵對的同盟，就是由這兩個不同的對立的作戰綱領指導着。正是這樣兩個鮮明對立的作戰綱領，一方面代表掠奪、黑暗和反動，而另一方面則代表平等、自由和幸福，就使希特勒法西斯越來越陷於孤立，使它在全世界精神和政治上的後備力量日趨枯竭；反之，反希特勒聯盟在全世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後備力量，則一天比一天更加雄厚。而最能名符其實不折不扣執行反希特勒聯盟作戰綱領的正是蘇聯，所以它在這方面的外交成就，也就特別富有深厚的歷史意義。

由此可見，英蘇二十年同盟條約是具有偉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的。這個條約不但鞏固了蘇英兩大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關係，並用正式的約束把這關係變為堅固的同盟，而且還確立了英蘇戰後團結合作的方針，這就對歐洲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開闢了寬暢的道路。後來的蘇捷互助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的基礎上締定的。如果說，蘇聯作戰行動一致協定是兩國友好邦交發展的轉捩點，那末，英蘇同盟條約就是兩國友好邦交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界石。正如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上報告這個條約時所說：「這個條約，跟在倫敦和華盛頓談判的其他結果一樣，一定會加速希特勒德國及其歐洲伙伴的崩敗，一定會成為蘇聯和犬不列顛以及英蘇兩國和美國之朋友邦交更進一步。」

這個條約也正像和犬不列顛之間對於現行戰爭有關的若干最重要問題，以及對戰後合作所達到的默契一樣，暗示今天由蘇英美領導的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武裝同志關係的鞏固。

莫洛托夫在倫敦和華盛頓的談判，還曾特別討論到第二戰場問題。在英蘇和美蘇聯合公報中，曾對這個談判以相似辭句的聲明：英蘇和美蘇「對於在一九四二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迫切任務，沒得到完全的同意」。如所週知，歐洲第二戰場問題是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時，斯大林在他的著名演說中就提出來的。斯大林當時就曾指出：「紅軍失利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歐洲沒第二戰場去抵抗德國法西斯軍隊。」因為這個關係，德軍便不必要把自己力量分散在兩個戰場——東線和西線——作戰。無疑的，在歐洲沒有反對德國的第二戰場，大大減輕了德軍的困難，但是，同時也是不能懷疑的，這是無條件地，在歐洲大陸上第二戰場的出現，必須於最近期間實現，真正地減輕我軍的困難，而造成對德軍的損害」。現在，三國共同發表了這個聲明，就不啻是一種對於開闢第二戰場的莊嚴的誓約。

莫洛托夫在倫敦和華盛頓所討論的另一問題，是進一步增加英美對蘇聯的援助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也達成了肯定的結果，就是自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英美對蘇援助的範圍和數量就大大的增加了，美國並根據新的運輸計劃，把租借法案中援蘇的總值提高為三十萬萬美元。五月二十七日，英蘇又訂立了財務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整個大英帝國都保證以軍火援助蘇聯，並且可以記賬，而不需立刻付現款。

與英蘇條約同樣重要的，便是莫洛托夫在華盛頓開始的談判，後來由李維諾夫完成，而在六月十一日簽訂的蘇美兩國「關於進行抵抗侵略戰爭適用互助諸原則之協定」。這個協定具體規定締約國雙方各以其物資兵力情報供給對方，以進行抵抗侵略的戰爭。同時並聲明根據大西洋憲章諸原則，締約國雙方及其他具有同等志願的國家，願意以互助為基礎，增進世界的經濟關係。這還只是一個初步的

協定。在這個協定中，包括了締結最後協定時所應顧及的原則，因此表明：蘇美兩國都還抱着願望，和準備着更進一步向前發展兩國的友好互助關係。

其後，正當斯大林格勒大會戰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邱吉爾首相和美國共和黨領袖威爾基於八月先後有莫斯科之行。邱吉爾首相在莫斯科與斯大林舉行了談判，美國代表哈立曼也參加了這個談判。這次談判所達成的決定沒有公佈，只在公報中聲明：「雙方政府決定用所有一切的力量進行這種正義的解放的戰爭，以消滅希特勒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暴政」。毫無疑義的，這次談判再度證實了英美蘇三國間的親密友誼與諒解的存在，更進一步鞏固了三國已經發展了的同盟關係。當時，蘇德戰爭已進入決定階段，希特勒匪幫正不惜一切犧牲，拚了它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全部後備軍都調到蘇德戰場上來，企圖取得決定性的軍事成就，趕快結束東綫的戰爭。因此，英蘇兩國偉大領袖的會議，就不啻是敵人在政治上一個嚴重的失敗。至於威爾基的訪蘇，對於加深美蘇兩國人民的認識與瞭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這表現在威爾基回國後在「天下一家」這本書中，所敘述的對蘇聯的觀感，對它高度民主精神的正確認識，喚起了全世界對蘇聯的同情。

隨着英蘇本身親密友誼和戰鬥團結關係的增長和鞏固，兩國在外交上也採取了一致行動。這首先是英蘇兩國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同時照會伊朗，把兩國軍隊開入伊境。這是因為希特勒匪幫陰謀把伊朗變成侵犯蘇英兩國的根據地，並把伊朗淪為希特勒德國的附庸。有一時期，希特勒第五縱隊曾在伊朗獲得堅固的立足地，混入了伊朗的工業機關和政府機關。希特勒第五縱隊還在伊朗建立了龐大的軍火庫，訓練着進行破壞工作的秘密組織。最後，希特勒法西斯還陰謀在伊朗造成政變。所有這一切，遂迫使英蘇兩國不得不採取堅決的措施。由於英蘇共同進軍的結果，希特勒想把伊朗變成

對英蘇作戰根據地的計劃就化成泡影了，伊朗獨立所受的威脅也就解除了。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英蘇伊三國訂立了「三國互助公約」，規定英蘇共同保證伊朗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同盟國軍隊必須暫時駐紮伊朗一定區域，以便保衛近東的安全，援助伊朗抵抗一切侵略，戰爭結束後六個月內，兩國軍隊即自行撤退。伊朗則答應給予英蘇兩國以一切援助和便利，並保證在對外關係中，決不建立與本約矛盾的關係。英蘇在伊朗的一致行動，不但保障了近東的安全，而且也保障了伊朗的獨立，推動了伊朗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這個合作的經驗是值得寶貴的，它證明英蘇具有決心，消滅任何角落的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這不僅是英蘇的共同利益的所在，也是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共同利益的所在。

英蘇另一個在外交上的一致行動，就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兩國聯合照會土耳其，聲明如下兩點：（一）英蘇堅決信守蒙德羅公約，嚴格尊重土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對土國海峽決無侵犯的意向或要求；（二）兩國一致完全了解土國不願捲入戰禍。但一旦土耳其遭受侵略時，則英蘇兩國決定予以各種援助和支持。這使得土耳其在當時能够保持比較嚴格的_中立，而到後來蘇英美在東西兩綫夾擊希特勒的時候，土耳其又敢於和德國斷絕邦交（一九四四年七月）。

其次，我們就要說到蘇聯在第一個階段中，它底外交關係的擴大，以及它對歐洲被佔領國家的扶持和援助。除了增強蘇聯與英美的友好互助關係外，這也是蘇聯外交政策具體實施的一個重要項目，或者說一個重要部分。

這首先就是蘇聯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先後與歐洲被佔領各國政府恢復或重新建立外交關係。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蘇波在倫敦訂立協定，規定：（一）蘇聯承認一九三九年關於波蘭領土變更的蘇德

協定無效，波蘭宣佈不與第三國訂立以反蘇爲目的之協定；（二）兩國恢復邦交，互派大使；（三）相互保證在反對德寇的現行戰爭中，給予一切種類的援助和支持；（四）蘇聯同意在蘇聯編組波蘭軍隊。其後，同年八月十四日，兩國又爲編組波蘭軍而訂立軍事協定，規定波軍隸屬蘇聯最高統帥部，並在蘇境與蘇軍並肩作戰。同時兩國又簽訂貸款協定，由蘇聯無息貸款給波蘭政府，以維持波軍給養和救濟波蘭難民。同年十二月四日，波蘭總理薛戈爾斯基將軍訪問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談判結果，由兩人簽名發表「波蘇兩國友好互助宣言」。宣言裏面指出：（一）德國希特勒主義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決不能與之妥協，蘇德兩國與其他同盟國家一致，誓當堅持抗戰，直到取得完全勝利，德國侵略者遭受完全滅亡時爲止；（二）遵守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的條約，蘇波兩國在戰爭期間相互給予充分的軍事援助，駐在蘇境的波軍當與蘇軍攜手並肩作戰；在承平時期的，兩國邦交當以善鄰合作友好互助，相互忠實履行所承担的義務爲基礎；（三）在抗戰勝利後，希特勒罪人一定得受一定的膺懲，同盟國的任務，即在保持持久而合乎正義的和平，這只有以民主國家聯合一致參加的堅實持久的同盟爲基礎，經由國際關係的新組織才能達到。而尊重以所有一切同盟國家集體武裝力量爲後援的國際公法，應形成爲這一新組織的決定因素。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爲希特勒德國所破壞的歐洲才能復興，才能造成保障，使希特勒匪黨引起的禍患永遠不能再現。我們知道：波蘭是素來反蘇最賣力氣的國家，它以反蘇起家，也以反蘇而亡國。蘇德戰爭爆發，蘇波兩國能够達成這種政治上的協調，只能有一個說明，就是蘇聯具有充分的誠意，希望幫助波蘭從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來，重建一個獨立而強大的自由的波蘭。可惜的是：這種協調並沒有存在很久，就被波蘭反蘇集團所一手毀壞了。這，我們留待下文再來檢討。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蘇聯又與駐倫敦的捷克政府簽訂協定，恢復了兩國邦交，並規定兩國互相給予一切援助和支持。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成立蘇捷軍事協定，蘇聯同意在蘇境編組捷軍，以便共同對德作戰。此後，蘇聯就更增加了對捷克政府的切實援助，因為保證了兩國關係鞏固的發展，替後來的蘇捷互助條約的訂立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這個時期，與蘇聯恢復邦交的歐洲流亡政府還有比利時、挪威和盧森堡。荷蘭是歐洲一直沒有承認蘇聯的唯一國家，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也與蘇聯成立協定，建立了兩國正常的外交關係。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蘇聯會發表聲明承認以戴高樂為領袖的在倫敦成立的法國民族委員會的合法地位，並保證援助自由法國為恢復法國的自由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一年後，即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倫敦又發表蘇聯與法國西民族委員會的聯合公報，說莫洛托夫訪問倫敦時曾與戴高樂有所晤談，蘇聯應法國民族委員會的要求，承認「戰鬥法國」。隨後在蘇境就成立了法國「諾曼第航空隊」，在蘇境上空與蘇聯紅鷹比翼作戰，建立了豐功偉績，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勳獎。

此外，蘇聯與英國的自治領——加拿大和澳洲也先後於一九四二年的六月和十月先後建立邦交。蘇聯與美洲各國外交關係的改善，在這裏也值得特別提起。在中南美洲，有的國家是從來與蘇聯沒有外交關係的，有的國家是過去有過外交關係而中間又斷絕了的。比如古巴和哥倫比亞，就是與蘇聯從來沒有邦交的，但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和一九四三年二月，都先後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又比如墨西哥，過去曾與蘇聯有過外交關係，但在十三年前就斷絕了，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蘇墨兩國也成立協定，恢復了兩國邦交。

所有這些情形，就都說明一個事實：蘇聯人民的愛國戰爭，獲得了全世界愛好自由各國人民的支持。

情和擁護，而蘇軍的英勇抗戰，其威力之強與犧牲之壯烈，又得到舉世一致的公認和重視，影響所及，蘇聯國際威信和地位，就如日東昇，往上增長不已。蘇聯的國際關係也就日趨增強和鞏固了。

總結這一時期的蘇聯外交，由於蘇聯抗戰在軍事上劣勢的迅速克服，斯大林格勒新英雄主義的驚人創造，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日進無疆。特別是蘇聯與英美結成了鞏固的同盟關係，他們之間友好互助團結合作的一天比一天加強，他們在作戰綱領上的一致，他們互相保證給予一切種類的援助和支持，他們的聯合資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和運用，以及蘇聯與其他愛好和平自由的各國正當外交關係的擴大和發展，蘇聯對歐洲被佔領國家開始給予切實的援助，所有這一切，便都是斯大林格勒大捷之前蘇聯外交關係發展的總結。從這個總結中就可以看出：蘇聯外交政策的無上的正確性，得到了證實。蘇聯所始終關心的和努力不懈的，無非是求得所有愛好自由和平國家實行友好互助團結合作關係的鞏固發展，擴大和鞏固反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綫。其目的就在於加速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最後覆滅，以便造成條件，使所有各國人民在戰後都能够謀得自由幸福的生活。

第二節 從斯大林格勒蘇軍大捷到西歐第二戰場開闢以前的蘇聯外交

歷史上空前壯烈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光輝勝利，標誌出了整個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偉大深刻的轉變。

這個轉變，就軍事上說，就是：在敵我力量對比發展的關係上發生了對蘇英美的反希特勒聯盟決定有利的變化；戰爭主動權和戰略優勢已轉入反法西斯陣營手中，縮短戰爭時間，早日擊潰德寇這個任務，就提上了民主國家同盟作戰的日程。就政治上說，就是：廣大的蘇聯被佔領區和歐洲被佔領各

國從此便開始了從希特勒法西斯奴役之下被解放出來的過程；反希特勒聯盟已不能不着手處理在戰爭時期就必須解決的許多戰後時期的問題，如在解放的土地上進行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組織和復興工作，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同盟各國相互關係和政策上的協調等問題。

斯大林格勒大捷扭轉了戰爭形勢，同時也創造了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新階段。這新階段的特點是：法西斯的力量一天比一天更加削弱，而反法西斯的力量則一天比一天更加增強，這是一；在反法西斯力量的增長過程中，新民主主義的力量又一天比一天更加發展，這是二。換句話說，黑暗的閻門已經被打開，國際團結和國際民主的巨流開始在全世界泛濫起來。方生的正在加速地生長，要死的正在加速地死亡。

從上述觀點說來，斯大林格勒大捷自然也就劃開了蘇聯外交政策的新階段。假使說，在過去的階段，蘇聯外交政策的具體方針着重一般地鞏固和擴大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着重一般地鞏固和擴大反希特勒聯盟各國友好互助與團結合作關係的發展，那麼，在這個新的階段，蘇聯外交政策的具體方針，除了繼續鞏固和擴大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外，還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在這個民主合作的基礎上，扶助世界範圍內新民主主義力量的增長。不消說，蘇聯外交政策這種新的方針是與蘇聯的國際威信和國際地位的空前增強和鞏固相適應的，而蘇聯這種國際威信和地位，又是蘇聯人民付出了重大犧牲作代價換取得來的結果。

蘇聯外交的這種新的情況，首先反映在蘇聯與歐洲被佔領各國的關係上。對這些國家的人民及其與人民同行的政府，蘇聯伸出了自己熱情的手；而對那些不願與人民同行的流亡政府，蘇聯則珍惜着自己的友誼。特別是對這些流亡政府中最黑暗反動的集團，蘇聯睜着一雙嚴厲警覺的巨眼。當然，蘇

聯這種態度是從共同事業的利益出發，是從這些國家的人民及其政府願意或能否對共同事業有所貢獻出發的。

這裏我們首先就說到蘇聯與波蘭的關係。波蘭流亡政府內部存在着一個與希特勒有聯繫的反蘇反民主的強大集團，這個集團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而日益抬起頭來，以壓力加在波蘭總理薛戈爾斯基身上，迫使他逐漸放棄對蘇親睦友好政策，轉而採取對蘇疑忌仇視政策。還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波蘭政府就不願蘇波兩國所訂各項條約規定的義務，而對兩國友好合作實行怠工。波軍指揮部拒絕了把在蘇境編組的波軍調赴前線作戰，甚至在同年五六月間把波軍全部調到近東。波蘭政府吞蝕了蘇聯關於救濟波蘭難民的巨額貸款，駐蘇波蘭大使館和波蘭軍事代表團，則利用了蘇聯各地設立的救濟波蘭難民機關，進行游說蘇聯的間諜活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其後，正當蘇軍繼斯城大捷乘勝推進到頓內茨河的時候，反動的波蘭貴族地主向東方望過去，忽然想起了他們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舊日廣大領地和豪華生活。於是波蘭政府也就以波蘭貴族地主的代表資格，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發表了一個聲明，用橫蠻無理的口吻，硬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前的波蘭領土與主權，不容侵犯，不容分割。」到了同年四月，希特勒乘此縫隙，大事挑撥，自己一手製造了所謂「卡丁森波蘭軍官萬人塚」案，來污蔑蘇聯，硬說這些波蘭軍官是蘇聯殺害的。波蘭政府不但不加以駁斥，反而隨聲附和，與希特勒共同進行了這個誣毀蘇聯的罪行，結果墮落到變成希特勒的尾巴。波蘭政府喪失理性到這個地步，蘇聯當然容忍不下，因於同年四月二十六日斷然宣布與波蘭流亡政府斷絕邦交。蘇聯採取這一擊決行動的結果，不但把當時希特勒利用蘇波糾紛在盟國關係上進行的挑撥陰謀完全粉碎了，而且也把波蘭反動集團所掀起的反蘇暗流也壓低下去。但是，逆流畢竟是逆流，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五

日，正當蘇軍打出鴉國界直指羅夫城的時候，反動的波蘭流亡政府又舊調重彈起來，再度發表聲明說「波蘭從未承認且不願承認由武力造成的解決」。

對於蘇波邊界問題，本來早在一九四三年三月間，蘇聯政府就發表過聲明，答覆波蘭政府第一次的聲明，指出：西烏克蘭人和西白俄羅斯人在波蘭貴族地主底統治下是備受虐待與壓迫的民族，只在他們加入自己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弟兄的蘇維埃大家庭後，才得到自由和獨立。根據大西洋憲章關於承認各民族獨立權利的原則，西烏克蘭人和西白俄羅斯人這個歷史上的民族權利是不應該被抹殺的，否則就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傾向，就是對大西洋憲章的直接違背。這一次，蘇聯政府又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發表聲明，一方面指出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人民民族權利的不可侵犯性，蘇聯憲法根據一九三九年經由普遍的民主基礎上的全民投票所表示的兩族人民大眾的意志，已經確定了蘇波兩國疆界，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併入蘇聯，不但沒有侵犯波蘭的民族利益，而且為波蘭人民和蘇聯人民之間的親密友誼，創造了堅實的基礎；一方面，又提出了積極的建議，蘇聯并不把一九三九年的疆界視為不可變更，這些疆界，可以按照對波蘭有利的方式加以修改，這個方式，就是根據一九一八年由英國外界卡遜爵士提出並經國聯高級委員會通過的「卡遜線」，來重新劃定兩國邊界。波蘭不應在東疆擴張領土，而應在西疆，把德寇搶奪去了的古波蘭的領土收回來，這樣，不但可以使全體波蘭人民都團結在自己底國家之中，而且還能夠得到通往波羅的海之必要出路。不過，蘇聯政府最後也強調說明了：與人民絕緣的波蘭流亡政府，不但證明沒有能力在波蘭本土組織反對德寇的鬭爭，而且也證明了沒有能力和蘇聯恢復友好關係。

蘇聯的態度是光明的，它不挾任何成見；而蘇聯的友誼是珍貴的，它並不輕易給予。顯而易見，

如果波蘭政府不與其本國人民同行，不在民主進步的基礎上實行改造，不改變反蘇聯反同盟利益的政策，則其最後的遭遇，將是所有進步人類一致的吐棄。不幸的是：薛戈爾斯基將軍於一九四三年七月間墮機逝世以後，波蘭流亡政府經過兩次改組，不但沒有出現一點進步的徵兆，反而弄得一代不如一代了。自蘇波絕交後，波蘭流亡政府就蓄意進行一種強烈敵視蘇聯的「東歐聯盟」運動，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妄想蘇聯邊境外圍造成一道足以把蘇聯與歐洲隔絕起來的圍牆，以便這樣來阻止蘇聯參加戰後歐洲的和平組織，防止他們心影上的所謂「布爾塞維克的威脅」。波蘭反動政府這個「東歐聯盟」計劃，與其他各種流派反動集團反蘇聯反民主反人民的各種各樣的計劃，如佛朗哥的「拉丁國家集團」計劃，奧國哈布斯堡王室的「多瑙河聯邦」計劃，梵蒂岡的「天主教國家大聯合」的計劃，聯成一氣，形成了國際時局中一股最渾濁的逆流。

然而，逆流不能淹沒歷史的正常發展。蘇軍在東線的成就，已使波蘭獲得解放的日子迫近起來。波蘭人民爲他們自己祖國的解放而作的鬥爭，已獲得蘇聯的同情援助。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及在蘇德戰場上與蘇軍並肩作戰的波軍，已在烽火中受了鍛鍊而日益壯大成長起來。波蘭國內人民軍的力量也在逐日增長，代表這個人民力量的國民會議代表團，一九四四年五月到達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和人民一致熱烈的歡迎。蘇聯政府會一再聲明，它期望在打敗希特勒後，「在歐洲能够有一個獨立而強大的波蘭」，並十分贊成波蘭人民和蘇聯人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友誼。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在他答覆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詢問時，也以簡明的語句，表明了蘇聯對於波蘭國家的立場：「戰後蘇波關係，必須建立在友善關係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或者如果波蘭人民願意，就建築在實行同盟互助的反對蘇波兩國之主要敵人——德寇——的基礎上」。我們相信，在蘇聯的援助和支持下，波蘭人民一定能

够把獨立自由的新民主主義的波蘭創造出來。

再來看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我們知道：南斯拉夫國內的政治發展，也會被希特勒利用來挑撥蘇聯與共盟國的關係，一如利用蘇波糾紛一樣。希特勒努力想把由鐵托元帥和利巴爾博士領導下的南國人民解放運動當做「布爾塞維克威脅」的一個活的標本。來恐嚇英美的統治階層與剝削階層。它經由南國愛國奸賊巴維利區、芮狄克和米海洛維奇的幫助，還加上英國綏靖派和美國孤立派份子從旁附和，散播了各種各樣的謊言蜚語，如硬說南國人民解放會議是蘇維埃政權，硬說南國人民解放軍純粹是「共產黨」，又無中生有捏造南國共產黨毒殺教堂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等。曾經有個時候，米海洛維奇的塞提尼克軍被認為是英美影響下的游擊隊，鐵托元帥的人民解放軍被認為是蘇聯影響下的游擊隊。後來事實證明南國人民解放運動只有一個領導中心，這就是南國人民解放會議和南國人民解放軍，只有他們才在認真從事爭取自己祖國自由獨立的鬥爭，而對反法西斯主義的共同事業貢獻了最大的力量。而三度連任南國流亡政府軍政部長的米海洛維奇，則是南國最卑劣的民族叛徒，他的所作所為造成了對盟國共同利益的損害。南國流亡政府呢？由於他袒護米海洛維奇，反對鐵托和利巴爾，遭到了南國人民與世界進步人士的吐棄。自一九四三年七月間起，英美就正式承認了南國人民解放軍。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南國局勢急轉直下，南國人民解放會議改組成了南國人民臨時政府。這個新的局勢，在英國方面獲得了同情的響應，邱吉爾並派出他的兒子長駐鐵托總部，以便與南國人民解放軍密切合作。而在蘇聯方面，則認為「這種發展是一個積極的事件，對於今後南國人民對希特勒展開更進一步的鬥爭將大有貢獻。這些發展證明了南斯拉夫的新領袖們，在團結一切力量的事業中，已博得盟軍有關的重大成就」。蘇聯在步驟上取得了與英美一致，共同積極援助和支持了南國臨時政府，三

國與南國臨時政府互相派出了軍事代表團，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和接觸。對於南國流亡政府，蘇聯也與英美一樣，暫時還沒有與它斷絕來往。因為南國流亡政府中還包括有一部分進步的力量，正在增長起來，要求肅清米海洛維奇及其同惡相濟的伙伴，而贊成與鐵托實行團結合作。這樣的人如南國駐蘇公使西密克和總參謀部參謀洛西克，南國國家銀行副行長比羌尼奇，前教育部長富博士郎等，他們或則宣佈脫離南國流亡政府，或則成立組織，進行贊助鐵托元帥的運動。蘇聯對南外交政策的方針就是：在與英美對南國局勢取得一致諒解的基礎上，援助南國人民解放軍，促進南國民主進步力量的團結合作。後來南國流亡政府終於宣佈改組，解除了米海洛維奇軍政部長的職務，新總理蘇伯奇已到南國解放區與鐵托進行團結合作的談判，這是南國局勢中一個值得慶幸的新氣象。

蘇聯對貝奈斯總統領導下的捷克政府及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現改稱法國臨時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另外一種類型。因為捷克政府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在某種程度內是願意與人民同行的，在民主精神上是力求進步的，兩者各自都成爲自己國內外人民團結的中心，兩者的組成份子，都包括有全國反法西斯的各黨派在內，因此，也就贏得了蘇聯的高貴的友誼，獲得了蘇聯的熱情的完全的支持。

捷克是慕尼黑會議的犧牲者，而蘇聯是一貫反對慕尼黑會議的。蘇聯曾向捷克提出過保證：慕尼黑會議及其影響捷克領土主權的任何後果都屬無效，而蘇克也繼續保持和發揚了對蘇聯團結合作這個歷史的友誼傳統。蘇捷兩國在反希特勒法西斯戰爭中實行友好互助，表現爲一種值得讚佩的模範。蘇聯幫助了捷克在蘇境編組捷軍，兩國爲了編組捷軍曾於一九四三年五月訂立「由蘇聯維持駐蘇捷軍之物質供應協定」。捷軍自在蘇德戰場上與蘇軍並肩作戰以來，在歷次戰役中，尤以在基輔戰役中，以

其輝煌的功績，博得了全世界的讚美。現在捷軍已與蘇軍一起打到自己祖國的邊境，就要把受難六年的捷克從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來。同樣值得讚揚的，就是當國際逆流勢力蠢動的時候，捷克政府堅決表示了對蘇聯結立場，不與逆流同流合污。卡丁森林案引起的誹謗蘇聯運動，捷克國務會議曾通過決議，譴責波蘭流亡政府。波蘭反動集團的東歐聯盟計劃，捷克政府也表示反對，不願參加。隨着蘇捷兩國人民戰時友誼的增進，訂立兩國同盟互助條約，以便更進一步發展兩國親睦友好關係，就提上了議事日程。於是貝奈斯總統從一九四三年七月起，就計劃到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談判，以英蘇同盟條約為基礎，詳立蘇捷同盟條約，蘇聯在原則上表示了同意和歡迎。惟因受時局逆流的影響，一直到莫斯科和德黑蘭會議以後，蘇捷同盟條約才告成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貝奈斯總統到了莫斯科，第二天就簽訂了「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有效期限為二十年。條約中第一第二兩條與一九四一年「蘇捷對德作戰共同行動協定」內容相同，其所規定的相互幫助義務，兩國早已在實施之中。新的更重要的部份是第三第四第五三條。第三條規定「兩國在戰後時期中，互相保證在跟恢復了東進政策的德國或任何與德國聯合的其他國家捲入敵對行動中，實行援助和支持」；第四條規定「兩國同意在戰後時期中保持密切友好的合作，當依照關於互相尊重彼此獨立和主權以及關於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而行動」；第五條規定「互相保證決不締結針對締約國另一方的任何同盟，或參加任何結合」。這個條約，不僅在蘇捷兩國人民的友誼關係上，構成一個新的政治里程碑，而且對於反希特勒主義的共同事業，對於建立戰後歐洲的和平，又可以說，與英蘇條約，同是兩個堅實的柱石。特別因為簽定於莫斯科與德黑蘭會議之後，這個條約更無異是兩大會議底精神實質之最生動的體現。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蘇聯根據尊重捷克獨立自主的原則基礎上，又和捷克訂立了「關於蘇軍開入捷境後

蘇軍總司令和捷克行政機構關係之協定」。這個協定規定了：蘇軍總司令僅限在作戰地區和與作戰有關的事務，才有最高權力和責任，而捷克政府在解放區則完全擁有掌握公共事務的一切行政權力，經由自己駐蘇軍總部的軍事代表團而保持兩國的接觸，並經由自己的行政機構完全自動地予蘇軍以協助。這個條約從事實上證明：蘇聯忠實保持着自己外交政策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則，這就是民族自決權。蘇聯絕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也絕不以身身政治社會組織的觀念強迫別國接受，蘇聯與任何國家的關係，都是從保證彼此尊重民族獨立權利的立場出發。

蘇聯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即現在法國臨時政府的態度，與對捷克政府的態度一樣；但雙方關係的發展却又稍有不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走向團結和民主，通過了極曲折而複雜的困難道路，這對雙方關係的發展自不免有所影響。在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以前，如前所述蘇聯曾予戴高樂領導的戰鬥法國以全力支持，後來，戰鬥法國所代表的人民的方向勝利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起來了，法國人民都團結在解放委員會的周圍了，蘇聯又與解放委員會保持了密切的接觸。在蘇聯的努力下，經過一番費時頗久的協議，蘇，美，英，中，加等國，才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共同承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合法地位。蘇聯自己則從那時起，就把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當做代表法國人民全體利益的政權機關，自由法國的臨時政府。蘇法兩國人民沒有忘記一九三五年蘇法互助協定的友誼傳統，兩國人民都熱望更進一步繼續對這傳統加以發揚光大。法國臨時諮議會（現臨時國會）曾有過關於步捷克後塵訂立蘇法友好同盟條約的初步討論。就蘇聯方面說，對於訂立這種條約的任何積極建議，蘇聯必定竭誠歡迎無疑。

蘇聯外交的新情況，還更加明顯更加突出地反映在蘇聯與英美盟國友好關係的發展上。英美蘇三

國的團結合作，在此時期，得到了空前鞏固的發展，其鞏固的程度，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三國的武裝力量，現在都正以解放者的姿態向黑暗歐洲大陸進軍，進入歐洲被佔領國家的領土，開始把這些國家的人民從法西斯的暴君統治下解放出來，幫助他們恢復國家的自由和獨立。

我們知道，自從在斯大林格勒吃了大敗仗後，希特勒爲了避免自己最後的失敗，就傾心把自己的全部希望，把自己的整個戰略計劃和政略放在拖延戰爭時間上面。希特勒企圖利用民主同盟由於時間拖延而引起的種種困難，特別是政治上的糾紛，來進行它底挑撥盟國團結，首先是挑撥蘇聯與英美關係的陰謀。這樣就產生了時局當中的逆流，這道洪流沖向蘇英美三國團結的磐石，雖然畢竟沒有把它搖撼得了，但確也引起過麻煩，引起過不愉快。

但是，麻煩也好；不愉快也好，終究阻擋不住事變激流的奔騰前進。這事變的激流就是：蘇軍粉碎了一九四三年夏季德寇的最後攻勢，發動了具有戰略性質的全面反攻，收復了四分之三的國土，把解放旗幟一直插到了喀爾巴阡山麓。英美盟國在順利結束北非戰役後，先是在西西里，繼之在意大利南部進行敵前登陸，獲得了輝煌的成就，踏上了歐洲第一塊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土地；統治了意大利二十年的莫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運動高漲的打擊下，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倒了台，法西斯主義的喪鐘從羅馬城頭敲響了起來；巴多格利奧政府經過五週的動搖，最後實行了無條件的投降，意國南部從德寇魔爪中得到了解放。

這樣，擺在反希特勒聯盟面前的，就有一連串急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如何履行莊嚴的諾言，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如何處理從德寇羈絆下解放出來的歐洲土地？如何恢復這些土地上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生活？法西斯的罪行如何清算和膺懲？戰後世界和平與安全從何着手與保障？因爲對這許多

問題的意見，未能完全一致，所以在同盟國之間，首先在英美蘇之間，會不時引起暗雲。爲加速完成擊潰德寇消滅法西斯主義的同事業，合理解決各種紛歧和爭端，就成了迫切的任務。

關於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留待下面一節專門去檢討。這裏先拿歐洲被解放土地上人民底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再建問題，首先是意大利問題來說：莫索里尼固然「被人民的怒火推翻了」（意大利五大政黨聯合宣言），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法西斯制度仍然存在，意大利并未真正退出戰爭，結果在意大利造成了混亂，人民的力量遭受了極大的損害。巴多格里奧政府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無條件投降後，意大利固然退出了希特勒的強盜集團，然而意國局勢的混亂，並未因此得到澄清。意國北部半壁河山尚淪敵手，這是意國工業中心地帶，意國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策源地和根據地，意國經濟便不免由此更加遭受破壞，更加殘破不堪，意國人民的力量也由此遭到納粹匪徒更直接更殘酷的迫害，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當時，薩伏亞王室依然橫亘在意國人民走向民主進步的道路上，成爲一塊不小的絆腳石，而反法西斯各黨派聯盟與巴多格里奧政府之間的對立，徒然造成人民力量的無謂消耗。顯而易見，意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意國政府必須在民主基礎上實行改組和擴大，法西斯殘餘份子必須從軍隊中，從政權機關中加緊肅清，必須給予意國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權利，以便重建他們的國家的自由和獨立。所有這些，巴多格里奧政府不能解決，英美盟邦按照自己預先定好的計劃在境內成立的「軍政府」也不能解決。蘇聯對於這些問題所抱的態度，是明白而易解的，正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紀念大會上所說：「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的政策，是始終不變的。我們和我們盟國一同，將來必須：第一，把歐洲各國人民從法西斯侵略者的羈絆下解放出來，幫助他們重建被法西斯奴隸破壞了的民族國家；第二，給予歐洲被解放各國人民以充分的權利和自由，以自行決定關於他們的政

府形式的問題……第五，在互相信任與互相幫助的基礎上，確立歐洲各國人民間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永久合作，以復興被德寇破壞了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

拿對德談判和平與清算法西斯戰爭來說：希特勒法西斯是所有進步人類的公敵，必須打倒它，把它從地面上消滅，不能跟它中途妥協談判和平。法西斯罪魁禍首，必須負這次戰爭的全部責任，他們犯了不容饒恕的滔天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懲罰，這是民主同盟各國的共同認識。然而，希特勒彈起了和平調子，從德國不斷傳出了可能發生德國巴多格里奧改變的謠傳，對這種調子和謠傳發生某種幻想難道是應該的嗎？覺醒的德國士兵和德國進步人士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在莫斯科組織了「自由德意志委員會」，雖然在它成立的宣言中說得很明白，委員會底目的是團結德國人民起來進行反法西斯鬥爭，以便推翻希特勒的統治，實行人民的民主政治，重建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可是，却有人不明白還是德國人民十年沉默的終止，而別有用心的人又利用這個事件來進行反蘇聯反人民的宣傳，這種誤解難道是應該的嗎？對希特勒口中的和平可以動心，對人民的和平則視若洪水猛獸，這難道也是應該的嗎？法西斯罪犯的法律地位和責任應該怎樣確定？應該受到什麼樣的判決是怎樣一些罪犯？有人替赫斯辯護，說他不能負這次戰爭的責任，這種理由能够成立嗎？顯然，在這方面，分歧必須終止，混亂必須澄清。在這些問題上，蘇聯的政策也是始終不變的，比如關於對德談判和平的問題，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五一」勞動節的文告中，就曾這樣闡明蘇聯的態度：希特勒法西斯休想使得一個盟國吞下他底和平的香餌。「德國法西斯陣營中的帝國主義強盜們，已用血淹沒了歐洲，用絞刑架釘滿了歐洲，一個人能够跟德國法西斯陣營中的帝國主義強盜們講那一種的和平呢？只有把希特勒軍隊完全打敗，只有希特勒德國無條件投降，才能以和平帶給歐洲，這不是很明顯的嗎？」又比如對清算法西斯罪行

，莫洛托夫在他每次關於德寇在蘇聯所犯滔天罪行送致所有保持外交關係的各國照會中，重覆申述了蘇聯對嚴懲法西斯罪犯的堅定立場。這個立場就是：希特勒政府及其同謀犯，由於他們對蘇聯各族人民以及所有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所犯的一切罪行，不容規避嚴正的責任與應受的嚴厲懲辦；反希特勒聯盟應該確定何人是戰爭罪犯，並規定懲辦的原則。蘇聯曾把戰爭罪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希特勒國家的投意人，包括納粹領袖和德國各軍官；第二類——希特勒軍隊和政權的主使人，包括納粹黨的各級頭目和德國軍隊首長；第三類——歐洲新秩序的主動人——包括一切歐洲國家的賣國賊，如吉斯林、貝當、頓伐爾、米海洛維奇等，這些人都必須受到應得的懲處。

關於保障戰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問題，同樣也存在着分歧；存在着混亂。戰後問題幾乎成了時髦的口頭禪，在各國政府的檔案裏有各種各樣的計劃，在各國專家的書案上有各種各樣的方案，在投機家的頭腦裏，還有各種各樣的夢想。這些計劃方案和夢想，都能够合乎時宜嗎？都能够符合世界上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嗎？都能够符合大西洋兩岸的原則嗎？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當然有它一定的意義，但是如英在目前就集中精力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面，反而把抗戰的實際工作放鬆，那却是非常危險的。蘇聯沒有白白浪費自己的時間在這些戰後計劃的糾纏上面，在蘇聯看來，如果不把戰爭時間縮短，不把德國早日擊潰，一切戰後問題都無從談起。只有反希特勒聯盟各國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合作，越充分越有效，希特勒德國就越會早日被打敗，將來的民主團結的基礎就越會鞏固，而戰後和平組織問題，也就越會符合所有各國人民的利益而得到順利的解決。自然，蘇聯也不是不認為在抗戰勝利迫近的日子裏，不應該來着手對戰後的問題，釐訂一個共同的路線和共同的原則。蘇聯所希望努力爭取的，就是在有利於軍事行動的基礎上，來確定這種對戰後問題的共同政策，只有這

樣，才能够把一切關於戰後問題的分歧和混亂加以澄清。

總之，這些問題提到了反希特勒聯盟，首先是蘇英美三國面前，必須開闢一條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這途徑是什麼？就是：在更進一步發展友好互助與團結合作關係的基礎上，重新確定共同的出發點和共同的方向，重新規定共同的路線和共同的政策，在政治上求得完全協調，在步驟上取得完全一致。

戰爭形勢的發展，越來越有利於反希特勒聯盟的共同事業，把這些問題解決的客觀要求，也就越來越顯得迫切；自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後，就達到了反希特勒聯盟各國，首先是蘇英美三大強國進行商討的成熟階段。先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間，羅斯福和邱吉爾舉行了卡港會議，確定了同盟國的世界戰略——先擊潰希特勒，再擊潰日寇，同時也決定了敵人必須無條件投降的原則。接着三月尾，正當逆流洶湧的時候，艾登有訪美之行。其目的據公報說是：「擬與美政府就戰局交換意見，討論戰爭所引起的問題之有效解決方法」。而實際內容乃是商討英美對於蘇聯的政策問題。又接着，羅斯福和邱吉爾於五月間舉行了戰爭以來第五次會晤，該年度第二次會晤——華府會議；又於八月間舉行了戰爭以來第六次會晤，該年度第三次會晤——魁北克會議。華府會議對於卡港會議的戰略計劃，作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補充，就是佈置太平洋的作戰行動。魁北克會議對於卡港會議的戰略計劃，作了一個修正的嘗試，就是打算把「歐洲第一」的戰略改變為「歐亞並重」的戰略。總然，無論華府會議也好，魁北克會議也好，都不能滿足客觀現實的要求，因為在當時，蘇聯在國際關係上，與英美所處的地位是不對等的，蘇聯担负着反希特勒德國的全部重擔，一路來都是英美對談，有意關閉蘇聯，許多問題解決，都從經過蘇英美三國共同的討論。結果，問題仍然是問題，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然而，客觀事實的發展像「列歷史的車輪」一樣，沿着自己的軌道向前疾馳，不斷衝激了人們的主觀願望。要末就是讓自己落在歷史車輪的後面，要末就是改造主觀趕上前去，共同推動這個車輪前進。先是與華盛頓會議同時，羅斯福總統派了自己的專使，曾任駐蘇大使的戴維斯，帶了一封親筆函件到蘇聯去轉達給斯大林，這才多少抹去了當時由許多不愉快事件所造成的暗影。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也適於這時宣佈解散共產國際，這件事自有它本身的發展規律，而「法西斯強盜在法西斯集團與反法西斯集團各民族之間，劃分了深刻的鴻溝；反法西斯國家中，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各種類型的國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國中，也有很大差別，此外，還有各種情況的中立國。爲了迅速地與有力地組織一切國家的反法西斯鬥爭，國際性的集中組織，早已感到不大適宜於這種情況」（見共產國際解散宣言）。共產國際的解散，既然適應着世界形勢的發展，因而它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影響，自也是十分深刻的。

後來，與北克會議同時，「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提出了積極的建議，要求召開英美蘇三國會議，討論開闢第二戰場，並爲以同盟國家的友好合作做基礎的堅定和平作一準備工夫，就這樣簡捷表明了蘇聯對當時局勢的立場和希望。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也適於這時宣佈更換蘇聯駐英美大使，以高羅米柯代替李維諾夫，以古塞夫代替邁斯基，李維諾夫和邁斯基都調回任副外交人民委員長，就這樣主動進行了三國會議的必要準備。「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這個提議和蘇聯駐英美大使的更換，就像在荒山漫野中聽到的一聲接連一聲的對迷路者的呼喚，英美官方立刻聲明，準備舉行三國領袖會議，並在三國領袖會議以前，召開三國外長會議，接着於同年九月間成立了蘇英美法四國軍事——政治委員會，即地中海委員會，開始着手經過同盟國共同討論來處理以意大利休戰條款有關的諸問題，這

樣，就在實際上鋪平了召開三國會議的道路。

三國外長會議，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三國領袖會議是在三國外長會議一個月以後，在德黑蘭召開的。全世界人民的眼晴都望着莫斯科和德黑蘭，全世界人民的心都飛向了莫斯科和德黑蘭。

三國外長會議發表了五大文牘：關於會議的公報一件，蘇美英中四國戰後普遍安全宣言一件，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關於懲辦戰爭罪犯的聯合宣言一件，關於意大利和奧大利的宣言各一件。三國外長會議的最大收穫就是：第一，在軍事上，「會議中曾經坦白而詳盡討論採取措施，以縮短對德國及其附庸國進行的戰爭」，曾經「討論明確的軍事行動，關於這一點，已作了決定，並已從事準備，以便造成將來三國間最密切的軍事合作的基礎」。第二，在政治上，蘇聯和英美已在世界戰後問題上，商得了共同的路線和共同的政策：四國普遍安全宣言，奠定了戰後和平的基礎，規定了保證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共同遵守的具體原則。對奧大利的宣言，闡明了尊重各民族獨立自由權利的堅決立場，還警告了奧國「在最後清算時，必然要考慮到對其自己解放所作的貢獻」。對意大利宣言，則以意國為例，規定了從法西斯暴政下獲得解放的各國在國家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措施上所遵守的民主團結的原則。懲辦戰禍罪首的宣言，表明了反希特勒聯盟消滅一切種類法西斯主義的決心，一切染有人民血跡的法西斯罪犯都要追緝到天涯海角，把他們捉回犯罪地點，交由當地人民公開審判。

莫斯科會議還曾決定組織歐洲顧問委員會和意大利顧問委員會，兩個委員會接着就在倫敦與阿爾及爾先後成立，凡有關各國都派有代表參加。兩個委員會此後就開始了有效的工作，順利貫徹了自己的任務。

三國領袖會議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光輝地結束的，會後發表了三國領袖共同簽名的宣言。宣言全文雖然只有幾百個字，但却是偉大雄壯的一首感人肺腑的史詩。

在軍事問題上，宣言裏說：「我們已經議定了把德軍消滅的計劃，我們已就從東西南三面進行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商得了完全的協議。我們的進攻是毫不留情的，越來就越來越強有力」，這是多麼洪亮有力的戰號聲音！

在政治問題上，宣言裏說：「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傳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對大多數人民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那些國家的人民廣和我們本國人民一樣，都是全副心竅，抱着獻身精神，要消除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我們一定要歡迎他們，聽任他們抉擇，參加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裏去」，這又是多麼動人的感召的聲音！

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和德黑蘭三國領袖會議在國際政治發展的歷史上，在人類數千年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是兩個具有空前偉大歷史重要性的事件。它們將像荷馬的偉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塞」一樣，寫在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寶頁上，永遠放射出燦爛的光輝。莫斯科會議和德黑蘭會議都劃分了時代，決定了歷史。說它們劃分了時代，這意思就是說：它們報導了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這個新的時代，就是以蘇英美爲首的國際團結和國際和平的時代，就是「沒有戰爭恐懼和災難」的「世界民主國家大家庭」的時代，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時代。說它們決定了歷史，這意思就是說：它們決定了無數世代人類的命運，全世界每個角落各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都要被完全消滅，全世界各民族人民

都將保證在戰後度着長期和平自由幸福的勞動生活。只有自甘墮落自甘附麗於黑暗的人，才會在這兩個會議的陽光照耀下，躊躇不前，迷失路途。

正因莫斯科會議與德黑蘭會議有劃時代的意義和價值，所以在這兩個會議之後，立刻出現了許多有偉大意義的事件：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會議改組成了臨時政府，宣佈了按照民族聯邦原則把南斯拉夫改造成爲一個新的自由的國家。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蘇聯和捷克簽訂了「兩國友好互助與戰後合作條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蘇聯與意大利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把蘇意關係和英美與意國關係之間的不平等現象消滅了。

同年三月二十日，法奸普秀被判處死刑，盟國懲辦法西斯罪犯這算是第一次。

同年四月四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實行擴大組織，法國共產黨有代表二人參加，鞏固了法國的團結，改進了法國的民主。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意大利巴多格里奧內閣改組，意國反法西斯各黨派都有代表參加，意國共產黨也有四名代表參加政府。

同年四月三十日，蘇捷締結了關於蘇軍進入捷境後蘇軍總司令與捷克民政機構間之關係的協定。

同年五月十六日，黨英美根據民族平等原則與挪威分別締結了關於盟軍解放挪威後在挪威境內的民事行政和司法行政的協定。

同年六月六日，英美盟軍在法國諾曼第半島登陸，開闢了真正的歐洲第二戰場，實踐了兩年前莊

嚴的諾言，履行了莫斯科和德黑蘭會議的重大決定。

所有這一連串重大的事變，都是證明歷史的列車，正在沿着莫斯科——德黑蘭會議決定的軌道運行，在我們的面前，湧現了一片寬闊光明的民主的原野。

最後，在這一階段的蘇聯外交，還有必須補述的一點，這就是蘇聯與日本的關係。這是至今還被某些以感想代替政策，以願望抹煞事實的人所誤解了的。這種誤解的來源，是由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日訂立了中立條約，而且把這些條約繼續維持到了今天。三年以來，蘇日中立條約受了嚴重考驗，在莫斯科危急的時候，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劇烈進行的時候，日本法西斯陣營中的帝國主義反動集團，都幾乎勃發着特勤斯毀了這個條約，然而終於被蘇聯嚴正的外交政策與遠東蘇聯軍事威力所阻止住了。在蘇日間存在着許多懸案，如北庫頁島油礦和煤礦的租借區的清算問題，都被好戰的日本強盜故意延擱了下來，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天，由於反希特勒聯盟在各戰場得了輝煌的軍事成就，才使日寇慢慢清醒過來，才認清了應該來恢復關於油礦和煤礦租借區的談判，因此才有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蘇日關於清算北庫頁島日本租借區和延長蘇日漁約的協定，這正是蘇聯在對日外交上的一個大勝利，其意義並不下於在歐洲東綫打擊德寇。但是，國際間某些人士却不顧事實真相，而竟認為這是蘇聯對日「妥協」，甚至懷疑有某種秘密的軍事性質的諒解。他們不能而且也不願認識蘇日中立條約的存在，實在是對民主陣營有利，而絕不是對法西斯陣營有利。這一協定是日寇在領受張鼓峯門坎兩大軍事教訓後對蘇屈膝的結果。這個協定在蘇德戰爭爆發後，保證了蘇聯能夠避免兩面受敵，因而能夠集中力量打擊希特勒德國。對德戰爭可以決定對日戰爭，希特勒德國如果早一天被擊潰，同盟各國也就能够早一天集中力量去反攻日寇，這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世界戰略。我們說蘇日中立協定對盟國

絕對有利，其理由在此。

其次，我們要問：蘇聯對在遠東打擊日本到底有沒有積極的貢獻？事實的答覆是肯定的：有積極的貢獻。這幾年來蘇聯不但在歐洲抗擊着二百多過希特勒的精銳師團，同時還在遠東牽制了日寇五十個以上的精銳師團。只要想想：日寇用在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軍隊的數目，也並沒有比這個數目超過多少，就不難明白蘇聯對於抗日戰爭也有很大的貢獻。在歐洲，由於蘇軍負起了抗擊德軍主力的全部負擔，所以英美盟軍才能爭取時間完成作戰準備，由防禦轉入進攻。在遠東，也由於蘇軍牽制了日寇一部份主力，所以盟軍才能積極阻擊敵人，並爭取時間增長實力，轉入局部的反攻。這都是客觀事實，是不能隨意抹殺的。

最後，我們要問：蘇日中立協定的存在，能夠說明蘇聯容忍了日本軍事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嗎？事實的回答也是鐵硬的：從來沒有容忍過，而且利用了一切可能去打擊日寇的侵略行爲。例如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挑起太平洋戰爭以後的第五天，即十二月十三日，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就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公開發言：

「軸心國包括日本，爲國際強盜一夥。吾人（指蘇英美）現在同一戰爭中作戰，吾人將攜手並進，制服現時代中最可憎惡的惡魔。希特勒爲該夥中的主犯，德寇全體暴徒，以軸心國自詡。日本爲國際強盜中的一員，自應負其應負之侵略責任。」

蘇聯不僅公開指斥日本帝國主義爲國際強盜之一員，而且於一九四二年初簽字於二十六國宣言，這個宣言完全同意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不承認用武力擴張領土，也不承認未經民族自由意志同意的領土變更，並爲對抗與之立於戰爭狀態的軸心國家，使用其全部軍事與經濟資源。很明顯的，蘇聯與英

、美、中國等反侵略國家是站在一條戰綫上，共同致力於擊潰國際強盜的艱巨工作。侵略國家最害怕這種民主國家的合作抗敵，所以在二十六國宣言簽字的第五天，即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日本內閣情報局發言人堀公一本竟提出無賴的恐嚇，說：

「目前日蘇關係依舊甚于日蔣中立協定，但如蘇聯決定參加各民主國家反對防共協定的陣綫，則國際關係自將大為改變」。

但是，蘇聯對於太平洋戰爭的態度，是這樣明確而堅定，豈能由日寇所左右！恐嚇不能達到目的，就只好用造謠中傷，企圖來離間蘇聯和英美的關係。例如日本報紙竟無中生有，硬說在「向日本皇軍大本營慶祝佔領新加坡之外國使節中，蘇聯大使館代表某君亦在其列，惟姓名則嚴守秘密云」。這正像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塔斯社闢謠聲明所說：「不辯自明，此乃日本挑撥離間的謠言。蘇聯大使館代表決不能在日本大本營出現，當然更不能就遠東的任何軍事事變，向日本統帥部致賀」。

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真理報又發表專文紀念蘇日中立協定的一週年，指出日本軍閥有進攻蘇聯的可能，同時，對日本政府提出了嚴厲的警告：

「這個中立協定和蘇聯的和平政策一致，會阻止世界大戰範圍的繼續擴大。同時，這個中立協定又是日蘇邦交長期發展的結果，日本認識如下的平凡真理的結果，即：蘇聯決不屬於那些利益可以被他人隨便侵犯而不受譴責的國家。」

在過去年來，已發去了對這中立協定的雙方簽字國都有直接關係的重大的艱險多故的事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參加把防共協定延長五年。防共協定的侵略本質，是盡人皆知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日德意又簽訂了新的三國公約，不僅互相保證對英美共同作戰到

底，決不單獨締結和約，甚至在戰爭勝利結束後，更要遵照三國公約的精神，最密切地合作，所以日蘇中立協定就受到嚴重的考驗了。

爲了使這中立協定繼續存在，日本必須表明對於條約，抱着嚴格遵守的態度，已經解決的問題不得留下懸案。被軍事的勝利衝昏了頭腦的日本軍事法西斯敗類，必須認清他們關於在北方進行吞併戰爭的囑語，首先，會使日本自身蒙受大害。

眞理報的警告，深深地打進日本法西斯統治者頑固的腦子裏，因而挑動蘇日戰爭的陰謀，就一次一次被壓制了。

第三節 西歐第二戰場開闢以後的蘇聯外交

軸心國強盜所以進行侵略戰爭，不僅是爲了掠奪原料和領土，也不僅是爲了變千百萬男女爲奴隸，而且想毀滅人類發展所必需的一切自由權利，使人類向後倒退到中世紀黑暗時期，把地球變成由少數法西斯惡魔來統治的悲慘世界。反希特勒聯盟底目的，就是要進行共同的神聖戰爭，以便擊潰希特勒及其合作者，並消滅各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這種戰爭要想達到勝利底目的，應以同盟國之間的民主團結與戰略協同爲前提。這就必須從東西兩面來夾擊德國，逼使它兩面作戰。顯然，除了開闢歐洲第二戰場，與蘇聯軍協同作戰以外，沒有旁的什麼道路能夠達到同盟國底這個目的。然而，差不多整整三年，一直是蘇聯軍獨自担着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部負擔。因爲沒有第二戰場，使德寇能在戰爭初期獲得軍事上暫時的成就；因爲沒有第二戰場，使德寇能够僥倖逃脫一九四二年——四三年的潰敗；因爲沒有第二戰場，延長了歐洲人民解放的時期。

蘇英同盟互助條約和美蘇協定於一九四二年五月間先後訂約時，英美盟邦對於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是有過莊嚴的諾言的；一九四三年一月卡港會議是有過「九個月作戰計劃」的，可是，一九四二年——四三年都在人們的期待中消逝了。當一九四二年九月間斯大林格勒爭奪戰已到了生死階段，與美國共黨領袖威爾基受羅斯福總統之命訪問蘇聯時，雖然蘇聯需要開闢西歐第二戰場是那樣的迫切，雖然英美人民和全世界正義人士呼籲開闢西歐第二戰場是那樣的熱烈，而西歐第二戰場還是遲遲未曾出現。所以當威爾基親自訪問了蘇聯當局和人民，視察了前綫和後方，「直接採探了蘇聯人民作戰的實況，認識了人民戰爭一詞之含義」以後，亦「發覺頗難向蘇聯前線士兵解釋，何以英美尚未準備在歐洲直接進攻德國」，因而發表嚴正聲明，由衷地指出：「坐在美國披閱蘇軍前仆後繼死守斯城之消息，自屬易事，而要真正感覺和認識到蘇軍的英勇，人民的努力，戰爭的緊張，蘇聯的要求，就決不是坐在遙遠的平靜都市所能達到其萬一的」。威氏又說：「斯大林格勒蘇軍每殺一個納粹侵略者，即不會少一個在世界戰爭中其他戰場屠殺我軍之敵人。但是，今天英美所做的一切，還遠不能滿足蘇聯的要求，所以是有負於蘇聯的。的確，蘇聯獨力和法西斯德國奮戰，使德國的主力牽制和削弱於東戰場；因此，就使盟國得減除了德國給他們的威脅，獲得了增強軍力和加緊生產的時間。也可以說：蘇聯的艱苦抗戰，解救了盟國。現在蘇聯的斯大林格勒處在這樣危急的情勢下，正需要盟國的切實援助；可它所得到的，還是空言超過實際，這在情理上，無論如何說不過去。況且，英蘇有同盟條約，美蘇有互助協定，英美如不充分而及時的履行，從條約的義務說來，也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因此，威爾基在他聲明的結論裏，極力主張早開西歐第二戰場，美國應以一切力量積極援助蘇聯。

威爾基的聲明，充滿了正義感和責任感，而且完全是真情實理。雖然張伯倫的僵屍，慕尼黑派的魘

術家，正在按住人民的嘴吧，想把海潮阻擋。但是，人民的嘴吧是不容易按得住的，要求開羅西歐第二戰場的呼聲，正不斷從世界每一角落發出，而且在輿論上引起了騷動。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卡第西·特爲此事走訪蘇聯統帥斯大林。斯大林乃用下面一封信去答覆卡第西：

親愛的卡第西先生：

由於工作的繁劇，因而不能對你發表一次談話，我只得對你的問題作一個簡短的書面答覆。

第一、「一」一個第二戰場，在蘇聯方面對當今形勢的估計中，究竟佔什麼樣的地位？」

答：佔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說，佔一個頭等重要地位。

第二、「一」同盟國對蘇聯的援助，有效到什麼程度，可以做些什麼來擴大並增進這種援助？」

答：蘇聯把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主力都吸引到自己這邊來了，跟蘇聯這樣正給予同盟國的援助比較起來，同盟國給予蘇聯的這種援助，直到現在效力都是很小的。爲了擴大并且增進這種援助起見，只要求一件事，就是：同盟國充分地而且及時地履行他們的義務。

第三、「一」蘇聯方面的抵抗力量還剩多少？」

答：我想，蘇聯抵抗德國強盜的力量，在強度方面，即使不比法西斯德國的或任何其他侵略國想爭取世界霸權的力量來得大些，也決不來得小些。此致

敬禮！

斯大林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日。

斯大林的書面答覆，首先在英美工人羣衆中發生深刻的印象。英國工人紛紛開會，要求政府迅速履行英蘇同盟條約所規定的義務。英國下院議員亦提出詢問，要求邱吉爾首相提出保證，勿使英蘇關係發生裂痕。美國人士所組織之美蘇聯誼大會，特爲此事召開大會，藉以鞏固美蘇邦交。當時威爾基

適在重慶，他讀到斯大林對卡西第書面答覆之後，乃於十月十日對塔斯社駐渝記者發表如下聲明：

「我希望斯大林先生的聲明，很有力量地使聯合國各國人民注意到蘇聯所最必需的，這正是上一星期我在莫斯科就我個人的信念發表聲明的目的」。

斯大林格勒爭奪戰正在猛烈進行，兩邊都不惜付出重大代價，來爭奪每一條街道和每間房屋。愛倫堡：「德國軍隊差不多佔領了斯大林格勒，但是它們沒有並且也不能完成這個「差不多」，因為斯大林格勒是一座由人的胸膛所拼成的牆壁，是一座活的牆壁」。就在這個空前猛烈的爭奪戰中，蘇聯舉行慶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而歐洲第二戰場還是沒有絲毫踪影。在莫斯科慶祝大會上，斯大林發表了有名的報告，指出過去一年半反納粹德國的鬥爭，表示出紅軍和它的戰鬥幹部已經成長得變成一種精銳的力量，不僅足以抵禦德國法西斯軍隊的猛攻，而且能够在堂堂正正的戰鬥中，使他們吃敗仗，驅逐它們後退，如在羅斯托夫、圖拉、和卡盧加各區，在莫斯科，以及在提契文和列寧格勒的戰鬥行動，都對希特勒日趨不利。「決不能認為只是偶然的事情，德軍曾經在全歐洲勝利進軍，曾經一擊之下就把公認為頭等軍隊的法國軍隊打敗，只是在我國（蘇聯）才遭遇到有力的軍事的抗拒，並且不僅遭遇到抵抗，而且在紅軍的打擊下，不得不從它們已經佔領了的陣地上潰退四百公里以上，潰退的時候，把數量驚人的大砲、機械和彈藥等，都沿途拋棄了，這種事實決不能夠只是用多令的作戰情況來解釋的」。

可是，希特勒德國軍隊雖然已經減弱，不能再像一九四一年夏秋間那樣，足以在南路北路和中路，同時進行攻勢，不過它們還是強大得足以在某一路組織猛烈的攻勢的。「乘歐洲沒有第二戰場之際，德軍和它們的同盟軍，就把它們一切可調的後備役都調到這個戰場上來，把它們集結在一路上，集結

在西南路，形成了兵力方面的優勢，並且取得了大體上的戰術上的成就。斯大林又說：

「讓我們假定歐洲存在着第二戰場，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存在過的一樣，假定這第二戰場，比方說，牽制住德軍六十個師團和德國的同盟軍二十個師團；那末，德軍在我們戰場上的處境，定已是怎麼樣了？這是不難猜想的，它們的處境一定已是很可悲的。而且，那一定已成了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末日的開端，因為在那種場合，紅軍一定已不會在如今所在的地方，而是在北斯哥夫、明斯克、什托密爾和奧德薩附近的一些什麼地方了。那就是意味著：在今年的夏天，德國法西斯軍隊就一定早已大難臨頭；如果說，並不會發生這種情形，那是因為歐洲沒有第二戰場，使德軍得救了」。

雖然如此，斯大林還是堅決相信西歐第二戰場遲早總要開關的。他說：

「是的，遲早總會有的，總會有一個第二戰場的。所以一定會有，那不僅因為我們需要它，而是，更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盟國需要它並不減於我們。我們的盟邦不能不認清：自從法蘭西被弄得喪失戰鬥力以來，沒有第二戰場對抗法西斯德國，可能招致對所有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都不好的結局，包括盟邦自身在內」。

蘇聯雖然不斷呼籲盟邦英美開關歐洲第二戰場，但是它們從沒有一刻放鬆自己的努力。它們努力的結晶，表現在斯大林格勒英勇的保衛戰與希特勒戰略計劃的粉碎。在這著名的保衛戰中，德軍被擊潰者就有三十三萬，被俘者九萬，而其高級將領自鮑盧斯元帥以下投降者竟達二十九名之多。充分表現了新的精神、新的戰術、新的英雄主義，所謂斯大林格勒人與斯大林格勒精神，已經成為新時代的標幟。因為正是他們開始打退了那快要淹沒這一個世界的法西斯狂潮，正是他們最後扭轉了整個反法

西斯戰爭的局勢，奠定了同盟國家全面反攻的基礎。

後來，英美盟軍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軍事行動，都各有其重大的意義，但都算不得第三戰場。因為在北非與盟軍對抗的只有德軍四個師團和意軍十個師團，在西西里只有德軍兩個師團和意軍五個師團，在意大利則只有德軍十五個師團。而在蘇德戰場上，一九四二年是德軍二百七十九個師團，附庸國軍隊六十一個師團，合計二百四十個師團；一九四三年是德軍三百〇四個師團，附庸國軍隊五十七個師團，合計二百五十四個師團。根據斯大林所下的定義，必須在西歐進行軍事行動，而在這個軍事行動中能够牽制德軍六十個師團及附庸國軍隊二十個師團，才是真正的第二戰場。蘇聯對於第一戰場是抱着堅強的信念的，它主張必須開闢，爭取及早開闢，也相信能够開闢，幫助進行開闢，斯大林在去年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紀念會上就會這樣說過：「南歐目前的軍事行動不能視為第二戰場，然而總有些像第二戰場了，歐洲真正的第二戰場已經不遠了，那顯然必將大大加速對希特勒德國取得勝利，而且必將更加鞏固盟國間的戰鬥友誼。」

到今年六月六日，英美盟軍在法國海岸登陸，姆娜來運的歐洲第二戰場終於出現，斯大林底科學預言成爲事實了。經過千呼萬喚，足足遲延了兩年之久的歐洲第二戰場，直到今年六月才出現。這裏面基本的和直接的因素，首先是蘇德戰場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許多過去以爲不可能的事情已成爲事實了，到今年四月爲止，無敵的德軍已退到喀爾巴阡山，巴爾幹和中歐的門戶已經洞開，如果蘇軍能在一年內恢復同期間所失全部土地，並進而開始搗毀希特勒歐洲堡壘的東垣，誰還敢斷言蘇聯決不可能獨力打敗德國，尤其是進入了巴爾幹之後，它可能組成新的反德聯軍，不用獨力而用另一形式聯合作戰，而對着這種可能，西方聯合國國家顯然是不能繼續採取漁翁戰略的了，如果它們在任何時期會

採那種戰略。如今即使僅爲本身利害着想，它們也必須趕緊到歐洲大陸上去逐鹿。於是，過去那種第二戰場遲遲不開的原因，如今已一變成爲速開的動力。

同時，歐洲第二戰場遲遲不開的其他因素，也都在迅速改變之中。準備不充足已經是最早就過去的事情，聯合國家已打勝了生產戰爭。剩下的是自信問題，空軍決定論，海軍制勝主義以及戰略的保守性。然而經過半年來對於德國的猛烈轟炸，依然沒有把德國的戰爭方式炸掉。於是除少數頑硬的空軍萬能主義者以外，英美普遍的輿論已經開始在懷疑空軍攻勢單獨迫使投降的可能。雖然急進的美國雜誌「新聞週刊」，曾大膽論斷戰略轟炸在五年內可能把德國炸成不怕炸。盟軍總司令部也發表威爾遜軍，亦肯定說過單獨轟炸不能取勝。因爲轟炸制勝主義實際上祇是封鎖戰略，這種內線封鎖無疑已打擊德國，但它對於德國的戰爭實力戰鬥意志究竟打擊到什麼程度，却很難作一肯定答覆。雖然確實已使德國生產減少，但最高估計不過是百分之十五。相反地，本年三月六日出版的美國「週刊」却有這樣的記載：據從德國和德佔歐洲回國的美國新聞記者和外交人員說：轟炸反使德國人的戰志更強，使他們更團結。路透社本年四月十四日倫敦電，亦宣布了英國空軍評論家的估計：「過去五個月來，德國第十線戰鬥機實力已增加二百架至三百架。」

如果面對事實，人們會看出，即僅就對德國經濟作戰力的打擊而論，空線陸上攻勢的效果，也大於西方的空中攻勢。由於蘇聯紅軍克復頓巴斯與烏克蘭，就剝奪了德國三分之一的煤，百分之四的鐵，百分之五的鎳，尤其重要的，就是由於蘇軍的反攻勝利，足足摧毀了德國的一切希望所寄託的食糧戰線。一切論證集中到一個答覆：如果英美盟軍真想擊敗希特勒，而又不願蘇聯獨佔德境果實，那麼當它們看到蘇聯已有獨力勝德的可能時，必然會要開闢歐洲第二戰場，而且開闢之後，必然要猛

烈進軍，以與蘇軍在東線作一戰爭競賽。

蘇聯底作戰目的，是與盟邦協力擊潰希特勒德國，消滅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保衛祖國和幫助解放歐洲被法西斯強盜奴役的民衆與人民。今年六月所開闢的歐洲第二戰場，雖然和蘇聯過去所呼聲開闢的第二戰場，其實隱意已不盡相同，然而這個第二戰場的開闢，究竟還有縮短擊潰納粹德國的時間的進步作用，所以蘇聯還是表示歡迎。而且在歐洲第二戰場開闢以後的第四天，即六月十日，立刻在另外兩樞軸線發動夏季新攻勢，以示爾合和響應。蘇軍這個攻勢發動僅有四工夫，就督督衝破德芬強固防線，克復考皮庫利亞等據點，德寇自從閃擊運動戰術被蘇軍打敗之後，就回頭走堡壘和防線的老路，如今又被打敗了。

自六月十日蘇聯在東線發動總攻，紅軍西進的速度，創造了自有戰爭以來的空前紀錄。從明斯克到波羅的海，從威得比斯克到維爾那，紅軍一直維持着每天二十英里的速度。英國軍事評論家約翰·莫頓說：「蘇軍推進的速度，要比德軍在一九四〇年在法國和一九四一年在蘇聯的最快的閃擊戰還要迅速。」「潰退的德軍呈現了一種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未曾前見的現象，德國官兵被俘人數比例的激增是這次戰役的特徵之一」。一個奇蹟跟着一個奇蹟，今天進軍的速度遠超過昨天預想的行程。從七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六天之內，蘇軍接連收復了格羅德諾、夫拉第米爾佛寧斯基、莫斯科洛夫、北斯摩夫、霍爾姆、盧布林、納瓦、羅夫、斯堪尼斯拉夫、比洛斯諾克、特文斯克等重要據點，特別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在如火如荼的漫長一千英里的東線上，蘇軍在一天之內就打下了六大城市和三千六百多鄉鎮。蘇大將連下五次命令嘉獎戰功，莫斯科連響着祝捷的禮砲，創造了戰爭以來的空前紀錄。

蘇軍繼續着閃擊的前進，七月下旬粉碎了德寇最甚韓武裝力量的「中英集團軍」三千餘師團之

後，八月一日攻克考那斯，在波羅的海至沙又包圍了德寇的北方集團軍的二十個以上的師團。南方克羅夫攻後，蘇軍又渡過西布格河、桑河、維斯杜拉河。中路從加拉茲經布加勒斯特沿多瑙河直趨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邊境，九月七日蘇軍先驅部隊已和鐵托元帥的部隊會合，右翼佔領普羅薩特特油田之後，跨過達朗西尼瓦尼亞山脈，與脫離了德國羈絆的羅軍並肩作戰，克復布拉索夫，且戰且進；左翼克復黑海大港康斯坦薩，沿多瑙河趨柔爾柔。就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觀察，多瑙河中流之戰正如真理報國際觀察員所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勝利」。因為在軍事上粉碎了蘇德戰場南面德寇防線的整個右翼，使希特勒在巴爾幹的二十五個師團完全瓦解。在政治上，紅軍的進入捷克斯拉夫、南國境，使巴爾幹局勢迅速地發生了對德寇極不利的轉變。從此，紅色多瑙河咆哮，綠色多瑙河激盪，褐色多瑙河也不能再平靜了。蘇聯紅軍以解放者的姿態和他們親如兄弟的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苦難深重的土地出現，這是有極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由於蘇聯的進軍與人民的壓力，羅馬尼亞國王於八月二十三日宣布接受由蘇聯所提出並經英法同意的投降條件，推翻安多尼斯哥獨裁親德政權，改組政府，二十五日宣布對德作戰。這是希特勒喪失巴爾幹所有附庸國的真實開始，也是報告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日益死亡的鐘聲。從九月十日到十二日的幾天內，蘇英美三國代表在莫斯科代表所有聯合國的利益，和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進行關於和羅馬尼亞訂立停戰協定的談判。代表蘇聯參加談判的有莫洛托夫，維辛斯基，曼紐爾斯基，諾維科夫，維諾格拉多夫將軍和波科格登海軍少將。代表大不列顛的是英駐蘇大使卡爾，代表美國的是美駐蘇大使哈立曼。參加談判的羅馬尼亞政府代表是巴特拉斯卡魯，達馬卡魯將軍，斯提爾科和波普。經談判後，已在九月十二日簽訂和羅馬尼亞的停戰協定。蘇聯元帥馬寧諾夫斯基于蘇英美三國政府授權簽訂

停戰協定。巴特拉斯卡魯，達馬卡魯將軍，斯捷蘭科和波普代表羅馬尼亞簽字。停戰協定條款如下：

(一) 羅馬尼亞將在同盟國方面對德國和匈牙利作戰，以恢復其獨立和主權。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該國軍隊將派出步兵十二師參加作戰，同時要續派援軍。羅馬尼亞的海軍和空軍，也將在同盟國和蘇聯統帥部全面指揮之下，從事作戰。

(二) 羅馬尼亞將保證蘇聯和其他同盟的軍隊，在軍事情勢有所必要時，得在羅境自由行動。該國並將以德海空各方面的一切運輸工具，給予蘇聯和其他同盟國的軍隊應用，費用由羅國本身負擔。軍軍服將在停戰期間，在作戰上有必要時隨地使用羅國的一切陸海空軍設備，以及港灣、營房、倉庫、機場、通訊站等，並包括其中的服務人員在內。

(三) 羅馬尼亞將立即以所拘的一切蘇聯和同盟國戰俘以及所拘並強押到羅馬尼亞的一切人民交給盟國軍總部，以便各回本土。從這些條款簽字日到上述俘虜和人民返回本國的日子止，羅國要負責予以照料，供以充足的衣食，並按照衛生上的必要，予以醫療協助，同時並供以運輸工具，俾得各回本土。一切費用由羅國自行負擔。

(四) 羅馬尼亞將立即以所拘的一切蘇聯和同盟國戰俘以及所拘並強押到羅馬尼亞的一切人民交給盟國軍總部，以便各回本土。從這些條款簽字日到上述俘虜和人民返回本國的日子止，羅國要負責予以照料，供以充足的衣食，並按照衛生上的必要，予以醫療協助，同時並供以運輸工具，俾得各回本土。一切費用由羅國自行負擔。

(五) 羅馬尼亞將立即以所拘的一切蘇聯和同盟國戰俘以及所拘並強押到羅馬尼亞的一切人民交給盟國軍總部，以便各回本土。從這些條款簽字日到上述俘虜和人民返回本國的日子止，羅國要負責予以照料，供以充足的衣食，並按照衛生上的必要，予以醫療協助，同時並供以運輸工具，俾得各回本土。一切費用由羅國自行負擔。

(六) 羅馬尼亞將立即以所拘的一切蘇聯和同盟國戰俘以及所拘並強押到羅馬尼亞的一切人民交給盟國軍總部，以便各回本土。從這些條款簽字日到上述俘虜和人民返回本國的日子止，羅國要負責予以照料，供以充足的衣食，並按照衛生上的必要，予以醫療協助，同時並供以運輸工具，俾得各回本土。一切費用由羅國自行負擔。

(七) 羅馬尼亞將立即以所拘的一切蘇聯和同盟國戰俘以及所拘並強押到羅馬尼亞的一切人民交給盟國軍總部，以便各回本土。從這些條款簽字日到上述俘虜和人民返回本國的日子止，羅國要負責予以照料，供以充足的衣食，並按照衛生上的必要，予以醫療協助，同時並供以運輸工具，俾得各回本土。一切費用由羅國自行負擔。

帥部，作為戰利品，其中並包括現在羅國領海的德國和其附帶國海軍艦艇。

(八) 羅馬尼亞有責使德匈兩國或兩國人民以及居住兩國或其佔領區的人民，所有一切資產包括貴重的物品和貨幣等，非經盟(蘇)軍統帥部准許，不得移動，或轉移其所有權。他們將保障這些資產的安全。

(九) 羅馬尼亞負責以現在羅國境內的一切聯合國所有船隻交給盟(蘇)軍統帥部，而不問這些船隻目前是歸何人管理。這些船隻在對德匈作戰期間，由盟(蘇)軍統帥部使用。使同盟國都蒙其利戰爭結束後，則歸還本主。在交給盟(蘇)軍統帥部之前，上述船隻如有任何損壞，羅政府負全部責任。

(十) 羅國必須經常以羅幣繳付盟(蘇)軍統帥部為實施其任務所需要的款項。並在必要時，依盟(蘇)軍統帥部的指示，以羅國的工業和運輸設備和通訊站、電力站、公用事業、燃料食物、和其他物資交盟(蘇)軍統帥部使用。在羅國和外國領海的羅國商船的行動，將歸盟(蘇)軍統帥部管理，以便用於同盟國共同有利的方面。

(十一) 蘇聯因作戰和羅軍佔領蘇土，而受的損失，將由羅國賠償。但因額及羅國不僅已退出戰爭，且已對德匈兩國宣戰，並已實際作戰，所以各簽字國一致同意羅國不必賠償全部，而只要賠償一部份，其數將為三萬萬美元。以石油、穀類、木材、船隻和各種機器等貨物折價，分六年繳清。羅國並要賠償其同盟國和其人民戰時在羅馬尼亞的損失數目等以後再決定。

(十二) 羅馬尼亞負責把蘇政府公共和合作機構或私人所有一切財產和物資交還蘇聯，如工廠設備、鐵路機車和車廂、曳引機、汽車、歷史珍品、博物院展覽品等。

(十三) 羅馬尼亞負責恢復聯合國和其人民戰前在羅境的一切合法權益，並將其一切財產完全交還，不得有絲毫毀損。

(十四) 羅馬尼亞負責和盟(蘇)軍統帥部合作，逮捕被控犯戰罪的人。

(十五) 羅馬尼亞負責立即解散境內一切法西斯親希特勒和其他從事反聯合國尤其反蘇活動的組織，並不准在未來期間，有類似組織成立。

(十六) 羅國境內將在和盟(蘇)軍統帥部商得同意之下，管制一切定期刊物雜誌的出版輸出和傳佈，影片戲劇的上演，以及郵電檢查等措施。

(十七) 在當地情勢許可之下，羅國全境的民政機關將恢復，但在距離戰線五十公里到一百公里以外的爲限。羅國一切行政機關，將負責施行盟(蘇)軍統帥部爲安全與和平所頒布的命令。

(十八) 盟(蘇)軍統帥部聯合主持下，以聯合國名義工作的同盟國管理委員會將行成立。在和約簽字以前，將管理和規劃各種協定的實施。該委員會可在羅國各地自派官員，其總部在布加勒斯特。

(十九) 同盟國政府認維也納仲裁的決定爲無效，並同意達琅西里瓦尼亞的全部或大部份應歸還羅國。蘇聯政府同意蘇軍爲達到這一目的，將和羅軍合作，共同對德匈作戰。

(二十) 上述條款簽字後，立即生效。

停戰協定簽訂之後，羅國代表團團長巴特拉斯卡魯在離蘇前夕向外國記者說：羅馬尼亞的人民，都知道唯有和蘇聯密切合作，才能使羅國成爲獨立自由的國家。戰敗國家自然不能對停戰協定有所滿意，但羅馬尼亞前因獨裁者安多尼斯哥和總統部的錯誤和蘇聯作戰三年，曾給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以

重大的損害，所以我相信羅馬尼亞人民對這個停戰協定，當也能滿意。他在感謝蘇方的招待之後說：今日羅馬尼亞將面臨的問題，是羅蘇兩國的軍事合作。羅馬國準備動員一切人力，以對德匈作戰，羅馬的人民準備犧牲一切，以完成其責任。並相信久望的自由民主而獨立的羅馬國，就要實現。他並強調羅蘇經濟合作的必要。目前羅馬的部隊分別歸羅馬人指揮，但全軍的行動，是由蘇方指揮。該團在答覆羅馬總統將實施民主到何種程度時說：新國民大會就要產生，而新憲法亦將制定，羅馬國體將由人民自行決定。

羅馬尼亞投降之後，保加利亞也迅速提出了和平要求。起先，保加利亞政府還妄想用欺詐手段，表面上宣布中立（八月二十六日保政府宣言），曾子真不願放棄對德合作。但到九月初旬，蘇軍得到更大勝利之後，保加利亞部長會議即於九月九日通過派出代表團，並令其立即起程和蘇聯烏克蘭第三戰線總司令托爾布辛將軍進行談判，以便訂立最後條件，停止蘇軍和保加利亞間的敵對狀態，重建兩國間的外交關係，對論兩軍隊如何合作驅逐德寇出保境。部長會議又決定改組保國政府，新政府由喬吉夫任總理，史台諾夫任外長。新政府在九月十一日正式成立之初，即恢復了憲法賦予人民的民主權利，恢復了出版自由，廢止了新聞檢查制度，逮捕了一切罪惡昭彰的反動份子，並且開始籌辦國家行政機構和外交陣容，這就促使保國走上民主道路，因而也就奠立了保蘇重建外交關係的基礎。

芬蘭總理赫克澤爾於九月二日發表廣播，謂芬蘭國會已討論芬蘭與蘇聯間重建和平的問題。他說：目前軍事和政治的情勢，已使我們有採取行動以求解決的需要。今年四月時，形勢還沒有現在這樣壞，而目前因蘇聯六月攻勢發展的結果，我們必須退出戰爭。當今軍事局勢對德國而論，極為不利，德人必須用盡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力捍衛它的本土。德人希望我們繼續和蘇聯作戰，但德人已不能給

我們以充分的援助。政府鑒於軍事情勢的轉變和國民對和平的熱切希望，便考慮其再度接近蘇聯的責任。芬蘭態度的改變，表示納粹德國在北歐的附庸的解體。但正如倫敦觀察家所說：「芬蘭是因為不得已才這樣做，並不是回心轉意，而是因為德國無力協助，它本身又不能單獨作戰。爲了本身生存，唯有投降的一條路」。英國輿論並認爲「芬蘭在今年四月間拒絕接受蘇聯出乎意外寬大的議和條件，的確是失去退出戰爭的一大機會。芬蘭如果在那時接受蘇方條件，英方或已給芬蘭以支持。英國輿論鑒於四月間蘇方所提條件的寬大和蘇方等待芬蘭議和的忍耐，現已深信蘇方並沒有染指芬蘭主權的野心，所求的僅是本身的戰略安全，免受德國的侵略」。蘇聯沒有因芬蘭處境困難，而故意抬高身價。所以由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聲明：「對於芬蘭政府的相應的要求，我們已經接受，已對這求和的要求作了肯定的答覆，蘇聯政府准許芬蘭代表團到莫斯科來了」。

關於蘇波關係，最近也有進一步的發展，首先由於今年七月二十二日波境內的國民會議宣佈成立民族解放委員會，向人民宣布了民主的政綱，以保障人民言論信仰結社的自由，嚴懲一切法西斯罪犯，進行土地改革，復興農村與改善人民生活爲任務。在外交政策方面，提出明確的外交原則，要跟蘇聯捷克結成堅固同盟，和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實行合作，並任命波軍總司令協同蘇軍作戰，這就使改善蘇波關係建立了初步的基礎。於是蘇聯政府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立刻進行談判。由於談判是在誠懇而友好的，互相了解的空氣中舉行，蘇聯政府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關於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後波蘭行政機構和蘇軍總司令之間的關係，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簽立協定。這個協定，是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由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兼外交部長奧蘇布卡——摩拉夫斯基代表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克里姆林宮簽字。這個協定簽字時，蘇方在場的有：蘇聯人民委員

會主席斯大林、蘇聯外交部人民委員長維辛斯基與常務委員巴夫洛夫及朱可夫將軍。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方面在易勒河、割三赫康農業與土地改革處處長維多斯、國防處處長陸軍上將羅拉、齊蘭斯基，勞動保障社會保障與保健處處長羅布納博夫。

協定全文如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關於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後蘇軍總司令和波蘭行政機構之間的關係協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願望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後，在波蘭共和國領土上蘇軍總司令和波蘭行政機構之間的關係，以友好精神解決，已締結本協定，內容如下：

(第一條) 在蘇軍開入以後波蘭的領土上軍事行動的區域內，在貫徹軍事行動所必需的期間，和作戰有關的一切事情方面的最高權力和責任，當集中在蘇軍總司令的手裏。

(第二條) 在已從敵人羈絆下解放出來的波蘭領土上，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一) 依照波蘭共和國的法律，設立并領導後者所建立的行政機構，(二) 實施措置，以便更進一步編組波軍聯隊，并補充波軍。(三) 保證波蘭行政機構積極協助蘇軍總司令由紅軍貫徹軍事行動，并滿足紅軍駐在波蘭境內期間的糧食和需要。

(第三條) 在蘇聯領土上建立的波蘭部隊，當在波蘭領土上作戰。

(第四條) 蘇軍總司令和波軍民族解放委員會之間，當經由波蘭軍事代表保持接觸。人員，(第五條) 在直接軍事行動區域內，波蘭行政機構和蘇軍總司令之間，當經由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代表保持接觸。

（第六條）波蘭解放區的任何部份，一經不再是直接軍事行動的區域，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就立刻完全負責，掌管關於民政的一切事務。

（第七條）在波蘭領土上，蘇軍的一切人員，當歸蘇軍總司令管轄。波蘭武裝力量的一切人員，當服從波蘭軍法和條例。在波蘭領土上的平民，即使在反對蘇軍而犯的罪案中，也歸後者管轄。不過在軍事行動區域內所犯的罪案，不在此例，當歸蘇軍總司令管轄。在可以爭論的案件中，關於管轄權的問題，當由蘇軍總司令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互相商得同意來解決。

（第八條）在蘇軍和波蘭武裝力量共同軍事行動的全期間，後者在作戰上當服從蘇聯最高統帥部，而在關於編制和人事方面的事情，當服從波蘭武裝力量總指揮部。

（第九條）關於和蘇軍駐在波蘭領土上有關的，以及和蘇聯領土上編組的波蘭武裝力量有關的財政和經濟問題，當締結特別協定。

（第十條）本協定一經簽字，立即發生效力。本協定用俄文和波文各繕寫兩份，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立於莫斯科。

（簽字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代表莫斯捷夫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奧蘇爾斯基
摩拉夫斯基

，這幾年波蘭人民飲乾了希特勒絞刑吏的統治所給予的可怕的苦難之杯，這種苦難，是德國法西斯帶給他們的；同時，亦是舊日那些反動的政治投機家賜給他們的。如今，新生的波蘭出現了，廣大的波蘭人民把全部的力氣，集中在這個民主政府的周圍了。以前集合在流亡政府周圍的人士中，亦

發生了紛爭。有眼光的人士主張與解放委員會合作；而一切投機取巧，說謊僭位，壓迫人民的東西，則在民主力量的打擊之下崩潰下去了。在波蘭這種新舊力量對比發生劇烈變化的趨勢之下，波蘭流亡「政府」總理米洛拉茲柯也抱着不愉快的心情，偕着外長陸莫於八月初去莫斯科與斯大林，莫洛托夫進行商談，同時又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駐蘇代表交換意見，因為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堅持一九二一年的民主憲法，而波蘭流亡「政府」則欲維持一九三五年的專制憲法，雙方無法接近。且據美國無線電評論家斯提爾觀察（八月十二日紐約電）：所謂波蘭流亡政府，尙有更進一步陰謀，其中一般法西斯官僚份子，如索森科夫斯基（總司令兼國防部長）和安德斯（參謀長）等，正在多方策動，企圖造成美國英國和蘇聯之間的分裂。尤其不能饒恕的，就是索森科夫斯基這班軍人敗類，僅僅爲了達到他們自己的私利和野心，在八月下旬時機尙未成熟時，就擅自下令華沙地下軍輕舉妄動，故意不讓他們和蘇聯紅軍動作相配合，以致使華沙人民遭受許多不必要的犧牲和苦難，結果反使華沙的解放推遲。波蘭流亡政府所有這一切倒行逆施，就使他們難以和蘇聯及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相協調，因而米洛拉茲柯也就不得不匆匆回到倫敦，宣布此行的失敗。

在這期間，蘇聯外交政策的另一成就，就是接受黎巴嫩政府的提議，建立了黎黎兩國的外交關係。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黎巴嫩共和國外交部長塞利姆·台克達，致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長莫洛托夫說：「黎巴嫩共和國政府表示熱烈希望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進入改善的外交關係。這種聯繫，是和黎巴嫩民族遠大的抱負符合的。黎巴嫩民族對於蘇聯各民族人民的燦爛的英雄氣概，以及對於蘇聯領袖們外交政策所遵循的高尚原則，表示最偉大的感佩。黎巴嫩人民，爭取了許多年而現在才完全取得了自身的獨立和主權，充分確信：蘇聯外交政策是以尊重所有一切民族的自由和

平等爲基礎的——這些原則，跟征服和霸權的企圖，是不相容的。黎巴嫩政府自由地參加民主國陣營，對軸心國進行剛勇而光榮的戰鬥，表白自己的親感，相信我們兩國間五派外交使節，必將造成黎巴嫩主權獨立和幸福之保證。因此，我榮幸的請閣下徵求貴國政府同意，黎巴嫩政府派遣特命全權公使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政府亦派遣同級的外交官於黎巴嫩政府。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英洛托夫致齊利姆、台克拉的覆電說：「閣下代表黎巴嫩政府，對於蘇聯各民族人民在對希特勒德國及其同謀犯鬥爭中的英雄氣概所表示的親感，蘇聯政府表示異常感佩。蘇聯政府欣然接受黎巴嫩政府關於建立蘇聯和黎巴嫩之間的友好外交關係的建議。蘇聯政府準備派遣特命全權公使於黎巴嫩共和國政府，並接受黎巴嫩派遣駐於蘇聯的特命全權公使」。

同時，蘇聯和冰洲共和國也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互相派遣了特命全權公使駐在對方首都，這與上述蘇黎兩國所建立的外交關係，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第七章 戰後和平問題與蘇聯外交政策的展望

世界戰爭中勝敗誰屬已很明顯：侵略國必敗，民主國必勝。我們應有此信心，應為這個目標而共奮鬥。言尤感興奮的，不僅勝敗誰屬已定，而且戰後世界的動向亦有了明確的方針。一九四一年八月大西洋憲章的宣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國的宣言，五六月間英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協定的簽訂，都規定戰後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擴張領土，不干涉別國內政，各國人民有選擇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讓法西斯侵略主義再有抬頭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蘇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國所共同承認。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新基礎。

沒有戰略的展開，便沒有戰略的展開。戰後問題之原則上的確定，雖係未來問題，却具備着極其豐富的現實意義。可以說：未來和平的基本政策，乃是當前作戰的主要保證。因此，每一國家，當目前戰爭進行時，所應基於戰後世界合理和平的要求上，確立明顯的基本政策。

蘇聯對於戰後世界的態度，第一次的正式表示，是一九四二年元旦簽字於二十六國宣言贊同羅球聲明。第二次，便是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與英國締結戰後二十年的互助協定，以及六月十七日與美國締結互助協定重申大西洋憲章。此外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與二十五週年的兩次演說中，以及在斯大林與美國特使威爾基的談話中，都曾提到對於戰後和平的意見。據威爾基在他所著「天下」(Our World)一書「我們的盟國蘇聯」一章中所載，斯大林的目標乃是：(一)

「種族特權的廢除，民族平等，它們的領土完整，被奴役民族的解放，它們主權的恢復，(二)每

民族有依照它的願望處理本身事務的權利，對於受難民族的經濟援助，對它們爭取物質權利的協助，民主的各項自由的恢復，希特勒式政體的毀滅（引自文匯週報第一卷第九期）。

「斯大林的真意果然如此嗎？」有人提出這樣的質問。對於這個質問，威爾基的答覆是這樣的：「如果我們看到蘇聯千百萬人民為捍衛祖國而犧牲，以及六千萬人民已淪為納粹的奴隸；看到另外成千百萬的蘇聯男女在工廠礦山中每週狂熱地工作六十六小時，為前線戰士生產製造戰爭用具；再看到那些大型廠以類似神蹟的搬運力移致幾百英里以外，脫離納粹威脅而繼續生產，那種種的努力——那麼，我們對於斯大林的聲明，也許更加信而不疑。因為祇有在人民的態度中間，我們才可以找出斯大林所提目標的最好解釋。」

「民主國家中許多是害怕和信任蘇聯的。他們放心一種經濟制度的侵入會毀滅他們自己的制度。這種恐懼沒有事實的根據，而是自己虛弱的表現。蘇聯並不要吃我們，也不會欺哄我們。自然，除非——而這是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的——除非我們的民主制度和我們的自由經濟由於濫用和實踐中的失敗而使我們變為軟弱的不堪一擊，那是另當別論的。對於共產主義最好的回答，是一種生動的、活躍的、無畏的民主——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民主。我們所要致力的就是站立起來依照我們所宣示的理想去完成。唯有如此，那些理想才能安全無恙。」

「不，我們用不着害怕蘇聯。我們需要學習與它合作打擊我們的共同敵人——希特勒。我們需要着與它在戰後世界中通力合作。因為蘇聯是一個有生動力的國家，一個富有活力的新社會，一種任何未來世界不能忽視的力量（原文）。

這是威爾基經過親身目睹而又經過冷靜考慮之後所得出的結論，所以特別值得我們重視。而且這

並不是威爾基個人的私見，前美國駐蘇大使歐維斯在他所著「出使莫斯科記」一書中，也有如下類似的觀感：

「據我的意見，蘇聯人民、蘇聯政府，以及蘇聯領袖們，都已經根本地爲利他主義的思想所感動了。他們的目的，是促進人類的友愛和改善一般人民的命運。他們希望創造一個使人民在裏面平等地生活而由倫理的理想統治的社會。他們獻身於和平。他們會作很大的犧牲，以圖達成這些精神向上的抱負。他們現在正爲我們而對希特勒主義戰鬥，而應該儘速地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以及盡我們所能做到的友善合作。」

「英國、美國、蘇聯，以及中國是地球上四大互相爲助的強國。它們的利益，它們政府的思想，目的都不相衝突。此外，它們的聯合資源在人力上，可能的軍事和海軍實力上，戰略原料上，工業生產上，以及累積財富的貯存上，都可以在左右國際的局勢。這幾個國家形成了一條自然的軸心，強大得足夠擊敗納粹——法西斯的強國。它們有着一個共同目標，即阻止希特勒統治世界以及把邪教的功利主義和北極的宗主權強加於地球上基督教的和其它倫理思想的民族。它們的共同意志和目的不單是擊敗納粹——法西斯的軍隊，並且還要幫助侵略國家的人民改革他們自己的政府，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安康的世界中。在這世界中居住的是文明的人類，而不是丹麥真有牙齒和爪的規範的歸化動物。」（見梁純夫譯「出使莫斯科記」一〇六頁）

關於蘇聯今後國際關係的問題，我們還可以引馬克尼納（Max Lerner）在大西洋月刊所發表「蘇聯與戰後世界」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見來加以補充。馬克尼納首先提出了解蘇聯的必要，「並因爲世界自由的命運在今天大部分繫於蘇聯的繼續抗戰和美國的軍事生產，所以戰後世界中，美蘇兩國

的關係將起着一種決定的作用，是毫無疑義的。過去我們對蘇聯的一切均以「神祕」視之，現在也還有人傾向於把兩國的這些未來關係罩在同樣的「神祕」外衣裏。智慧的開始，應從認定沒有「神祕」入手。蘇聯在過去的力量與未來的地位，均當予以合理的分析。

接着，馬克利納於分析蘇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力量之後，就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蘇聯的勝利會使歐洲赤化嗎？第二個是蘇聯與英美等民主國家開會再來一次世界霸權戰爭嗎？這也許正是現在歐美人士所最放心不下的問題，但在馬克利納看來，這完全是一種過慮。因為據他看來，在戰爭結束之後，蘇聯必然是精疲力竭，要化長時間工夫去從事復興工作，而且斯大林向來反對輸出革命，除非歐美各國自己太折爛污，「如果我們（指英美自己）的佔領軍所到之處祇是怨聲載道，如果我們利用我們的武力去樹立由貪婪的軍人黨徒，工人痛恨的資本家，封建的地主和反動的教士們組成的政府，則我們必然將為歐美的民主主義掘着坟墓無疑。相反的，如果我們很睿智的進行恢復工作，並幫助着具有強大潛勢力的進步主義重建其自己的政府，則不可能再有布爾塞維克主義掃蕩歐洲的問題了。」

講到第二個問題，即蘇聯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間的戰爭是否不可避免；據馬克利納的研究，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們表現出民主主義既堅強而又大度，能包容強硬而又能包容自由。」如果蘇聯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都採取這種寬大的態度，則第三次世界霸權戰爭自可設法避免。而且戰爭的史乘已經證明：「兩個具有同一思想的國家可以互鬥，而具有不同的思想的國家可以相處和平。祇有在一個統治集團（如同納粹）抱定一種在它的性質上就要以最高統治權強施於其他民族的思想時，內思想的戰爭才不可避免」。

最後，根據馬克利納的研究，認為「要在將來避免衝突，最主要的條件是在戰後世界中繼續聯合

國的組織和開始人民的世紀。同樣明白的，若無這個以及其他相關的條件，則戰爭的結束祇會演成無數的慘絕人寰和繼續輪迴的新的戰爭。在展望蘇聯及未來中，最關緊要的問題不在是否我們以個人這場親蘇抑反蘇，最關緊要的問題是在是否我們以一個民族的立場能夠將如蘇聯人民這樣重要和有創造力的一個力量屏除於我們對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的計劃之外。某些東西已在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死去，那就是國家不顧人民的福利的觀念，以及權力政治的無計劃和混亂的制度的相關的觀念。有些東西正在我們的世界中成長，那就是人類是兄弟而非仇敵的觀念——聯合民族的結構決定組織人民的世紀的觀念，那個結構並不是需要從我們的頭腦內構成出來的結構。現在正在戰場上，工場和學校，甚至在集中營裏——在普遍全世界反對共同的敵人的鬥爭中鍛鍊的共同的行動的習性，必須不要破壞。如果我們把它們推廣及未來，我們便能贏得那個未來。（見文摘戰時旬刊第一〇二號）。

本來，「反對共產國際赤化世界」，乃是法西斯國家向外侵略企圖征服世界的一種藉口和盾牌。現在共產國際已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自動宣布解散，侵略國家的反共十字軍固失其依據，而同盟國反法西斯鬥爭的國際團結，却因此向前推進。故爾共產國際自動解散的建議一經發表，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士莫不認為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而予以衷心的熱烈的歡迎。

建議發表之同日（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倫敦方面對於解散共產國際之聲明極表歡迎，認為足以掃除美國及其他國家對蘇聯戰後目標之誤解開闢途徑。同時，在白宮及國務院方面，歡迎此舉，認為係友好表示，尤其對於美國為然。此舉預示聯合國國家在進行作戰時，將有更為密切之合作，其用意在於掃除若干美人對共產國際戰後政策之疑慮（五月二十二日華盛頓路透電）。而二十三

日紐約無線電廣播則謂「第三國際之解散，乃聯合國國家更為密切合作之表示，且係對戈培爾反赤宣傳

之三重大打擊（紐約五月二十三日路透電）。

確實無疑，共產國際的建議解散，最重要地是打擊了德意日法西斯。自從該項建議發表以來，不論倫敦還是紐約，其重要還是華盛頓，只要是愛自由，爭民主，反法西斯的人士，縱有見仁見智的不同，沒有不對這一劃時代的大事表示熱烈的歡迎的。那些人不高興呢？柏林的戈培爾，羅馬的蓋達，東京與南京的發言人，美國的孤立主義者，英國工黨黨的頑固份子。他們原都是靠反共起家的，如今他們却惋惜共產國際自動解散了！

柏林（羅馬）東京的一羣不必說，這一個圈子以外的一羣，他們怎麼說呢？他們說這是假的，即便承認它是真的，也以爲它不足重視。說它是假的，認爲共產國際名亡實存，不過換換方式而已。說它不足重視的，認爲共產國際之有無一視蘇聯之要求而定：不需要時取消它，需要時恢復它。不難恢復時，另外成立一個來代替它。他們不知道一個國際組織的成立或解散，決不能視同兒戲，自都有其歷史條件爲依據。

爲了回答這些，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斯大林發表了答路透社駐莫斯科首席記者金氏問的覆函。在那裏，他全面的分析了共產國際解散所起的作用。他說：

「共產國際的解散是適當的，因爲（A）它把希特勒份子硬說莫斯科有意要干涉他國的生活，並且有意要使他們「布爾塞維克化」的謬言暴露出來了。現在把這種謬言制止住了；（B）它把勞工運動內部共產主義的敵手硬說各國共產黨不是謀本國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來命令行動的這種謬言說露出來了；現在把這種謬言制止住了；（C）它有利於愛好自由的各國中愛國志士們的工作，這不問黨派或宗教信仰，而把各自本國的前進勢力團結成民族解放的單一的陣營，來展開對法西斯主

義的鬥爭；(D)它有利於所有各國愛國志士們的工作，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團結成單一的國際陣營，對希特勒主義獨霸世界的威脅鬥爭，這樣子來為以平等為基礎的將來各國同志組織清道。我以為所有這些情況綜合起來，結果就一定會使盟邦和其他聯合國家在對希特勒暴政爭取勝利而戰鬥中的統一戰線，更進一步鞏固起來。

在這四點中，(一)(二)兩點是屬於消極方面的，(三)(四)兩點是屬於積極方面的，在(三)(四)兩點中，第三點是關於各國國內的，而第四點則是關於國際方面。在第四點中，又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關於當前的：「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團結成單一的國際陣營，對希特勒主義獨霸世界的威脅鬥爭」；另一部分是關於戰後的，所謂「為以平等為基礎的將來各國同志組織清道」。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這一簡單的答記者問是包含了怎樣豐富的內容了。無怪乎這一答記者問一發表，立即引起國際上的交相稱譽，倫敦稱之為「有力的政治創舉」，美國譽之為「犀利坦白的文件中」，而巴西方面則簡直認為這一文件的發表，「實補充了大西洋憲章」。

四點中消極方面的第一點有關於積極方面的第四點，(一)(四)兩點都是關於國際的；四點中消極方面的第二點有關於積極方面的第三點，(二)(三)兩點都是有關於各國國內的——特別是反法西斯各國國內的——關於(一)(二)(三)兩點，阿根廷報紙認為「自此以後，任何其他政黨均可與共產黨人合作，對付極權主義，並使假借維護歐洲文化，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之名義，而另有所企圖的，均歸於無效」。這的確是一針見血的論斷。我們後來果然看到緊跟着共產國際的解散，全世界各國內部，首先是反法西斯國家內部，其次是歐洲納粹本國、附庸國及其佔領區內部的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戰線都有或多或少的開展，而這種開展正是促成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有力保證。

不過，我們在這裏要研究的還是有關於國際方面的（一）（四）兩點。因為德寇攻蘇三年，德軍及德國之盟軍在蘇聯戰場陣亡或被俘者已達七百八十萬人以上，此外並損失大砲九萬六千五百尊，坦克七萬二千四百輛，飛機六萬三千架。在蘇聯紅軍堅強打擊之下，希特勒的戰略已經徹底崩潰。自斯大林格勒一戰，蘇聯紅軍已經扭轉了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局面；從前是防禦，此後變成反攻，從前是被動，此後變成主動。從此以後，着着勝利，從這條河打過那條河，從國內打到國外，從一個戰場打出兩個、三個以至更多的戰場。到今天。英美盟軍在法境，因有法內地軍的並肩作戰，已把法西斯獸軍打得落荒而逃，直向希特勒的老巢挺進。蘇聯紅軍在喀爾巴阡山方面，多瑙河方面，波羅的海方面，得到各地人民的奮起響應，已經解放了一個又一個的被佔領國的國土，也在向着希特勒的老巢挺進。

納粹德國至此已不諱言蘇聯的軍事成功，而且還誇大它，以恐嚇英美各國，仍想把它們自己描畫成爲抵擋布爾塞維克化的最後二道關門。『在外交上，它們的技術是提出和平條件，通過瑞典，通過瑞士，通過那和平謠言中心的梵諦岡』（三月六日倫敦經濟學者）。我們知道軸心國家原來就是在反對共產國際的口號——「防共公約面具之下勾結在一起的，它的法寶就是『硬說莫斯科有意要干涉他國的生活，並且有意要使他們布爾塞維克化』。共產國際既經自動解散，它們的反共旗幟和口號，就更變得無的放矢了！

關於第四點，積極方面的，倫敦方面很注意關於戰後問題的一部份，六月二日倫敦路透社報道：英國政界人士，刻正重新討論創立「歐洲戰後會議」之廣泛原則，該會議將可免於美蘇國際聯盟之牽掣，渠等之所以發此議者，係受斯大林致路透社首席記者金氏覆函中「爲以平等爲基礎的將來各國同

「這組織清道」一語之提示而發；此語曾經鄭重考慮，並特爲表達，係更進一步發揮一年已前英蘇同盟條約中所稱之兩國「擬聯合其他思想相同之各國，採取在戰後期間以共同行動保障和平及抵抗侵略之建議」一語。該盟約簽訂後五月，斯大林曾稱英美蘇之聯合，係爲「各國之平等而戰」。自由主義的新聞記事報謂斯大林之函件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且係實際表示將來之國際事務，不應受挑撥或排斥性觀念之支配，而應受各愛好和平民族基於常識之共同行動之支配」。

倫敦方面注意蘇聯對於戰後問題的態度，是有道理的：第一，蘇聯已經提出決戰的口號，戰爭的發展在實際上也臨到了決戰的關頭，在決戰到來的日子，英美蘇加強團結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歐洲戰後問題，一般的說，假如對於歐洲戰後問題，英美蘇不能獲得一致的諒解，那末，英美蘇之間要祖進一步的加強團結，協同作戰是相當困難的。第二，自從蘇軍完成了冬季攻勢以來，國際間所發生的一連串不幸的事件，特別是蘇波問題，莫不與戰後問題有關；在事情的發展上，這些問題不澄清，（最低限度在原則上），英美蘇進一步的加強團結也是相當困難的。

英美蘇進一步加強團結，是英美蘇在歐洲協同作戰，夾擊希特勒的前提。只有英美蘇協同作戰，夾擊希特勒，才能迅速的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而今天擺在同盟國家面前的歷史課題，却是集中全部力量打敗法西斯，避免長期戰爭的危機。

因此之故，共產國際的解散，確實具有最偉大的政治上的團結，解除了軸心國的最有力的離開武器——反共妖言，並且在各國內部開闢了走向更圓滿的全國團結以進行戰爭取得勝利的道路。

總括前面所說，蘇聯外交政策的今後動向是很明顯的：它將更進一步致力於國際間反法西斯聯盟的團結，促進各國內部反法西斯的民族高潮和羣衆動員，以求更有效地打擊法西斯侵略者。它將以最

內的真誠遵守它所簽字的條約，更加鞏固中蘇英美的團結，繼續與英美協同作戰，夾擊希特勒，直到完全打敗希特勒及其同謀犯為止，並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推進各民族及各國在戰後的和平共居與民宇合作。最近蘇聯在敦巴頓橡樹會議上與英美中三國所共同簽訂的維持和平與安全國際機構之建議案，就是這種具體步驟的展開。對於日本方面，它願意日蘇中立協定繼續有效！它將繼續警告日本政府必須嚴格遵守所締結的條約和所保證的義務，如果日寇要想侵犯蘇聯領土和權益，向蘇聯挑戰，或竟爆發日蘇戰爭，那末蘇聯必然以強大的力量，去抵抗日寇和打擊日寇，使日本自身蒙受大害。它也將繼續援助中國抗戰建國及一切遭受侵略並為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致力於種族特權的廢除，民族平等，它們的領土的完整，被奴役民族的解放，它們主權的恢復，每一民族都能依照它自己的願望處理本身事務的權利，對於受難民族的經濟援助，對它們爭取物質福利及提高文化地位的協助，民主的各項自由權的恢復，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澈底毀滅。

在世界局勢異常複雜和變化多端的情形之下，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都將保持它立國原則的一貫態度。許多人懷疑這一點，但正像英國大科學家漢德恩（J. S. Haldane）所說一樣：「許多人覺得蘇聯的外交政策很難解釋，也很難符合他們關於蘇聯這個國家的見解。我很能了解一般憎恨蘇聯的人們。如果我很有錢，或者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反蘇宣傳的一部分，我自己也許憎恨起蘇聯來（其實有錢人裏面也有真能了解蘇聯的，例如前美國駐蘇大使戴維斯和他的夫人瑪都麗·波斯特（Marjorie Post），就是大財產繼承人和世界著名富翁之一，但是他對於蘇聯的真實了解和同情的抱負，也不下於一般普通被謠言為所謂親蘇份子，在他所著的「出使莫斯科記」中，就充滿有科學的智慧的光芒）。不過我真不明白，一個聰明的人怎樣會發現蘇聯的政策有什麼矛盾的地方。在我看來却正

相反，蘇聯的政策，幾乎一貫得令人感覺奇怪，比較英、法、德的政策都更「一貫些」（見文摘第六十號）。雖然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和整個革命政策一樣，在它達到勝利的途中，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有許多迂迴曲折和突然變化，因此在運用上不得不有所伸縮，有時更不得不採取嶄新的步驟，但是它的基本方針總是一貫的。

蘇聯外交政策成功的祕訣在那裏呢？首先當然由於它的立國原則，符合於歷史發展的要求，蘇聯國家的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相一致，所以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現在世界上好像還是一個孤島，但是它並不孤立，也可以不孤立的因素在，因而它的外交政策，就算不能時時都得到所有國家的贊同，有時道國反對它，有時那國反對它，甚或數國聯合起來反對它，但是人民羣衆却没有反對它的，就算有時發生懷疑，但是經過解釋和事實證明，它底政策的客觀真理性，也就如日經天一樣的明白了。

為什麼蘇聯的外交政策和它底內政一樣，能夠符合於客觀真理？因為他們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為他們能夠尊重歷史，又能注重現實，不是閉起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而是對於國內國外的情况，有不斷的系統的周密的研究，能夠從宏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自己決定政策與行動的基礎。這就給了他們以可能來了解客觀事物的真實情況，不僅看它的現象，而且看它的本質，不僅看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外部關係，而且找出它們的內部矛盾與聯繫，不僅注意現狀的了解，而且能夠多少預見事變的進程，即不僅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變化和向那裏發展，而且多少知道事變在將來會向那裏發展和怎樣發展。因此，蘇聯當局在決定政策和實際運用的時候，不僅關照自己，而且關照對方；不僅關照目前，而且關照將來。對於這一點，英國著名作家蕭伯

納有兩句話說得很有意思，他說：「蘇聯當局不僅懂得社會主義，而且懂得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武斷家却無論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茫然不能了解」。這真是「一句癩痢入裏的話」，值得我們深長體味。

蘇聯外交因為有它自己社會之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團結作依靠，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作後盾，又有國際間直接間接的同情與援助，更能用科學的態度和眼光去把握現實，去預見歷史事變的進程，並以自己的行動來影響這個進程。所以它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是手忙腳亂、臨時應付，更不是投機取巧，損人利己；而是根據歷史的發展規律，把握當時有決定意義的環節，確定適當的方針和辦法，動員充分的力量，展開全面的活動，擴大盟友，孤立敵人，雖不能百戰百勝，至少能够立於不敗之地，徐圖發展，或暫時挫敗，而在決定的時機，轉敗為勝，成為歷史的主人翁。蘇聯外交政策的成功的祕訣，就在這裏。

一九四三年六月初稿

一九四四年七月補正

蘇聯外交政策史論

全一册

每册定價國幣四百元

著者 林石父

出版者 雲風出版社

發行者 康寧書店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卅四年元旦初版三〇〇〇册

)

449913

449913

